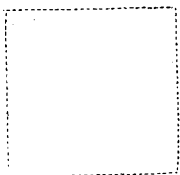


抗戰言論集第一輯

價實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初版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再版



編纂者

葉波澄

出版者

漢口現代出版社

總經售

進化書局

上海拉都路敦和里內源源里十七號

電話七七二五六號

目次

政治

- 怎樣爭取最後勝利……………施復亮(一)
- 怎樣才能維持抗戰到底……………陳冠南(一九)
- 紀念辛亥革命與當前的抗戰……………楊東蓀(二八)
- 關於民衆運動的幾個根本問題……………施復亮(四)
- 澈底抗戰與領導民衆……………沈志遠(六)
- 全民動員告國人書(上)……………李公樸(七)
- 全民動員告國人書(下)……………李公樸(八)
- 從抗戰中得來的經驗與教訓……………藍天照(九七)

- 論三種戰爭及其運用……………王紀元(〇七)
爲民族解放而戰爭……………白濤(二〇)

外交

- 請政府速定外交國策……………胡愈之(三〇)
對於上海抗戰應有的認識……………錢亦石(四五)
中日戰爭與九國公約會議……………藍天照(五三)
注意敵人最近的外交陰謀……………王亞南(六五)

經濟

- 戰時金融問題……………馮克昌(八三)
抗戰時期之財政問題……………孫懷仁(九三)

教 育

- 戰時教育問題……………楊東蓀(二〇六)
- 戰時教育方案……………王洞若(二二七)
- 戰時教育具體辦法……………滿力濤(二三一)
- 戰時教育的課程……………張宗麟執筆(二三九)
- 戰時教育的教師……………張勁夫執筆(二四九)

文 化

- 當前宣傳上的幾個問題……………施復亮(二六〇)
- 文化的抗戰與抗戰的文化……………沈志遠(二八〇)
- 不要放鬆思想的崗位……………艾思奇(二八八)

抗戰中的思想問題……………沈志遠(二九五)

戰時讀物問題與政治問題……………施復亮(三〇五)

政

治

怎樣爭取「最後勝利」

施復亮

(一)什麼是「最後勝利」？

中日戰爭爆發了！這一戰爭，在日本方面說，是帝國主義底侵略戰爭；在中國方面說，是被壓迫民族底解放戰爭。

從根本上說，這一戰爭底結局，只有兩個：一個是中國從半獨立國降爲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完全的殖民地，中華民族完全變成日本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奴隸；另一個是掃除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勢力，恢復一切失去的領土和權利，建立自由獨立的新中國，達到中華民族底徹底解放。前者是日本得到「最後勝利」，後者是我們得到「最後勝利」。「最後勝利」只有一個，不是我們得到，便是日本得到。

現在全中國人，除了少數漢奸和恐日病者，幾乎一致地說「最後勝利一定屬於

我們」。所謂「最後勝利」，自然不是指一時的局部的勝利，乃是指根本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澈底達到中華民族解放的決定的勝利。的確，只要我們能夠進行「持久的全面的抗戰」，「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我們要有這樣的自信，才不會因一時的、局部的失敗而灰心。

但是「最後勝利」決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是要我們大家努力去爭取的。爭取「最後勝利」是要有許多條件的。不做某些一些必要的條件，絕對不會達到「最後勝利」。每一個救國的戰士，除了確信我們有「最後勝利」外，必須注意某些一些達到「最後勝利」所必要的條件。

(二) 抗戰勝利底兩個根本條件

我們要使我們底抗日戰爭達到「最後勝利」，必須做到兩個根本條件：一個是發動民衆運動，一個是恢復「聯俄政策」，即實行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喚起民衆及

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遇我之民族」這兩個根本政策。

我們底抗戰，是民族求生存的戰爭，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們、奴化我們的戰爭。這種戰爭，根本與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不同。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其目的在於擁護少數帝國主義者底利益，犧牲本國多數民衆及弱小民族底利益，所以在國內採取「愚民政策」，誘騙廣大民衆替他們作侵略的工具。我們底抗戰却不然，必須「喚起民衆」政治的自覺，使每一個國民都知道「國破家亡」底危險和痛苦，使每一個國民都湧出抗敵救國的熱情，抱定犧牲自己以救國家的決心，使每一個國民都能發揮他底一份力量去貢獻國家，自發自動地踴躍參加一切救國工作；只有這樣，才有勝利的前途可望。只有把抗戰底基礎放在廣大民衆身上，只有「武力與民衆合作」，只有軍民打成一片，實行「舉國一致」的抗戰，我們才能獲得「最後勝利」。因此，我們必須立即發動民衆運動，把一切民衆（尤其是農工大衆）組織起來，造成一個鞏固的團結力。「團結就是力量」。我們要以「萬衆一心」的團結力

去對抗日本帝國主義底侵略。民衆應該有救國自由，應該有救國言論、救國組織、救國活動底完全自由。政府應當切實保護並促進民衆救國運動。政府以民衆爲基礎，民衆受政府底領導，雙方同心協力，才能進行持久的全面的抗戰。這是保障抗戰勝利的第一個根本條件。

現代的戰爭，往往不止是兩國間的戰爭，遲早會發展爲世界的戰爭。中日戰爭底發展，也有成爲世界戰爭的可能。現在任何強國，都不敢單獨與別國作戰。所以法國與蘇聯締結「互助公約」，德國與日本締結「防共協定」。前者代表和平陣線，後者代表侵略陣線。我們是一個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當然只有加入和平陣線去反抗侵略陣線。英國底態度至今是動搖的，美國想暫時退在「局外」，但在中日戰爭中，因爲它們在中國的利益受着日本帝國主義底打擊，在某一時期某一定程度內，也有同情我們或在經濟上援助我們的可能（自然不是無條件的）。所以我們應當盡可能地去聯合法蘇英美等國，以免自己在國際上陷於孤立無援的地位。其

次，我們還應當用盡一切手段（國際宣傳，參加國際團體活動等）去聯合一切國家。底被壓迫民衆和被壓迫民族，聯合日本國內的被壓迫民衆及其殖民地朝鮮、台灣等被壓迫民族。這樣，才能增高我們在國際上的勢力，打擊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但是在這些國外友軍和同情者中，最可靠的、最有勢力的、最有共同利害的友軍，目前還只有蘇聯（在將來某一個時期，日本國內的被壓迫民衆及朝鮮，台灣等被壓迫民族會成爲我們一個最重要的友軍）。所以我們應當與蘇聯結成最密切的關係，與蘇聯訂立「互助公約」，以反抗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不僅要吞滅中國，而且要進攻蘇聯、威脅蘇聯底存在。因此，中蘇聯合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實有極鞏固的政治基礎。「聯俄政策」是孫中山先生早已執行的革命政策，我們應當一致要求政府立即恢復這一革命政策。恢復「聯俄政策」是保障抗戰勝利的第二個根本條件。

我們如果能夠做到對內發動民衆運動，對外恢復「聯俄政策」，則抗戰底「最

後勝利」就有大部分「屬於我們」的可能。但要使抗戰底「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還須做到其它許多條件。

(三)當前的政治問題

我們底抗戰，必須是全面的抗戰。所謂全面的抗戰，不僅在地域上要全國一致地抗戰，而且要在社會活動上各方面一致地抗戰。這就是說：我們底抗戰，不能單限於軍事方面，必須擴張到政治、經濟、教育、宣傳各方面去。政治、軍事、經濟、教育、宣傳等方面的活動，必須有一個總的靈活的有機的配合，一致向着推進抗戰勝利的目標做去。當前的政治、軍事、經濟、教育、宣傳等問題，必須根據推進抗戰勝利這一最高的目的來解決，不能再用平時的辦法來敷衍。

先談當前的政治問題。我以為目前在政治上至少應該做到下列各點：

1.健全政府組織——目前的政府組織，決不能適合戰時的需要。我們要使

抗戰獲得勝利，必須把政府組織健全起來，把它改造成一個戰時的政治機構。從中央政府起，直到鄉村政府機關止，都應當適合抗戰的需要，加以澈底的改造。無論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都應當以真正代表民衆勢力的民衆團體（不是一塊招牌的機關）做基礎，同時應當大公無私地任用全國一切有志抗敵的專門人才（用人以能力、努力、忠誠、勇敢等條件爲標準，廢除一切資格限制）。政府一方面要能代表民意，別方面要能集權行動。取消一切不必要的糜費的駢枝機關。

2. 提高行政效率——廢除一切繁文縟節、粉飾太平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辦事要簡單敏捷，責任要彼此分明。

3. 嚴防漢奸活動——對於漢奸、間諜及一切破壞抗戰的分子，應當加以無情的鎮壓。政府應當與民衆合作來維持地方上的治安。

4. 釋放一切政治犯——在可能範圍內還應當釋放普通囚犯，強迫他們做某

些抗敵工作。

5. 取消高額薪水——在抗戰期間中，在前線的將士拿血肉去與敵人拼命，在後方的官吏還拿數百元甚至千元以上一個月的薪水，那是極不合理的事。在這全民族求生存的戰爭中，大家應當「同甘共苦」，任何人都不應當拿高額薪水，只應當領取最低的生活費。

6. 救濟難民——應當把一切難民組織起來，分配他們以適當的工作。這個問題不好好地解決，會引起經濟、政治上的大混亂。

7. 不惜犧牲少數人底財產——我們底抗戰是一種犧牲少數人底生命和財產來保全整個民族底生命和財產的戰爭，亦即是以短時期的較少的犧牲來爭取整個中華民族澈底解放的戰爭。抗戰的犧牲誠然是很大，但比起整個中華民族長期處在奴隸的地位來，不能不說是一種短期的較少的犧牲了。這種犧牲是為爭取整個中華民族底生存所不可缺少的，是歷史上最光榮的犧牲。我們已經看見

有許多多英勇的抗敵將士，爲保護民族底生存而犧牲他們最可寶貴的生命，我們後死者應當踴躍地跟去做這種光榮的犧牲。但我們同時又看見有少數人竟捨不得犧牲他們底財產，甚至爲了區區的一點財產而「出賣良心和祖國」！他們竟把自己底財產看得比別人底生命還寶貴！像這樣的人，即使在主觀上不想做漢奸，在客觀上也等於漢奸！我們要抗戰，不能爲顧慮這少數人底財產而停止！我們決不能把這少數人底財產看得比整個民族底生命還更重要！許多抗敵將士能夠爲民族國家底利益而犧牲他們底生命，爲什麼這少數人不可以爲民族，國家底利益犧牲他們底財產！須知我們要保障抗戰底勝利，有時絕對需要犧牲少數人底財產；有時爲着戰略上的關係，也許要把整個都市底財產都毀滅淨盡。遇着有這樣的必要，我們絕對不用顧惜。我們要咬着牙根「抗戰到底」，只要到了「最後勝利」的那一天，運用全民族底力量，任何巨大的「財產」都可以創造出來！

假使在政治上能夠做到這幾點，那末抗戰底「最後勝利」，在政治上就算有了把握了。

(四)當前的軍事問題

其次，論及當前的軍事問題。我以爲目前在軍事方面，起碼應當做到如下各點：

1. 統一軍隊編制及指揮——掃除一切地方的及個人的色彩，使全國軍隊真正成爲保衛國家的國防軍。

2. 實施澈底抗戰的政治教育——從官長起到士兵止，普遍地施行抗敵救國的政治教育，提高他們底政治認識，增強他們對於勝利前途的信仰心，改善他們與民衆底關係。

3. 實行運動戰——尤其要實行游擊式的運動戰，盡可能地避免陣地戰。我

們要用持久的運動戰去消耗敵人底力量，增加敵人底困難。

4. 救護與慰勞——民衆團體應當經常地協助軍隊担任救護工作，對於抗敵將士應有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慰勞。

5. 保障抗敵將士家族底生活——將士死亡時，還應當保障其遺族底生活。

抗敵將士變成殘廢者時，應保障其終身生活。這樣，才能使抗敵將士安心作戰。

6. 全民的軍事訓練——對於一切民衆（除老、幼、殘弱者外），施行必要的軍事訓練。盡可能地發給鎗械於民衆，把勇敢的民衆武裝起來。對於民間一切自衛武器，加以登記和整理。

7. 普遍的防空防毒準備——不要單限於少數城市和少數上層分子，須以國家的力量推廣到一切有受空襲危險的地方。

（五）當前的經濟問題

復次，在經濟方面，我以為應當實施戰時統制計劃，做到下列各點：

1. 徵收戰時特別捐——現在所募集的救國捐，就是一種戰時特別捐。照現在的情形看來，捐助救國捐的，實在不能說「踴躍」。要靠這樣的辦法來解決戰時財政問題，實在是無望的。我以為在緊急的關頭，只有運用國家底最高權力，依照財產及收入底多寡，強制徵收戰時特別捐，真正實行「有錢出錢」的辦法。政府高級人員，更應當「以身作則」，把大部分家產捐助出來。在這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決不應讓一部分人犧牲力氣和生命，讓另一部分人依舊過「安富尊榮」的生活。亡國之後是大家都要做亡國奴的，救國當然是大家共同的責任。「犧牲」應當盡可能地讓大家平均負擔。犧牲一點財產是比不上將士們底犧牲生命那麼寶貴的。「有錢出錢」是應當認為比較最輕鬆的工作，也是「有錢人」所能做的最便宜的工作。沒有錢的人，只好犧牲生命和力氣了。兩者相較，有錢的人實在便宜得多。但是現在有錢的人竟多半不肯爽快地出錢，

這只有運用國家底最高權力來解決。

2. 統制金融——整理金融機關，全部歸國家管理。監督用途，限制外匯，取締投機。

3. 統制交通機關——一切火車、輪船、汽車、帆船、馬匹等交通工具，一律收歸國家統一管理。

4. 統制糧食——禁止鴉片、烟草等有害的及不必要的農產品底生產。有計畫地設法增加糧食底生產，至少做到全國自給的程度。關於糧食底儲存和調節，都應有全盤的計畫及合理的辦法。食鹽底分配，也應有統一的辦法。

5. 統制內外貿易——禁止一切軍用品及糧食底輸出。除軍用品及抗戰中絕對不可缺少的貨品外，一律不許輸入（因為外貨輸入要減少外匯基金）。國內商業也應有精密的登記和統一的管理，創立公定價格制度，禁止私人購買某些物品，限制某些物品底購買數量。

6. 統制工業生產——獎勵新舊工業；限制或禁止不必要的生產（烟酒、化妝品、婚喪用品及一切奢侈品、有害品）；強迫沿海一帶新工業立即或逐漸移入內地；整理、擴張並創立軍需工業。

7. 徵發軍用品——在戰上有必要時，得向民間徵發一切軍用品。

8. 通貨膨脹——在抗戰初期，實行通貨膨脹是一個必要的而且可能的救濟財政危急的辦法。但這個辦法在中國目前的社會條件之下，決不能持久，也不能普遍。到了某一個時期，在鄉村中必然會恢復到「物物交換」的狀態。在那時，只有實行「直接徵收」的一個辦法。但要實行這個辦法，必須民衆有高度的政治覺悟和強固的政治組織。

總之，我們要進行「持久的全面的抗戰」，爭取「最後勝利」，必須立即準備實行統制經濟乃至計劃經濟。

(六)當前的教育及宣傳問題

最後，在教育 and 宣傳方面，也應當立即施行如下的辦法：

1. 改變現行教育制度——現在全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全國一切力量都應當用在抗戰上面去。教育也應當與整個抗戰活動配合起來，使教育機關所教育出來的人才能夠在抗戰各方面去活動。在抗戰中，需要能夠在政治、軍事、經濟、教育、宣傳、民衆運動等方面活動來推進抗戰勝利的人才，教育機關便應當趕快培植能夠擔任這些工作的人才。現行的粉飾太平的教育制度，絕對不能完成這種使命，而且會使許多奮發有爲的青年發狂自殺。我以爲在教育制度方面，至少要改變下列五點：（一）合併學校，在同一區域內只許設立一個同性質的學校（校舍不能集中時，可以分設幾處，但管理訓練須絕對統一）；（二）除小學外，一律縮短修業年限，加緊授課；（三）大學合併重

複的學系，廢除不必要的學系；（四）徹底改變課程（適合抗戰的需要），廢除不必要的學科；（五）除小學外，普遍施行軍事訓練。

2. 普·遍·的·政·治·教·育——對於全體民衆施行徹底抗戰的政治教育。

3. 普·及·國·防·知·識——關於防空、防毒及戰爭上所必要的常識，須普及於一切國民。

4. 宣·傳·問·題——應當利用文字、圖畫、歌唱、戲劇、演講、談話等一切方法去喚起民衆抗戰的熱情和決心，提高他們底政治認識。宣傳要正確，統一而普遍。

（七）「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事·
如果我們能夠發動民衆運動，恢復「聯俄政策」，如果我們能夠在政治、軍·
經·濟·、教育、宣傳等方面都能做到上述那些辦法，運用全國一切力量來實行持

久·的·全·面·的·抗·戰·，·則·我·敢·斷·言·，·「·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同胞們！我們大家一致努力去爭取這「最後勝利」，求得中華民族澈底解

放！（文化戰線第一期）八月二十五日

怎樣才能維持抗戰到底

陳冠南

一

自「九一八」事變爆發的第一天起，歷史即已在中國全體民衆面前提出了兩個可能的前途：抗戰到底呢，還是妥協投降？前者是走向民族解放，民族復興的唯一大道，而後者則是蹈襲朝鮮覆亡的故轍。

很明顯地，日帝國主義是非併吞整個的中國決不會中止的。六年來鐵一般的事實昭示出來：我們的當局每退一步，日帝國主義即前進一步；我們的當局愈是退讓，日帝國主義即愈向前進攻。不論我們毫無抵抗地斷送了滿洲與熱河；十分屈辱地接受了上海協定，塘沽協定，與何梅協定；異常卑屈地容忍了冀東偽組織的存在，……但日帝國主義絲毫不會因此感到滿足，反而愈益兇殘狂暴起來，最近竟公

然製造種種藉口以進佔我平津，猛攻我上海。現在且動員其全國的物力與人力，傾全國的海陸空軍來向我國各方面猛襲了！這顯然是表示日帝國主義企圖用最猛烈的殘酷的殲滅戰在最短期間內予我國以最嚴重的打擊，迫使我國當局終止抗戰，向其妥協，訂立「城下之盟」！這種情形，更明確地告訴我們：是抗戰到底，走向民族解放的道路呢？還是中途妥協投降，永遠陷入朝鮮的悲運！

一一

「我們須要抗戰到底」，這一口號，如果不是公然的漢奸，現在大概沒有人敢於反對吧！但要怎樣才能維持抗戰到底？怎樣才能從抗戰中獲得最後的勝利呢？目前最中心的問題便在這裏！空口喊抗戰到底，是沒有用處的，無裨於實際的。現在只有具體地提出實際的方案來，才能繼續支持這個戰爭。在軍事上我們總算已盡了很大的努力，我們的將領和士兵在前線上已然表現了偉大的堅強的奮鬥精神與犧牲

精神。我們差不多已動員了現有的全部或最大部分的軍事力量。然而我們的抗戰不但很少進步，而且還顯露了許多弱點，尤其在北方已失去了軍事上和政治上許多異常重要的地區（如平、津、南口、張家口、平綏路、大同、保定、滄州等）。如果我們不只是一味虛誇，光說夢話，敢於面對着事實，便必須認識我們的抗戰雖尙在開始，但已經臨到了嚴重的危機。誇大危機，固然足以造成卑怯的心理，是一種罪惡；但隱瞞危機，諱言危機，即等於諱疾拒醫，更屬危險。只有冷靜地正確地認識自己的弱點和危機之後，才能尋求出補救弱點和挽救危機的切實方案來。

二

但我們的弱點，我們當前危機的根因，是在何處呢？直截了當地說，即在於我們沒有將全國的物力與人力動員起來！日帝國主義已動員了全國的物力與人力來進攻我們，而我們則除了動員現有的軍事力量外，幾乎看不出別的動員活動。我們

必須瞭解，必須坦白地承認，我們現有的軍事力量是很有限的，以之抵抗擁有現代強大軍備的日帝國主義是不夠的。換句話說，從現有的軍事力量對比起來，我們是遠較我們的敵人爲弱的。但我們亦擁有另一種最強大的力量，那就是我們四萬萬五千萬的人口——這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無限的抗戰資源。假如我們能將我們全體民衆動員起來，即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不但可以粉碎日帝國主義的侵略，即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聯合起來亦無法征服我們。這在歷史上有兩個最顯著的事例足以證實我們這種估計的正確，而不是幻想。第一個事實是法蘭西在大革命中粉碎了英國及歐洲全體反動國家（如奧、普、俄等）的聯合的進攻。既有的在軍事力量上說，當時革命的法國簡直不能同牠的敵人比擬。所以到一七九二年的秋天，革命的法蘭西臨到了異常嚴重的危機。但當時雅哥賓派及巴黎公社，堅決地排除一切困難，用全力組織了和武裝了全法蘭西的民衆，組織了強有力的民軍（所謂義勇軍），調到前線，發揮了希有的偉大的抗戰力量，結果刻刻擊毀了普奧等國的進攻，挽

救了當前的危機，並建立了以後繼續抵抗反動勢力進攻乃至拿破侖憑藉以征服全歐洲的基礎。第二是蘇俄之抵抗英法美日等帝國主義的封鎖與圍攻。蘇俄在十月革命後從舊俄繼承下來的遺產（指軍事力量）是十分微弱的。所以當一九一九——二〇年協約國的帝國主義聯合干涉蘇俄，向牠圍攻時，其危險較之一七九二年秋天的法蘭西還厲害得多。然而蘇維埃政府很堅決地迅速地將廣大的工農民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形成了強有力的紅軍，發揮了無比的抵抗威力，使英法美日等帝國主義不能不自動地放棄侵俄的計劃，蘇俄由此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得以保存和繼續發展。由法蘇這兩個歷史事實看來，證明對侵略者的反抗戰爭，特別是長期的抗戰，只有完全建立在全體民衆組織和武裝的基礎上，才能予侵略者以嚴重的打擊，獲得最後的勝利。

四

並且在日帝國主義方面，雖然牠的軍備強過我們，但其本身亦有極嚴重的弱點。在經濟結構上，日帝國主義只利於急戰而不適宜於長期戰爭的。如果我們能夠長期抵抗，抗戰到一年以上，日本的工商業及財政各方面便必然要發生最嚴重的破綻與危機。工人的失業，農民的破產，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生活陷於沒有出路等，結果一定在國內民衆中發生普遍的不滿與騷動。同時在中國前線上的下級軍官與士兵們，因為在戰場上的不斷死傷與長期的痛苦，也一定要對於戰爭感到嫌惡，對於政府及軍事當局發生怨恨與憤怒。因為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爭，只是爲了少數財閥與軍閥的利益。起初，一般民衆在那些帝國主義者的騙子所製造出來的空虛的愛國口號之下，還勉強可以忍受前方與後方的痛苦，但在痛苦加深到不能忍受時，他們就要逐漸發生反感與憤懣了。如果前方與後方的不滿和憤怒交織起來，匯合起來，便很有可能在日本國內發生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鬥爭——革命或政變，像一九一八年冬德奧所曾發生過一樣。這樣革命或政變，在客觀上將幫助我們的抗戰取得

初步的勝利，一直走上最後勝利的道路。

五

所以我們要想挽救當前抗戰的危機，只有立刻將民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我們的民衆如果在抗日戰爭中全體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比之法國大革命中的民衆及蘇俄十月革命後的民衆，其力量還要偉大。因爲不但我們的民衆在數量上遠超過牠們，而且在質量上我們的民衆曾經過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有了極豐富的極可寶貴的經驗與教訓。而且在精神上，我們的民衆與日本的民衆是完全不同的。前面說過，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與日本民衆，特別與日本的工農民衆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是相反的，因爲日帝國主義愈侵略中國，愈延長戰爭，便愈要犧牲日本工農民衆的利益，愈陷他們於不能忍受的痛苦地位。至於中國的民衆，將切身感到抗戰愈是堅決和澈底，將愈覺得有出路，有民族解放的光明在前面。因爲日帝國

主義多年來的侵略，特別是現時毫無忌憚地用飛機大砲向我們各方面的民衆猛攻，使得每個人都感到，至少容易感到：個人的命運與全體民族的命運是不可分離的。所以我們的民衆一旦起來抗戰，不是出於強迫，而是出於自願，出於義憤，出於爲民族爲自己爭生存的精神。因此，我們的民衆如果組織起來武裝起來以後，一定成爲最英勇的發狂一般憤激的衝鋒陷陣敢死隊伍。

現在是時候了！應該讓民衆自動地普遍地組織起來，武裝起來！首先應該在北方及長江流域各省（如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江蘇、安徽、湖北……）立刻進行武裝農民的工作。在北方各省便立刻可以武裝一千萬以上的農民。這種農民軍一組織起來武裝起來，便可立刻開往前線去擔任戰爭，（因爲北方的農民差不多都是善於運用武器的）。如果我們有了幾千萬的武裝農民，再加上城市平民的武裝，則我們抗戰的人力便可以取之不竭，而我們的抗戰也就可以進行到底了。

六

· 但民衆要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便必須政治上有相當的自由，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武裝自由等，——這是動員民衆力量最先決的條件。最後，而且是最重要的，是必須立刻建立民主集中的政治機構，以加強抗戰的領導。要正確地堅決地領導一個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沒有強有力的包括一切民衆中先進份子的民主集中的政治機構，是不可能的。十八世紀美洲反英的獨立戰爭，沒有當時的「大陸會議」作領導，是很少成功之可能的。法蘭西大革命中的抗戰成功，因為有「國民會議」與「巴黎公社」等革命的民主集權組織。後來蘇俄之抗戰成功，因為有蘇維埃政府，我們如果不願中途妥協，希望抗戰到底，達到最後的勝利，召集一個像法蘭西大革命中的緊急的國民大會來領導，是十分必要的。

（文化戰線第五期）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紀念辛亥革命與當前的抗戰

楊東蓀

一 寫這一篇文章的用意

今年是辛亥革命底二十六週年紀念，在發動了全面的民族統一抗戰的今天來紀念它，的確具有異常重大的意義。歷史底每一頁，是不會重寫的，同時也是不會白寫的。每一頁革命史，都各有它的意義；革命雖不幸而失敗了，但失敗中，却含有成功的因素，「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革命繼起者應從過去革命失敗中，記取其失敗底歷史底教訓，作爲行動底指針。因此，在今天來紀念辛亥革命，首先就應強調它底意義，並針對着當前抗戰局勢，接受它失敗底歷史的教訓，作爲現階段民族解放鬥爭底指針。

二 辛亥革命底意義及其歷史的教訓

辛亥革命底主要意義，就是民主共和政體的中華民國底成立與國內諸民族一切平等的關係底建立：

「此役所得之結果：一爲蕩滌二百六十餘年之恥辱，使國內諸民族一切平等，無復軋轢凌制之象；二爲剷除四千餘年君主專制之迹，使民主政治，於以開始。自經此役，中國民族獨立之性質與能力屹然於世界，不可動搖。自經此役，中國民主政治，已爲國人所公認，此後復辟帝制諸幻想，皆爲得罪於國人而不能存在。此其結果之偉大，洵足於中國歷史上大書特書」。（總理全集 中國革命史）

雖然如此，但辛亥革命並沒有完成中國革命底客觀任務。中國革命底客觀任務：一爲打倒帝國主義，一爲剷除封建勢力。辛亥革命底結果，是革命底流產，中

山先生因爲當時沒有實現它底革命主義，很痛惜這次革命底流產：

「不圖革命初成，黨人卽起異議，謂余所主張者理想太高，不適中國之用，衆口鑠金，一時風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余爲民國總統時之主張，反不若爲革命領袖時之有效而見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設所以無成，而破壞之後，國事更因之以日非也。夫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爲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爲志，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烈，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者，此固余之德薄無以化格同儕，余之鮮能不足駕馭羣衆，有以致之也；然而吾黨之士，於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難免有信仰不篤，奉行不力之咎也」。（總理全集建國方略心理建設自序）

這便是這次革命流產底主因。革命正在發展時期，黨人僅僅強調着排滿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對中山先生底民生主義與土地問題底解決方法，不但不曾實行，並且

閉口不談。因此，在排滿口號之下，軍事勢力雖有很好的發展，但革命黨人底行動始終沒有跟廣大人民羣衆底行動結合起來，沒有配合着人民羣衆底需要與要求，所以終於無法保持革命底勝利。在辛亥革命直前，人民騷動與農死暴動，幾乎遍及全國，成千整萬的人在反抗政府苛斂，在要求「麵包」，表示了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客觀上這些擾動與暴動是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結果），反滿清政府封建剝削的反動政治；倘若當時革命黨人能夠執行中山先生底革命主義。取得人民羣衆底支持，革命決不會流產，在革命發動當時農民對革命底要求，便是「推翻了滿清皇帝，我們便不要完糧納稅了」；倘若當時革命黨人底行動，能夠跟人民底要求結合起來，革命也決不會流產。可惜得很，革命黨人並沒有這樣做；恰在這個當口，舊官僚地主以及握有軍事實力的武人，固然搖身一變，滿口贊助革命，而革命黨人對革命主義與革命方略並無深切的認識，也就充滿着妥協與投機底思想；反動勢力固然造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八個字去抵制革命黨，而革命黨人亦隨身附和之」。（總理

全集要靠黨員成功不專靠軍隊成功）官僚地主一切封建勢力，是與滿清政府統治結合在一起的，僅僅推翻滿清政府，而不從革命主義上消滅封建勢力，其結果，自然是革命底流產。革命黨人違背了中山先生底革命主義，跟封建勢力進行妥協了；剩下的，只有革命領袖中山先生，在獨唱着國家社會主義，在獨自強調着民生主義，嗓子叫破了，依舊無人理會。中山先生在失望了，「當時是不獨不願意參加政黨，而且對於一切政治問題，亦想暫時不過問」。（總理全集要靠黨員成功不專靠軍隊成功）妥協底結果，自然是封建勢力底勝利，而中國革命問題却原封未動地擺在那裏。

中國革命底另一個客觀任務，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在辛亥革命直前，各地收回權利運動，風起雲湧，其中最重要的，像吉林四川河南都組織了保路會；成了比較廣大的羣衆運動；這一切充分地表示着中國資產階級與覺醒的知識份子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底反抗，尤其是四川保路會運動，在『庶政公諸輿論』與『鐵路准歸商辦』兩

個口號之下，（這兩個口號是從德宗一道上諭中摘下來的），更來得猛烈而廣泛，成了辛亥革命底導火線。原來滿清政府鐵路國有政策底本身乃係一種進步的政策，然而在當時資產階級反對這種政策，要求鐵路商辦的運動，却有重大的意義，因為當時所謂鐵路國有國營，實際上就是帝國主義所有所營，他們起而反對這政策，便無異是反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尤其是『庶政公諸輿論』這個口號，更表現着當時資產階級對參政的要求。不幸得很，在革命發動的當時，不會把這一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策略，發爲更廣泛更深入的民衆運動，再配合着當時軍事力量，以打倒帝國主義；恰恰相反，當時革命軍不但不敢反抗那站在滿清政府背後的帝國主義，反而滿口尊重外人在華條約權利，力避排外的惡名，革命軍行所至，都以冒犯外人爲大戒，致使中國革命底另一任務——打倒帝國主義未曾完成。而益加加重了往後中國革命展開底障礙。（誠然，當時革命軍底策略，爲的不讓帝國主義支持滿清政府以打擊革命，但要認清：帝國主義決不讓半殖民地的中國抬頭，不讓中國進步勢

力起來，所以它雖不支持滿清政府，往後却還得利用其他反動勢力以打擊進步勢力）。

辛亥革命流產了，它並沒有完成中國革命底任務。滿清政府推翻了，拖在背後的辮子被割下來了，民主共和政體的中華民國底招牌掛起來了；但是，中國革命問題依舊原封未動，代表專制政治的滿清政府統治換了代表封建勢力的袁世凱軍閥統治：

「曾幾何時，已爲情勢所迫，不得已而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妥洽。此種妥洽，實間接與帝國主義相調和，遂爲革命第一次失敗之根源，夫當時代表反革命的專制階級，實爲袁世凱。……袁世凱者，北洋軍閥之首領，時與列強勾結，一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如武人官僚輩，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黨人乃以政權讓渡於彼，其致失敗，又何待言？」（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宣言）

就從這時起，代表封建勢力底結集的袁世凱跟帝國主義合唱着進行曲，開始向進步勢力進攻，於是二次革命失敗了，接着又表演一次帝制怪劇。護國軍興，袁世凱死，帝制告終，而復辟之變又作。定國軍興，復辟告終，而護法軍起。從此以後，北洋軍閥系統，由於首領袁世凱之死，而分化爲皖系直系奉系等派別，其他客省軍閥，又各霸一方，不相統屬，而帝國主義復從中操縱，於是演成不斷的軍閥混戰。其次，由於不斷的軍閥混戰，加緊了軍閥對人民的剝削，而帝國主義又從中積極侵略，於是農村破產，結果就形成了一幅用人民的血所繪成的最慘酷的圖畫。

在軍閥長期混戰中，人民受不住軍閥與帝國主義恣意的宰割，也在起來反對軍閥與帝國主義，從五四運動及二七罷工直到五卅運動香港罷工，不斷地表現了廣大民衆反帝反封建英勇鬥爭，表現了中國革命隊伍中底新的力量，形成了中國革命運動底轉換點，一向被人宰割的人民大衆而今在怒吼了。這是可怕的集體力量，帝國主義要在它前面戰慄，封建勢力要在它前面表示屈服，中國革命底曙光，就顯露

在這裏。

三 革命主義與革命方略底進步，是客觀需要的反映

二次革命失敗後，反動勢力陡然加大，革命黨被人看作亂黨，具有洞見的中山先生却從這時起「組織中華革命黨，恢復民國以前革命黨之面目，以辛亥覆轍，申做黨人」。(中國革命史)護法之役，中山先生始終站在民主政治底立場，與北洋軍閥鬥爭，與桂系軍閥鬥爭。蘇聯革命後，五四運動後，中山先生逐漸體驗出蘇聯革命成功底因素，逐漸體驗出民衆力量底偉大。在這偉大的轉變時期中，中山先生底革命主義與革命方略，適應着客觀情勢底需要，時時在充實它底內容，不斷地向前進步；他能夠把握住偉大的時代，不讓時代悄悄地溜過去。中山先生積了四十年來的革命教訓，深切地了解到中國革命底主要任務，在反帝反封建：

「此戰之目的，不僅要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

蓋必如是，然後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絕，中國乃能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以造成自由獨立的國家也。……此次爆發的國內戰爭，本黨因反對軍閥而參加之；其職任首在戰勝之後，以革命政府之權力，掃蕩反革命之惡勢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謀自治。尤在對外代表國家利益，要求從新審訂一切不平等之條約，即取消此等條約中所有之一切特權，而重訂雙方平等互尊重主權之條約，以消滅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總理全集北上宣言民國十年九月十八日）

「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是軍閥和那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我們這次來解決中國問題，第一點就要打破軍閥，第二點就要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總理全總國民會議為解決中國內亂之法）

這是神聖的革命任務，是辛亥革命以來未曾完成的革命任務，也就是全國廣大民衆所企望能夠早日實現的任務。中山先生為着要完成這兩大任務，首先改組國民黨，不但要使它成為有鬥爭力量的黨，並且要使它能夠成為代表民衆利益的黨。中

山先主識爲單有這樣的黨，還是不夠，進一步必得「喚起民衆」。讓民衆組織起來，擁護這革命，參加這革命：

「七月以來，吳佩孚用兵亦無往不利，驕氣所中，至不恤與民衆爲敵，屠殺工人學生，以摧殘革命之進行，及人心已去，終至於一敗塗地而後已；尤於敗亡之餘，致電北京公使團，請求加以援助，其始終甘爲帝國主義之傀儡，而不能了解歷史的教訓如此。由斯以言，帝國主義之援助，終不敵國民之覺悟。帝國主義惟能乘吾國民之未覺悟以求逞，軍閥亦惟能乘吾國民之未覺悟以得志於一時，卒之未有不爲國民覺悟屈服者。……吾人於此，更可以得一證明：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今日以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使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之現象永絕迹於國內，其代之而興之現象，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爲國民之武力。國民革命，必於此時乃能告厥成功。……欲使武力與國民深相結

合，其所由之途徑有二：其一，使時局之發展能適應於國民之需要，蓋必如是，然後時局發展之利益歸於國民，一掃從前各派勢力瓜分利益及壟斷權利之罪惡；其二，使國民能自選擇其需要，蓋必如是，然後國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現，一掃從前各派包攬把持隔絕羣衆之罪惡。以上二者，爲國民革命之新時代與舊時代之鴻溝劃然，蓋舊時代之武力爲帝國主義所利用，新時代之武力則用以擁護國民利益而掃除其障礙者也」。（總理全集北上宣言）

在這裏，中山先生認定了民衆底集體力量，是國民革命底基礎，只有建築在這基礎上面的國民革命，才能夠有成功的一天。不是武力底人民，而是人民底武力；只有把「時局發展之利益歸於國民」，只有「使國民能自選擇其需要」，人民才得起來擁護革命，並積極地參加革命。這是血的歷史教訓，中山先生在四十年革命鬥爭中，深切地體驗了這教訓，並接受了這教訓。但單是這樣還不夠，中山先生進而又認定欲求中國底獨立自由，「還得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這於國際間敵友界限，是分得格外清楚的：只有以平等對待我的民族才是中國底朋友，侵略中國的都是中國底敵人。這是外交上唯一的路線，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夠求得解放，才能夠獲得自由平等。

中山先生根據這些基本認識，定出了國民革命政治綱領，主張召集國民會議、集中全國人民底意見，適應全國人民的要求，來解決國實；進而又確立了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接受友邦底援助，結集全國底力量，來完成國民革命底兩大任務。

果然，國民黨改組後，獲得了全國人民大衆底熱烈的擁護與支持，獲得了以平等對待我之民族底援助，那武力與人民相結合的偉大革命力量，不但摧毀了吳佩孚孫傳芳底百萬大軍，並且收回了漢滄英租界，使得帝國主義在這革命力量之前不得不表示屈服。一九二五——二七年偉大的革命運動，就是這樣生長出來的。

四 接受血的歷史教訓，來完成當前抗戰底任務

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運動仍舊沒有完成中國革命底兩大任務，仍舊沒有實現中山先生底革命主義與革命方略；恰恰相反，由於國共兩黨底分裂，由於地方與中央底摩擦，十年以來，正不知消耗了幾多國力，死亡了多少士兵和人民，致令日本帝國主義乘機對中國加緊進攻，中華民族竟到了生死關頭的地步。遠的不必談，單就六年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進攻的血賬來說，就證明了它底野心，不到獨吞中國滅亡中國不止。辛亥革命遺留下來的革命任務，二十六年來不但沒有把它完成，並且由於民族危機底深刻化，更加重了我們底革命任務。革命沒有成功，革命的力量是沒有止境的：

「革命的力量，無論在古今中外的那一個國，一經發動之後，不走到底，不做成功，都是沒有止境的。不只是十三年，或者二十三年三十三年，就是四十年五十年五十二年，革命一日不成功，革命的力量便一日不能阻止。要革命完全成功之後，革命的力量才有止境」。〔總理全集中國內亂之因十三年十一月二

十五日止)

這是至理名言，這是事實。中國人民決不肯一聲不響任由日本帝國主義宰割，決不肯俯首帖耳被敵人奴役向敵人「屈膝」，中國革命沒有成功，這革命的力量無論如何是不會終止的。

的確，由於去年西南事件與西安事件底和平解決，國內局勢已經進到停止內戰一致禦侮底階段。今年國民黨三中全會對政策上的開始轉變，已經證明了「精誠團結」救亡圖存乃係全國人民底要求。就在這個當口，日本帝國主義大舉進攻華北，造成了七七蘆溝橋事變，接着又是八一三淞滬戰事發生；我政府當局與全國人民，已抱定了最大決心，予侵略者以重大的打擊，全面的民族統一抗戰底局面，從此展開。十年來分裂對立的國共兩黨，爲着搶救民族底危亡，又再度手攜手地共同從事於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爲着抵抗暴日侵略，全中國底力量已經團結得像一個巨人一般，像一條鉄鍊一般，再也不能分裂了。全中國人民在今天來紀念辛亥革命，無

疑地對當前國共合作與全面抗戰底局勢，都抱了無限的希望，都企待着光明的前途底實現；因此，『懲前毖後』，我們應當接受過去革命失敗底血的歷史教訓，來完成當前抗戰底神聖任務；

第一，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底生死對頭，擺在中國人面前的問題，是有我無敵有敵無我底問題，其間決無中途妥協底餘地。七月十七日蔣委員長在廬山表示：『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現在最後關頭到了，全面抗戰展開了，全中國人民一致擁護蔣委員長底堅決的主張，支持政府抗戰到底，一掃過去親日派恐日派底妥協苟安底心理。我們爲着要完成辛亥革命遺留下來的反帝任務，爲着要實現中山先生底民族主義，首先就應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把暴日底武力驅逐出去，收復華北，收復東北，把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用強暴手段所取得的一切利益掃蕩得乾乾淨淨，瀚雪三十多年來底民族恥辱。不達到這個目的，不完成這個任務，誓不休止。

第二，辛亥革命底第一個意義，在掃蕩四千餘年來底君主專制政體，建立民主共和政體的中華民國。中山先生一生努力的革命事業，在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在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國。現在是「抗戰高於一切」「抗戰第一」底時候，但我們不應忘記過去革命失敗底血的歷史教訓，單憑軍事抗戰，決沒有勝利底前途。抗戰底重心在政治，政治底基礎在民衆。沒有政治動員，沒有民衆動員，絕對不能保障軍事勝利。爲着要博取抗戰底最後勝利，最主要的，應該建立起適應戰時需要的政府，網羅一切堅決抗日的各方有力份子，排除一切政府中親日主和及「徬徨不定」的份子，使一切政府機關都逐漸地民主化，以增強政治底民衆基礎。其次，應依照中山先生底遺囑、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救國的政治綱領。只有政府先

有了從下而上的民衆基礎，才能夠達到由上而下指揮如意的目的。中山先生主張「時局發展之利益歸於國民，一掃從前各派勢力瓜分利益及壟斷權利之罪惡；使國民能自選擇其需要，一掃從前各派包攬把持隔絕羣衆之罪惡」。是一切民衆運動底鐵則。在抗戰底今日，要動員民衆，首先就得遵守這個鐵則。我們不能利用民衆，而應該讓民衆自動組織起來，在民衆運動中應澈底採取民主底原則；我們不能讓民衆空着肚皮來支持抗戰，而應該把民生改善問題與民衆運動聯在一塊來做，使得「時局發展之利益歸於國民」。只有這樣，才能夠加強抗戰底力量，才能夠完成抗戰底任務。只着重抗戰（民族主義），而忽視民主（民權主義），政治與民生改善（民生主義），抗戰決沒有前途，恰恰相反，只有加強政治底民主化，只有改善人民生活，抗戰才有光明的前途。

第三，孫夫人宋慶齡先生說：「孫總理生前倡導三民主義，認爲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是救中國於危亡的政治綱領。同時他實感覺得要實現三民主義，只

有對外聯合平等待我之民族，對內喚醒民衆，組織民衆，聯合革命的政黨，共同奮鬥。所以他又手訂了三大政策。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離的。孫總理直到臨終不獨沒有改變他的主張，並且在遺囑中深望全國同志力求貫徹。在這種精神下，一九二六——二七年的北伐獲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是中山先生在過去革命失敗中所深切體驗出來的歷史教訓，在抗戰底今日，在紀念辛亥革命底今日，值得全中國人民猛省的。蔣委員長最近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發表談話：「總理曾說明三民主義爲救國主義，卽希望全國國民一致爲挽救國家危亡而奮鬥；不幸十年以來，一般國人對於三民主義不能真誠一致的信仰，對民族危機亦無深切之認識，致使革命建設之過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礙，國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飽受犧牲，遂今外侮日深，國家益趨危殆。……在危急存亡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澈底更始力謀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這是何等精忠爲國的態度。最近中國共產黨宣言，除向全國同胞提出中共奮鬥之總的目標外，並宣告「中山先生的三民主

義，爲中國今日的必需，本黨願爲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這又是何等光明正大的態度。在民族生死存亡底關頭，「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竟能完全實現，這不但可以告無罪於畢生爲革命奮鬥的中山先生及辛亥革命以來爲革命而犧牲的一切戰士，並且前途底曙光，也就顯露在這裏。因此，我們在全面抗戰底今天來紀念辛亥革命，我們應該不顧一切犧牲來完成辛亥革命所遺留給我們的任務，在當前尤其是應該完成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任務；進而針對着目前底形勢與需要，我們更提出具體的意見：一、要求政府立即實現中山先生手訂的三大政策，因爲三大政策與三民主義不能分離，三民主義既是救國綱領，現在爲着救亡，爲着求民族底生存，便該澈底實行三大政策。二、根據上述一點，我們要求政府立即對日絕交，並與蘇聯成立互助協定，以實現中山先生在遺囑中所昭示我們的教訓。三、國共合作，在過去革命中，寫下了一頁最光榮的歷史，我們現在更誠懇地企望，兩黨在精神團結之下，繼續過去的歷史再寫一頁更光榮的歷史。四、辛亥革命底另一個意義，在「使

國內諸民族一切平等，無復軌鑠凌制之象。中山先生底民族主義，對外在爭取民族獨立自由，對內在民族一切平等。現在爲來增加民族抗戰力量，爲着不讓暴日在中華民族中間實施挑撥離間的鬼計，我們應該澈底實現中山先生底民族主義，集合國內一切民族，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最後我們高呼：「接受辛亥革命以來失敗底血的歷史教訓，完成目前抗戰底任務」。『澈底實現中山先生底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文化戰線第五期）十月六日

關於民衆運動的幾個根本問題

施復亮

(一) 到底爲什麼要發動民衆運動？

現在輿論界已經一致地要求發動民衆運動了。爲什麼要發動民衆運動？有人說：發動民衆運動可以做一些抗敵後援工作，例如募捐、慰勞、救護及維持治安等。不錯，這些工作都是應當發動民衆來做的；但是民衆運動底目的決不止此。

孫中山先生畢生從事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也就是要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國。他告訴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我們發動抗日戰爭的目的及爭取抗戰勝利的根本方法，也必須絕對遵守孫中山先生這一正確的指示。

因此，我們要明白：我們發動民衆運動的目的，不單在於使民衆做些所謂後援

的工作，而且要把整個抗戰底基礎放在民衆身上，發動一切民衆底力量來爭取抗戰底最後勝利。民衆是抗戰底主體，民衆是一切抗戰力量底根本源泉。無論政治、軍事、經濟、或其它任何方面，都只有以民衆做基礎才有辦法。

先從政治方面來說。抗戰底重心在政治，政治底基礎在民衆。政治上沒有辦法，絕對不能保障軍事上的勝利。這種教訓，在歷史上非常之多。最明顯的例子，是南宋底失敗。我們底抗戰，要能獲得最後的勝利，必須建立一個適合戰時需要的足以保障「抗戰到底」的強有力的政府。因此，我們希望政府當局立即把一切平素親日主和的分子及動搖不定的分子從政府機關裏排除出去，把一切平素堅決主戰的各方有力分子都網羅進去，同時立即設法使一切政府機關都一步一步地民主化，以增強自己底民衆基礎。世界上最有力量量的政府，就是最能代表民衆利益和民衆勢力的政府。政府越能建築在民衆的基礎上，便越有力量。只有民衆的政府，它底一切政策和行動，才能真正得到民衆底擁護，永遠立於不敗的地位。戰時政府當然需要

集權，但只有民主的集權才是最靠得住的。最有力量的集權。發展廣大的民衆運動，是實行這種集權的唯一基礎。所以我們希望政府趕快明令發動並保護民衆運動，實現政治底民主化，以促進抗戰底勝利。

其次，從軍事方面說，也絕對必須發動民衆運動。我們底抗戰，必須變成持久的全面的抗戰，才能爭得最後的勝利。戰爭區域也許會擴大到全國，戰爭時期也許會延長到三四年以上。總之，日本帝國主義一天沒有打倒，我們底抗戰就一天不能停止。我們決不能與日本帝國主義並存於世界。在這持久的全面的抗戰中，決不能單靠現有的二百萬常備軍支持到底。抗戰繼續下去，也許要動員一千萬軍隊以上。這些軍隊底來源和補充，只有靠抗戰的民衆。而且在戰爭中，隨時隨地都需要民衆底幫助。例如構築防禦工事，運輸軍需品和糧食、修理交通機關、裝置軍用電話、救護傷兵、掩埋死屍、縫製衣服、燒飯洗衣、從事嚮導、偵探敵情、擾亂敵人後方、防止漢奸活動及搜集軍用品等，都可以由有組織的民衆來進行或幫助。我們底抗

戰，只有使一切民衆都有直接間接參加的機會，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要使一切民衆都能自發地踴躍地參加抗戰工作，必須立即發動廣大的民衆運動，把一切民衆（尤其是占人口底最大多數的從事生產的工農大衆）組織起來，並且盡可能地武裝起來。如果不發動廣大的民衆運動，不但現在的軍事行動得不到民衆底積極援助，而且將來的軍力還會得不到有力的補充。這樣，目前很好的抗戰形勢，將會遭遇到着慘痛的失敗。

復次，從經濟方面來看，也絕對必須發動民衆運動。在抗戰中，必須實行統制經濟，對於一切經濟生活都應加以合理的統制。我們爲着保障抗戰底勝利，必須發動全國一切經濟勢力，在一個統一的計劃之下來運用。要做到這一層，絕對必須依靠民衆團體底幫助。例如我們要統制糧食底販賣，奸商一定要把糧食設法藏匿起來，或以糧食資敵，或者任意高抬價格。這時，如果有糧食店員工會底組織，便可以叫它負監察報告的責任，便不怕奸商底違法作弊了。如果要統制糧食底生產及徵

收糧食，那更非依靠民衆底組織力量不可。任何統制經濟計畫，如果不得到民衆團體底協助，都不會有良好的結果。所以我們爲實行統制經濟以保障抗戰勝利起見，也不能不立即發動民衆運動。

以上從政治、軍事、經濟三方面看來，都可以明白：要使抗戰獲得最後的勝利，絕對必須發動民衆運動。因此，發動民衆運動是保障抗戰勝利的根本條件。我們要求發動民衆運動的理由，便在於此。

(二) 應當用什麼態度去發動民衆運動？

人們對於發動民衆運動，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是以組織者爲主體，利用民衆來達到自己底某種目的（自私自利的目的）；另一種是以民衆爲主體，組織者犧牲自己去爲民衆謀利益。前一種組織者，對於民衆採取「居高臨下」的官僚態度，使民衆把自己看成高一等的人物，把自己所組成的團體變成一個衙門，終於完

全脫離民衆而變成「孤家寡人」。後一種組織者，自認爲民衆中的一分子，完全與民衆站在同等的地位，始終站在民衆的立場上去啓發民衆、誘導民衆、訓練民衆，而使自己底組織一天一天地擴大，終於變成廣大民衆底團體。

這兩種態度，哪一種是對的呢？我們應當採取哪一種呢？不用說，後一種態度是對的，我們應當採用後一種態度去發動民衆運動。因爲我們之所以要發動民衆運動，目的是在於使他們參加抗戰工作，並不在於創造一個新的衙門來裝飾門面。用前一種態度去發動民衆運動，即使一時有若干民衆受我們底欺騙，團集在我們底周圍，不久也是要一個一個地散去的。只有用後一種態度去發動民衆運動，才能真正把民衆組織起來，使民衆團體逐漸變成強有力的團體，能夠切切實實地參加抗戰工作，甚至變成政府底強有力的基礎。

我們發動民衆運動，不但要站在民衆的立場上，而且要擁護民衆本身底利益。我們組織工會，便應當擁護工人本身底利益；組織農民協會，使應當擁護農民本身

底·利·益。不然，工人便不會承認工會是工人底團體，農民也不會承認農民協會是農·民·底·團·體。我們不能承認資本家有權在抗戰時期需要加緊生產或縮小規模的名義之下來加倍剝削工人或壓迫工人，我們也不能承認地主可以假借租稅加重或物價漲高等名義來加緊剝削農民或壓迫農民。商會及各種同業公會既然可以擁護工商業資本家本身底利益，工會和農民協會當然也可以擁護他們自己底利益。有人說，在這抗敵救亡的時期中。只應當談民族利益，不應當再談階層利益或職業利益。這句話在某一方面說是對的，在另一方面說却是不對的。在這抗戰時期中，無論誰都應當為擁護整個民族底利益而犧牲自己底利益，但不能為擁護地主資本家底利益而犧牲工農底利益。因為犧牲工農底利益，不但是剝奪工農底生存權，而且是剝奪民族底生存權。工農不但占全國人口底百分之八十五，而且是唯一從事生產的民衆。工農不能生存，民族自然也就不能生存。因此，我們發動工農運動（民衆運動底中心），不但要他們來擁護民族利益，而且要他們能夠擁護他們本身底利益。不然，便不能發

動廣大的工農運動。

(三) 應當採用什麼組織原則？

組織民衆團體，通常有三種組織原則：第一是官僚主義的，集權主義的原則；第二是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的原則；第三是民主集權的原則。

用第一種原則去組織民衆團體，結果會成了一塊空洞的招牌，機關會變成高高在上的衙門，得不到民衆底擁護。這種團體，官僚主義是十足的，動不動對羣衆下命令，組織者儼然自命爲羣衆底代表，到處以羣衆代表底名義向外招搖撞騙。但是它底集權主義却只有一個形式，它底命令只是一種官樣文章，不會有羣衆去認真執行。嚴格地說，這算不得民衆團體，用不着我們多加以注意。

用第二種原則去組織民衆團體，雖然可以組織很多羣衆，羣衆與團體底關係也可以相當密切，但是缺點是散漫無力，不能作強有力的行動。過份的民主雖然比過

份的集權要好一點，但也不適用於革命的戰鬪的行動。事事要尊重個人底自由，事事要由大會或代表會來解決，必然要耽誤許多應做的重要工作。所以這種組織原則，也不是我們所應當採取的。

我們所應當採用的是第三種組織原則，即民主集權的原則。這一原則底要點有二：第一、一切執行機關都是由下而上地用選舉的方法產生，同時每一下級機關必須受上級機關底指導或指揮；第二、在發表意思方面（在建議或提議方面），儘量尊重個人底自由，使每一個人都能自由發表他底意見，但一經多數議決之後，就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必須嚴格遵守決議，不能自由行動。民衆團體如果採用這樣的原則，一方面便能夠使民衆團體真正建立在民衆身上，能夠代表民衆底利益和要·求·，同時又能夠使執行機關有權力去執行一切，並且能夠動員它所有的羣衆去一致·行·動·。只有採用這種組織原則的民衆團體，才是抗戰中所需要的民衆團體。

一個民衆團體，偏重集權。會陷入官僚主義；偏重民主，會陷入自由主義。只

有雙方並重，雙方顧到，才會造成有羣衆的強有力的團體。民主與集權，應該合理地統一起來。但是具有主導的作用的是在民主方面。只有民主的集權，才是有自覺性的最有力量的集權。由上而下的集權的指導，必須以由下而上的民主的組織和訓練做基礎。只有這樣的指導，才能使羣衆自覺自動地來接受指導，發揮出羣衆底高度的積極性和偉大的創造力。所以我們要組織抗戰的民衆團體，必須採用民主集權的原則。

(四) 應當採用什麼組織形態？

現在有人主張在鄉村中把原有的保甲制度充實起來，使它變成農民底基本組織；在城市中普遍地成立里街組織，使它成爲強有力的組織。我以爲這種主張是不妥當的；過份地注重保甲制度和里街組織，結果會放棄真正的民衆運動。

我並不否認保甲制度和里街組織有相當的意義和作用，我們應當利用它們來做

維持治安及防空防毒的工作。但是我們要知道：第一，保甲制度和里弄組織是一種地域的組織，其中包含各階層各職業的民衆，利害既不相同，意識也不一樣，決不能變成一種強有力的民衆團體，第二，保甲制度是一種強制的形式主義的政治組織；里弄組織要想普遍地成立，也只有採用強制的形式主義辦法。像這樣的組織，決不能把它當作民衆底基本組織。如果要把這種組織當作民衆底基本組織，一定要阻礙真正民衆運動底發展。

真正的民衆團體，應當按照職業和階層組織起來。例如商人組織商會，工人組織工會，農民組織農民協會，編輯人組織編輯人協會，教職員組織教職員協會等。只有婦女，因爲有特殊的情形，可以組織婦女單獨的團體，但也應當按照婦女種類分成幾個部門。只有按照職業和階層組織起來的民衆團體，才能在抗戰中各自守住自己的崗位，從事自己所能做的工作，以收到分工合作的效果。也只有建立在這種民衆團體上面的政府，才能有計畫地實行全國總動員，有把握地指揮全國各方面民

衆一致地參加作戰，以爭得最後的勝利。

一切民衆團體，必須有下層的基本組織，才會變成一個有力的團體，不會變成空洞的組織。例如在上海組織印刷工會，必須在每一個印刷所設一支部，每一支部分成若干小組（五人至十人），這樣，才能發動全體會員去行動。像現在有許多團體，都患着「頭重腳輕」的毛病，上面有一個龐大的理事會，有三四十名理事，甚至至有百名以上的理事，下面並沒有任何基本單位的組織，難怪不能有積極的羣衆活動。像這樣的團體，既不民主，又不集權，結果自然發生「包辦」或「包而不辦」的現象。所以一個真正要想行動的民衆團體，絕對必須有下層的基本組織。沒有下層組織的團體，決不能發動廣大的民衆運動。

現在是抗戰的時期。我們底抗戰，必須變成持久的全面的抗戰。我們必須以民衆底組織的力量支持抗戰到底。因此，一切民衆團體，不但應有地方的組織，而且要有全國的組織。例如工會，上海應當組織上海總工會，無錫應當組織無錫總工

會，江蘇全省應當組織江蘇省總工會，全國應當組織全國總工會。各地方各種民衆團體，也應當有聯合的組織，以便統一地領導各該地方底民衆運動。各種全國性的民衆團體，也應當有聯合的組織，以便統一地領導全國民衆運動。民衆組織系統，應當獨立於政府組織系統之外，不能做政府組織底附庸。但這並不是要使民衆組織跟政府組織對立。恰恰相反，我們要使民衆組織跟政府組織在「抗戰到底」這一共同目標之下統一起來。我們要使政府盡可能地民主化，盡可能地把自己底基礎建立在民衆團體上面，同時我們也要使民衆團體用盡一切力量去擁護政府底抗戰政策，援助政府底一切抗戰行動。政府以民衆爲基礎，民衆受政府底領導，才能保障我們得到最後的勝利。

(五) 怎樣開步走？

我很知道，像我上面所說的那樣的民衆運動，在目前的客觀形勢之下，一時是

不容易做到的。但是我敢相信：真正要爭取最後的勝利，一定要一步一步地展開那樣的民衆運動。一切從事民衆運動的人，都必須向着上述的正當路線走去。

那末現在我們應當怎樣開步走？我以為：第一，可以加入各種現成的民衆團體，以羣衆的力量去推動他們加以改組或整理；第二，可以自動地集合一部分志同道合的朋友形成一個小組織（人數少也不要緊）拿這小組織爲中心向各方面去活動，以便形成一個較大的組織；第三，利用各種活動方式和訓練方式造成幹部人才；第四，以羣衆的力量要求政府保護民衆運動，並設法使政府了解我們底態度。假使我們能夠這樣一步一步地奮鬥下去，只要我們底抗戰不停止，我相信抗戰的民衆運動是一定會日益擴大而且深入的。

發動民衆運動確是當前最緊要的迫不及待的急務。我們在開步走的時候，對於幾個關於民衆運動的根本問題，應當先有一個明白正確的認識。我們是爲保障抗戰勝利而組織民衆，爲擁護民衆利益而組織民衆，決不是爲利用民衆來做我們底工具。

而組織民衆的。我們要從行動中去組織民衆，訓練民衆，同時也要從民衆運動中來訓練自己，教育自己。組織者要受組織，教育者要受教育。一切從事民衆運動的人，一方面要指導民衆，同時也要受民衆底指導。只有這樣，才能發動真正的民衆運動。保障抗戰底最後勝利。(文化戰線第四期)一九三七·九·廿五。

澈底抗戰與領導民衆

沈志遠

——要求立即發動民衆的政治總動員——

一 怎樣才算是澈底抗戰？

「澈底抗戰」，「全面抗戰」，——這是眼前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漢奸除外）一致的要求：不論是在朝或在野，不論是政府或民衆，也不論是這黨或那派。因爲抗戰必須是澈底的，所以我們應當把一切可能的中途妥協之路，都堅決地斬斷。例如全國的抗戰已經開始了將近一月；敵國政府已公然召回各地的領事，正式下令撤退在華的各地僑民；並且已經公然宣佈封鎖我們的海岸；幾十萬大軍，幾十艘軍艦和幾百架飛機，已經公然在全中國領土內進行掠奪、屠殺、毀滅和轟炸；但是我們的外交使領，依然任其留在敵國；敵人在華的財產利益（自然仍是數十年

來從中國人民身上剝奪去的脂膏），依然客客氣氣地任其留存，甚至代它保管（這顯然是明示外交妥協之路，尙未完全斬斷）。

再則，澈底的抗戰同時必然是全面的；我們不應把全民族的抗戰限於一隅，尤其不應把抗戰限於單純的軍事一面，亦不應把抗戰的責任限於某一方面（例如由政府單獨負責）。所謂澈底的，全面的抗戰，必須是全國的和全民的，也就是所謂「舉國一致」的。只有讓全國民衆在一切陣線上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等陣線上積極參加神聖的抗敵戰鬥時，這才算是澈底的全面抗戰。因此，就內政方面來說，要做到全面的澈底抗戰，必須立即解放全國的民衆救國運動；讓廣大的民衆能在抗敵救亡的大旗幟下面自由地組織起來，積極地行動起來，以充實加強和擴大政府所領導的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爲着抗敵的利益，政府不但應當消極地廢除過去所頒佈的束縛和阻礙民衆運動的一切法令，而且應當積極地領導和促進民衆的抗日救亡運動，立即發動民衆的政治總動員。只有這樣，全民抗戰的偉大的

政治力量，才能盡量地發揮出來。只有這樣，「最後勝利終必屬我」的信念才會變成事實。

其實，民衆政治總動員的重要性，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民國二四——二六年偉大國民革命的勝利，目前西班牙合法政府能夠抗禦在國際法西斯武力積極支持下的叛軍的進攻到一年以上而仍得穩固存在，——這些事蹟顯然不是由於單純的軍事力量的優越，而亦由於有千萬人億萬人的浩大強烈的民衆運動之巨力的支持。蘆溝橋事變發生以來，敵國的軍閥法西斯政府瘋狂似地做種種顛倒事實蒙蔽真相的宣傳，以刺激其人民的情緒，發動民衆的政治力量，藉此來增強自己的侵略陣勢。強大的侵略者尙知運用這一着，處於弱國地位而爲自衛，爲正義而抗戰的我們，自然尤其需要動員全國廣大的民衆，以填補軍事抗戰的不足而加強全面抗戰的陣勢。

不過我們的動員民衆和敵國的動員民衆，本質上是絕對不同的。因爲敵國的發動戰爭爲的是侵略，是要迫令人民爲滿足法西斯帝國主義的侵略慾而去白白犧牲，

所以它的政府發動民衆，全憑着各種狡猾的欺騙、蒙蔽、造謠和虛張聲勢等手段。我們的發動全面抗戰，却是爲自衛，爲國家的生存，爲整個民族的獨立以及爲全人類的正義與和平，所以我們絕不需要欺騙和蒙蔽，相反的，我們正需要把這種爲自衛，爲民族國家獨立生存而戰的天經地義的真理，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意識中灌輸；把他們個人和子孫的命運跟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緊密地聯繫起來。只有這樣，才能使千萬億萬大衆個個知道自動地，熱誠地參加抗敵救亡的運動，並且能夠自願地爲這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而犧牲到底。

二 政府對民衆運動應取之態度

這樣，在這全面抗戰時期，民衆救亡運動的開放，全國民衆政治總動員的發動，實在是一件爲爭取最後勝利所急不容緩的重大事情了，對於這點大概已無懷疑的餘地。現在的問題是：政府（或黨政當局）對於民衆運動究應採取何種態度呢？

要解答這個問題，必先說明目前政府和民衆的關係。老實不客氣地說，在過去，即從民國廿六年革命告終時起到今春國民黨三中全會以後，我政府和民衆間彷彿築着一堵萬里長城似的，不僅是隔膜而且簡直是對立。但是從今春三中全會閉幕後，特別從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我政府及其最高領袖明白表示「國家存亡已臨最後關頭，此時惟有抗戰到底」的決心以來，民衆與政府間過去所有的某種對立和隔膜，已頓時烟消雲散；同時在國內政治上就形成了空前的事實上的團結統一，內政上這種巨大的收獲無異對今後我們民族國家的前程賜給了一盞照明燈；因而它在我國內政發展史上具有異常重大的歷史意義。這種大團結和統一的收獲，無疑地將成爲今後我民族國策的指路標。我們可以斷然地說，現在我政府當局和人民，在朝的同胞和在野的同胞，已在「抗戰到底」的大旗幟之下完全一致，人民與政府間已無任何的對立。這種良好的關係，就是決定政府對民衆運動應取態度之基礎。

過去民衆與政府的某種對立，是表現於民衆熱烈的要求即速抗日救國，而政府

則受着少數不抵抗主義者，「長期抵抗」主義者，「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主張者以及先安內後攘外的主張者之牽制而對外採取不斷的退讓政策。現在的形勢已完全不同：人民要求全面抗戰，政府也要求全面抗戰，而且已在實行這樣的抗戰；民衆要求抗戰到底犧牲到底，政府也要求而且已在領導和鼓勵這樣的抗戰和犧牲。政府和民衆在最基本的政治意向上已經打成一片。

但是我們能否以現狀爲滿足呢？從爭取「最後勝利」的觀點看來，目前的現狀顯然還遠未能令人滿足。這個不能令人滿足之處，在對內關係上（對外關係姑置勿論）便是迄今尙無民二四，民二五年那樣的普遍全國，勢聲浩蕩的民衆運動。軍事的全面抗戰開始了將近一月，而民衆的政治總動員不但迄未見諸事實，且似乎連提都還未提起。

我們的軍事當局，卜晝卜夜千辛萬苦地佈置長期抗戰的陣勢；前敵的武裝同胞，不顧一切拼着自己的鮮血和頭顱；跟敵人終日終夜地搏鬥，敵人的飛機大砲極

其殘酷的能事在我全國領土內到處轟炸；以及無數無辜的同胞做了敵人槍砲炸彈下的犧牲者。所有這些事實，早就燃燒起了大多數民衆救國殺敵的熱情之火；他們都要求在這神聖的抗戰中對國家民族貢獻一分子的力量。現任民衆抗日情緒的沸騰，已非文人筆頭上的描寫而是普遍全國的事實；他們急迫地要求做救亡工作，急迫地要求組織和領導。但是直到現在為止，黨政當局以及現有的社會救亡團體對於這方面——全面抗戰之極重要的一面——的任務是忽略了。不管當局主觀上對於抗戰的後援工作如何努力，但是至少客觀上對於民衆運動的發動和領導，是做得太不夠的。至於沒有明令大赦政治犯，沒有明令解放和鼓勵民衆的救國言論，組織和運動的自由；這些當然不能歸入客觀情形的範圍中了。

我們要坦白而誠懇地奉告領導抗戰的當局諸公：諸公現在所領導的事業，正是四萬萬五千萬民衆所急迫要求的事業；民衆絕對擁護政府抗戰到底的主張，絕對相信政府的這種主張必能勝利地實現。但正因為抗戰是全面的，是要澈底的，我們就

不能不把各方面的抗敵勢力都盡量地運用和發揮出來。民衆的政治總員動——這一全民抗戰中的極端重要的一面，假如漠然置之不理，那是何等嚴重的損失，何等嚴重的危險呀！黨政諸公或因拘於十年來疑慮民衆的意識，致對現今要想拿救國運動來積極支持政府所領導的救國戰爭的民衆，仍懷着某種程度的疑慮，因而不願於全面抗戰之始，立即斷然而解放，發動和領導全國廣大的民衆救亡運動。這實在由於一種不可避免的誤解，是我們所引爲遺憾的。實則現在的民衆有什麼可以疑慮，他們無非想拿出實力來幫助政府實現抗戰到底的主張而已。

復次，就現在已經存在的一些救亡團體而言，我們往往察覺有以包辦代替領導的現象。例如上海的抗敵後援團體或救亡團體把無數要求工作的熱血同胞，無情地摒之於大門之外；抗敵後援團體的負責者，每每藉「集中」，「統一」爲名以限制和縮小民衆自動的救亡組織和運動。這種事實所產生的直接惡果是「有人無事做」和「有事無人做」；間接地就大大地阻礙了抗戰的進展，削弱了抗戰的力量。這是

何等嚴重的現象呵！我要敬向抗敵救亡運動的領導先生們進一言：我們只要真正堅決地站穩了「抗戰到底」的立場，對於民衆運動就不必有絲毫的躊躇或疑慮；我們必須積極地放手做去，毅然拋棄包辦政策而實行對民衆運動的積極領導！

我們的結論是：當此國家民族的生死關頭，我們以一落後於敵國五六十年的弱國而欲與作拚生死的搏戰，除了用全民和全面的力量，抱定犧牲到底的最大決心之外，便無其他求生之道。要做到這點，只有請政府信賴民衆請民衆信賴政府，在這互相的基礎上，把全國人民都動員起來組織起來，行動起來，以爭取我們的最後

勝利！（文化戰線第二期）

全國動員告國人書（上）

李公樸

——西戰場上的教訓——

導言

自從蘆溝橋事變以後，中國在實踐上起了巨大的變化。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進攻中國本部，中國軍隊開始抵抗，揭開了中華民族戰爭的序幕。兩月以來，由於全國團結告成，以及民氣激昂的結果，中華民族自衛戰事，急轉直下，展開了全國性的抗戰。中國今日已進入一個非常的時期，已開始自衛戰爭來答復侵略者，中國的存亡，興廢，都在此決戰中。

自從戰爭的開始直到今日，無論那一戰區，前敵將士都盡了最大的任務，顯出了民族英雄氣概，作成了民族壯烈的史劇，給與打擊者以嚴重的打擊。雖然在西戰

場上，軍事方面已有很大的變動，但一時的勝負決不能看作定局，民族戰爭的日子方長，而今一兩月的時間，不過是一階段中的一瞬。我們絕不以一時的小挫而對前途生出任何悲感。

動員令下了，不容再有因循，苟且，傷感，空談的餘地。我們今日是迫於生死的關頭，我們今日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切都應為戰爭動員。今日全國國民的生活是戰爭第一。爭取戰爭最後的勝利，是全部生活的最高原則。因此我們對於有關全民族存亡的戰爭，當前每一變動，都應加以最大的注意。

是的，我們對於抗戰的實現是表示歡狂。對於全國精神團結，我們自然非常欣慰。對於全民抗戰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尤覺非常慶幸。對此領導，我們更致最大的敬意與擁護。然而，我們對於當前的戰爭，都不能不用冷靜的頭腦，嚴肅的眼光去觀察；我們對於戰爭的實踐，要有正確的認識，系統的認識；我們對於戰爭中勝利的經驗，與失敗的經驗，都不能忽視，我們尤其重視失敗的經驗，慘痛的教訓。

我們艱苦的日子方長，但我們要用自己的血換來的教訓，武裝我們自己，去換取敵人更多的血液。

我們要認識現實，但我們同時要改變現實。我們自己有了認識，我們應站在民族國家第一的立場上，指摘一切錯誤，爭取現實的改造。

自抗戰爆發一直到今日爲止，我們不能諱言，我們尙未進展到真正全民族的全面抗戰。戰爭並未按照全民族的佈置。戰爭的動員，還祇限於軍事的部份。政治，經濟，文化，民衆的動員，是不夠，就是還未開始，其他交通，技術亦甚落後。戰爭的準備，戰術的確定，都嫌尙帶消極意味，不是積極的攻勢。總括一句，今日尙沒有動員全民族的力量作一系統的戰爭。這是當前這一階段戰爭的特點，也是最大的弱點。

這一弱點，明白的反映在西戰場上。

我們爲了了解西戰場抗戰的實踐，特從第一戰區，來到第二戰區，我們作了一

月的旅行。現在我們願將一月觀察所得，西戰場上抗戰的實況，以告國人，同時願將這次抗戰軍事變動的主因，作詳細的說明。我們滿腔熱忱的期望西戰場上慘痛的經驗，能為全國之鑒，怎樣用人事可能的速率，改變西戰場上的狀況，以改變當前中國整個抗戰的形勢，此不獨西戰場一方面之福禍，抑亦整個抗戰之關鍵，此正所謂「心所謂危」，不敢不告的意思。我們的話是否不錯，還要希望在實踐抗戰中的戰友們，加以指示與補充。

(一) 西戰場戰爭的總檢討

我們到西戰場來，我們對於前敵作戰一時的軍事的勝負，不給與最大的注意。我們注意的是戰爭發展的前途，西戰場上全部的動員狀況，特別注意成為決定戰爭勝負民衆的動員。所以我們對於西戰場不僅注意前方，同時更注意指揮前方的戰區中心以及後方。我們不僅注意政治，經濟，民衆，文化，交通，技術各個部份的動

員的程度，同時我們尚注意這些方面的聯繫，配合。因此，我們的觀察是綜合的，不單是注意某一面。因為我們認民衆動員是這一綜合的戰爭組織的中心，所以我們特別以西戰場的民衆運動作主要的中心。

西戰場的狀況是怎樣的呢？

戰爭的失利，陣地的改變，以及一切情況，均暴露了這方面政治，軍事，經濟，民衆動員諸方面不可寬恕的弱點。我們今日主要的是爲了檢討這一戰爭組織狀態，致敗的基點，找出一點戰鬥的教訓，不是要歸責任何個人，所以我們今日的指摘，完全是爲了真實，不是攻擊任何個人。這一點希望西戰場上的負責人，特別給我們寬恕與諒解。

西戰場本身的弱點，自然一般方面與以上我們指出的這一階段中全國共同的弱點沒有什麼不同，不過，不同的是程度之差，有些弱點在這裏特別顯得厲害些。

先就軍事說，軍事的動員的本身，據前敵將士告訴我們，在這裏就表現非常弱

點，如軍事指揮的不統一，軍隊性質的龐雜，軍隊首腦與首腦間在某方面尚不免磨擦，形成幾種對立。軍隊作戰的能力不齊一，士兵生活待遇不一，因此，預先作出的作戰計劃，不能配合前進；說到前敵作戰的情況，許多人都不免幾分憤慨。公忠爲國的壯士在敵人高壓的炮火下受了巨大的犧牲，但也還有人在那裏保全實力，他的隊伍完全無恙，這是非常痛心的現象。

這樣的軍事動員也夠說明我們的陣線的脆弱了。不，還有比這更危險的現象。那就是西戰場的戰爭只是單獨的軍事行動，民衆是完全與軍事沒有配合的。千百從前線帶傷回到大同的兵官，衆口同聲的說，前敵的失敗，一小半是某某部隊的靠不住，軍隊不夠支配，過去沒有做工事，一大半是沒有取得民衆的幫助。第十三軍從軍部的高級士兵到伙夫，他們都認識得很清楚，沒有民衆幫助，不能作戰。

許多傷兵傷官告訴我們，我們的軍隊是在自己的民衆堅壁清野下作戰！前綫一帶變成了十室十空，無人烟的荒野，即偶有未逃跑的村落，亦完全在漢奸的監視

下，民衆即令自己想挺身幫助運輸或建築工作，亦畏於地主的淫威，不敢出面，因為大村落的地主的家奴中藏有漢奸，他對村人說：「我們要維持中立」，致使人民無法與軍隊在作戰上配合起來。

民衆爲什麼不起來幫助戰爭，打殺漢奸，而要逃亡呢？

士兵們都衆口同聲說，不是老百姓不好，這是因爲民衆沒有組織，無教育。地方官吏在戰時，不獨沒有減輕人民的負擔，其中有些還藉着軍事，自肥其身，實行無報酬的徵役，叫老百姓帶三天口糧來做工，隨便徵發牲口，巧立名目，加添苛捐雜稅，促使人民害怕戰爭，被逼逃亡，同時地方官吏的無識，對於敵人空襲，過大的誇張，警察挨家叫老百姓逃亡，弄得人民狼狽萬狀，逃亡載道，加之前線敵人炮火轟炸甚烈，我們對於難民完全沒有救濟，因此人民看了戰爭能逃的都逃了。

中國軍隊因爲設備不好，對於衛生救濟，每軍中均極薄弱。譬如第十三軍六團有位連長說，他們每一團所有的抬床就只有三副，但火線上每一次交鋒下來，傷兵

傷官一來總是成千成百，因爲人力不夠，致重傷的官兵，大多無法救出火綫，不得被棄置，死亡的屍體更是堆積如山集，無人過問。這些事務，本來老百姓可以幫忙的，但是火線區域，老百姓早被敵人的炮火和不良的官吏打開了。

軍隊在一百五十里內無兵站，在敵人火力最盛時，給養常常發生困難，幾天士兵得不到一飽。傷兵只得連爬帶滾，在那寂寞無人烟的荒野淒涼地掙扎，卽令不死，也找不到飯吃，買不到食物，甚至要找一口水喝，也不是易事！許多斷手斷腳從南口徒步逃到大同的傷兵淒涼的對我們說：「許多同志，在路上餓死了！也有因爲傷口沒有醫治，痛死了的」。其悲慘之狀，令人不能想像！這些英勇的，能受一切苦難的鬥士，他並不怨恨政府，他們都認識這是沒有人民幫助的結果，民衆沒有動員配合戰爭的結果。

是的，西戰場陣地這樣飛速的變化，是因爲沒有動員羣衆。這不僅限於以上諸點，主要的還在主力戰外，我們沒有武裝民衆，發動遊擊戰爭擾亂敵人後方，和測

面牽制敵人的兵力，相反的敵人反利用了我們落後的民衆作漢奸，在在擾亂我們的陣地。據一位連長說：「我們不怕飛機大炮，怕的是漢奸。因爲前線漢奸如麻，我們陣地內，凡新的工事一做好，敵人的飛機就在天空出現，重炸彈就如雨般的下來了」。這是非常可驚可懼的現象！

直接影響前線作戰的還有交通。在西戰場的交通說來也很可憐，除平綏線較好外，（現在已完全受敵人控制了）同蒲線是被世人稱爲玩具的鐵道，此外汽車道之惡劣，恐怕也爲全國之冠，在大雨時，泥濘沒輪，兩車相遇，常途爲之阻。在大同放棄的第三天，八路軍要想趕赴前方，支持殘局，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尙只運輸一師餘三分之二，其餘二師之衆，無法前進，不得不走慢步了。

這是前線，至於後方呢？

我們想就政治，經濟，民衆三方面來說。整個西戰場的政治機構，實在不能領導這樣的一種戰爭。在戰爭中，已充分暴露這一機構的腐爛，人的配置不當。這些

弱點閣主任傅主席自己十分明白，這一政治機構是處在阻礙民衆的動員，經濟動員，軍事上充分的動員，處處阻礙閣主任傅主席的改革的理想實現。

但是這有什麼辦法呢？最高負責的人，即令有許多明見，個人却不易一時能將這一個老班子去掉。

民衆動員在西戰場的負責人也感到重要，還是因為軍隊在作戰中消耗太大，消耗了自然要補充，可是，現在招兵已不如從前的時候，却感困難了。在山西因為閻先生糾集不少全國有爲的青年，組織「犧盟」（犧牲救國大同盟），這一個團體雖然在今日中國，能夠充分利用民族聯合戰綫的組織的原則的，還是唯一的團體，可惜所受的限制太多，所能引起的作用還不大。它尙不能掀動西戰場內廣大人民起來保衛冀察晉綏。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倒不完全是這一個團體領導不健全，而是受了當前政治的限制，它不能對當前的政治機構用鬥爭的方式進行改造，對於動員民衆的前提的改善人民生活，它無決定確定權力。雖然在西戰場有了這樣一個團體，到

今日止，還不能動員廣大的羣衆，配合戰爭。

因爲戰爭抽去這一偉大的人民的力量，戰爭在組織方面乃不能不形成與昔日內戰無本質的區別，以之抵禦頑強的敵人，不能不生出今日軍事上的變動。

（以上所舉事實均係就九月十四日前的狀況而言，從大同失守後，閻先生對綏晉更有改革決心，如優待士兵條例已頒佈，民族革命戰爭總動員委員會有新決定，以及八路軍參加到前線，犧盟全體動員到前線工作，縣知事部份的更換等，全部情勢已有改變）。

從西戰場我們考察所得到的結果，使我們認識抗戰第一時期的幾個特點。第一，民族內部的團結雖告完成，但政治機構尙未有新的改變，所以有的政治機構，缺乏領導全民族抗戰的力量，在戰爭中已無情暴露出來要求政治機構的改變，這是當前最迫切的事，同時在這裏已告訴了我們，政治機構的改變，當於抗戰中完成。今日大家都明白，當前戰爭組織方面的一切弱點，歸根結底都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所謂政治機構的改變，是以民族團結，聯合救亡爲最高原則，而以實現民主爲它的方法。第二，要實現政治的機構改變，一面是各黨派各軍事實力者以民族國家第一的立場，以爭取戰爭勝利，而以和平協商的方式達到。一面是澈底的開放民衆運動，用羣衆的力量，實行各地機構的改造。第三，政治機構的改造，實現民主，開放民衆運動，在當前各個地方的當局，都感覺有他的需要，不過，各人的感覺強弱不一罷了。在戰爭最前線，有被敵人佔去的地帶，或已變成了敵人的後方等地，實行的限度，實行的決心，比較能堅決，臨近戰地次之，真正的後方又次之。我們在這種形勢下，認出政治機構改變的過程，將隨戰爭的展開，因部份的完成而達到全部過程的完成。這是整個抗戰的發展在認識上的一個基點。第四，要達到戰爭全部組織的改善，當然我們中心的任務是要爭取政治機構適應領導戰爭，其他如經濟動員，軍事本身的改造，也多由政治決定。但要達到這一方面的勝利，最後還決定於民衆動員，廣大的民衆組織的力量。所以目前在人民方面，我們最緊迫的任務是如

何動員民衆，如何組織民衆，擴大民衆組織諸方面。第五，當前戰爭組織方面各種缺點，是由以上各種任務，本來應在戰前完成而沒有完成的結果。當前有的弱點，也不是不能克服的事，改變戰爭的形勢是要趕快完成以上的任務，加緊作長期抗戰的迅速準備。（抵抗十八號）

全國動員告國人書（下）

李公樸

——統一戰線下的民衆運動——

（二）統一戰線下的民衆運動

動員全國人民到戰爭中來，才能進行民族的長期抗戰，已經是一個無可爭辯的真相。參加前敵的作戰的將士，已十分感到沒有老百姓幫助不能作戰。地方軍事首腦已經明白戰爭的消耗，沒有補充，不能繼續作戰。其他如政治，經濟等動員，沒有民衆意識的參加，都會變爲一句空話。開放民衆運動，雖然在有些人還在考慮，但他們却不能不認識人民是戰爭中最大的力量，孫中山先生的「喚起民衆」，以及「工農政策」的真理，在此時，不由得不再引人回憶，被人重新提出。

現在的問題不是一般人看不清這力量，而是因爲有些人還怕這力量。爲什麼怕

呢？那還是這十年來不幸的中國內部所發生的對立，那慘痛的經驗，尙未完全忘記。今日我們首先要全國上下，對於當前的民衆運動，要有新的認識，要丟掉過去的成見，同時也要求全國民衆工作者，同樣有新的認識，新的工作方式。

今日民衆要組織，要求組織，是爲了挽救民族的危亡。爲了進行全民族的抗戰，不是爲了進行政權的鬥爭。所以今日朝野對於民運的了解，首先都不要忘記今日全民族救亡的統一戰線這一最高的政治原則。我們的民運是在這前提下進行，政府今日不能不開放民衆運動，這不僅爲了戰爭的需要，同時也是實際的事實，你不要民衆運動，民衆自己也要起來運動，因爲今日政府無權拒絕人民愛國，人民自己也有權力起而參加救亡事業，組織自己成爲戰鬥的力量，至若爲了防範民運而非民族利益的前途發展，或一時流爲幼稚的行動，政府一方面給人民組織的自由，但同時政府有權力在旁監督糾正。在民衆方面，我們却應澈底了解今日民運的任務，是在集中力量，爭取戰爭的勝利，我們對於領導戰爭的政府，不僅不應生出不應有

的磨擦，同時應避免一切磨擦，加強政府對戰爭的領導。在民衆運動方式方面，我們感覺要有新的方式的必要，一切本於民族利益，互以真誠相見，沒有什麼事不能公開，對任何人，任何黨派團體，都沒有什麼成見，我們今日祇有一個目的，打擊敵人，此外一切家事，現時都可用和平方式解決，也決不能，也不允許在這共同對付強敵前，採用互相對銷國力的方法。

全民動員不是一句空話，要人民都爲戰爭動員，先要民衆有組織，民衆有教育，組織民衆，教育民衆首先要民衆組織的自由。不允許民衆有組織自由，那等於不要民衆，取消全民動員，也就是間接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增加了敵人侵略的優勢，因爲單是軍力的對比，原來敵人是高過我們的。

但是單是了解民衆運動的重要，而不具體的認明中國今日政治，社會的實踐，運動發展的實際的環境，那也是不夠的。我們不能忘記，我們當前的政治機構尚保留有許多一時尚難克服的既成事實，全中國各省區尚保有各種不同的環境，我們運

動的方式自也不能平衡的發展，不能用同一方式同一進行的步驟；我們的運動，要能很靈活的運用環境的彈性，採各式各樣方式，達到各種環境下民衆都能動員起來。自然，這是一種藝術，是這一時期的特點。

固然，我們極端盼望政府從中樞起，實行中山先生的遺教，恢復中山先生對民衆運動的正確的策略，迅速頒佈戰時改善人民生活優待軍人家屬，削減人民負擔等法令，給與人民組織的自由，在全民動員的號召下，掀起民衆救國的高潮來，發展全國民衆的運動，一直達到武裝人民參加抗戰。但是如果全國規模的運動一時不克實現的話，我們也不能等待不動。我們要最實際的說明今日一切可以組織民衆的可能，充分利用它。

按照今日中國政治，社會的狀況，我們看出今日民衆運動有下面幾種可能。

第一即各地由下而上的民衆固有組織，如職業的組織愛國的組織等，這些組織都是民衆自己組織起來的，過去自己已有一些教養，這些組織是今日民運的細胞，

真正民衆的力量；在這些組織，自然應在此時期鞏固自己，擴大自己，並要求政府從旁給與幫助。在政府方面亦盼能利用這些組織，擴大民衆組織，作全民動員的基本部隊，應該放棄過去許多成見，回到北伐時期國民革命的階段，自己起來領導這一種運動。

第二，某些特殊地方已有的由上而下的羣衆組織，這些組織大半雖帶有官辦的性質，運動的本身原有一定的限制，但在今日民族危亡的階段，我們對於這些組織也不應加以攻擊，我們雖然一面希望特殊地方，能夠改變對民衆的態度，讓民衆自由組織，但同時我們也不宜與這些官辦團體對立，因爲在今日，我們大家的目的是對外超過對自己的一切。這種官辦團體，只要它想在民族戰爭中盡它的力量，它本身也就是一個戰鬥的組織，我們正應該參加進去，不宜抱旁觀的態度。我們要擴大和加強它的工作效力。如果是一個「辦」而「不幹」的團體，它對當前戰爭完全無幫助，那它自然會在抗戰中滅亡，我們不必歧視它。

這樣的特殊組織，在今日許多地方都存在着，而各地方又各有它的環境，它的特點。我們利用各種環境，各種可能，把這些組織，變為最大可能民衆機關，使它在質的方面，慢慢起着變化，成為各地民衆動員的司令堡。

第三，除開上面從民衆組織的性質區分外，也還有地域的區分。譬如戰區與後方的區分，同一戰區又有火線區域，已落在敵人手中的地帶，臨近前線及戰區的後方在實際上會成為戰地軍事組織的一部份。這一種組織，在今日晉綏即包含在民族革命戰爭總動員委員會中，成為動員委員會之一部份。非戰爭區，民衆運動自然還是獨立形態，運動本身是在動員羣衆，教育羣衆，不是像前線所採的直接加入作戰的形態。在已被敵人陷落的區域，民衆運動當與當地的遊擊戰爭配合，自然它的本身即是直接戰鬥的團體。

我們希望熱心從事民衆運動的人，不要因為當前各地許多不很滿意的現狀灰

心，我們在西戰區一月觀察，我們對民衆組織的現狀自然也不滿意。但我們看出戰爭將打破現狀改善現狀，譬如，在綏晉、大同被陷以來，「民族革命戰爭總動員委員會」提出的工作綱領，我們相當的能夠滿意。因此，我們對於全國民運也一樣，在戰爭持續延長下去，隨着政治機構改變，各地人民組織力量加強，人民對抗戰的積極性加強，也許由許多不同的出發點而發生的民衆運動，將走到一條爲民族爭取自由解放單純的道路去。所以我們對於前途，是不應悲觀消極的。

將全國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結合成一個力量，它的本身就是一件艱苦的工作。所謂動員全民族的力量，並不能看作一篇宣言，一道警告，大家就手挽着手聯成一道鐵環。這條民族鐵環，一定可以結成，但是要由無限的辛勤，在抗戰中形成之。

(三) 我們的期望

最後我們對於最高的當局，各地方當局以及各軍事首領，尚不能不進一言。今日中國民族的命運既然決之於戰爭，而此種神聖事業，全國人民無不希望完成於諸公之手。今後凡能堅決領導戰爭而能取得人民信賴者，人民無不擁護之尊為民族英雄，凡無抗戰決心，無正確認識，不足領導戰爭之人也決不能長居領導地位。戰爭的實踐，現實的歷史，對於每一個人都是同樣的公正，同樣的無情，今日人民對於政府，在抗戰的條件下，是只有擁護，與加強領導，決無相違與之磨擦，減弱領導之理。人民現以誠意擁護政府，政府對於人民，亦應完全信賴，給與人民民主的自由，以加強人民對政府的信心，也同時是加強政府的力量。

今日，我們說一句心坎中的話，在這兩個月來，在戰爭上所表現的，我們對於戰爭的準備是太不夠了。我們不是說，戰爭來得太快，這時還不應用戰爭答復敵人的侵略，而是說，我們要趕快在抗戰中準備。我們的弱點無足為諱，我們要虛心的承認，西戰場上的弱點，我們不能說只是一隅的現象。這種弱點，現在已得着血的

教訓了。我們不怕失敗，怕的是不能接受教訓，改變現實。我們平心靜氣的說，我們能讓戰爭繼續保持過去一月餘在西戰場上所發現的弱點麼？政府比人民明白，自然所了解西戰場的情況，比我們更真切。我們看了這種情形已經不安，已經爲之顫慄了。

我們亟盼我們的戰爭能轉入一新的階段，有更廣大的動員，但我要告訴諸公一句話，我們絕對不能忘記人民的力量，是唯一可靠的力量，十三軍有位下級軍官告訴我們，他說：『我們能戰勝敵人最大的力量，是真能做到全民族的動員，全國人的組織力，而日本都不能做到』。這是一句實在話。至於軍事上一時變化，也不是着重在一時的勝負，而在戰爭的組織的不善這裏面含有一個很大的危機。我們已說過，西戰場主要失敗原因可說是在單獨的軍事行動，脫離了民衆，是所謂政府的抗戰不是全民的抗戰一點上。這是值得大家玩味的。

有些軍事領袖，對於軍隊的補充很担心，他們看了自己的部下天天喊動員民

衆，而民衆並不起來，因此不安，而至錯怪了人民。這裏也可以用十三軍一位士兵的話作答。『不是老百姓不好，而是老百姓無飯吃，老百姓被當地的貪官，劣紳，壓迫得動都不能一動』。不僅如此，現在『老百姓還要受漢奸威脅』，這也是完全正確的。老百姓有了飯吃，有了相當的民主自由，有了組織，有了接近政治的機會，老百姓自然會風起雲湧來當兵。我們不愁中國沒有人當兵，只要我們不見於望人民。

所以我們在要求政府看重人民的力量外，希望同時能重視改善一點人民的生
活，注意動員全民的這一個先決條件。

全國人民不僅是民族的力量，也是加強政府領導的力量，我們滿腔熱忱的期
政府好好的運用這種巨大的力量，完成民族自衛戰爭的勝利。

- 一，全國不願當亡國奴的同胞起來！一致爲民族戰爭的勝利鬥爭！
- 二，實現孫中山先生革命主義與革命政策！

三，開放民衆運動！

四，全民動員成功！

五，民族自衛戰爭勝利！

六，中華民國萬歲！

（抵抗十九期）

從抗戰中得來的經驗與教訓

藍天照

(一) 抗戰中現露出來的幾個弱點

從過去二個多月的中日戰爭中，我們得到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和教訓。這些經驗和教訓，平時不容易發見，也不容易得到。敵我二方的一切優點和弱點，只有在真實的交戰中，才能一件一件畢露出來。現實的經驗是最好的教育，也是最好的理論基礎和工作指針。

我們的抗戰是長期的堅苦的工作，在長期抗戰的路程中，我們要隨時隨地體驗事實，隨時隨地檢討自己。我們平常所作的準備和所觀察到的現象，不盡可靠，不盡真實；只有在現實的戰爭中，我們所觀察到的和所感受的一切，才最為準確，最為可靠。在這國家民族底生死的決鬥中，我們如果發見了自己的強點，應當立即加

強起來，以期更加有利，如果看出了自己的弱點，也應當毫不忌諱地立即改正，以免再遭損害。根據過去二個月的戰事經驗，我們已經發見了自己的若干弱點：

第一個缺點就是政治上的失敗。根據過去二個多月的經驗，我們在軍事上的準備和戰績，是比較可觀的；但可惜一切政治設施不能和軍事動作完全配合；而且許多軍事上的失敗，都完全基因于政治上的失敗。平津的失陷，不在于廿九軍不能抗戰；而在於締結『塘沽協定』，『何梅協定』，以及設立『冀察政委會』等等一貫串的政治上的慘敗。假如不是冀察政治組織變態；假如中央軍不撤退；假如一切軍事要地不被敵人豫先佔去；平津決不會丟失得那麼快；廿九軍也決不會失敗得那麼慘酷。最近平綏線方面的失利，事實上也不是軍事失敗，而是政治失敗。蒙古民族被敵人利用來打我們自己，是一個最大的政治失敗；劉汝明貽誤戎機，輕易放棄張家口，也是種因于腐敗政治上的禍根。至于京滬一帶的漢奸百出，也很顯明，不是單純的漢奸沒有良心的問題；而是我們自己的政治工作不夠和人民生活太苦的問題。

題。

第二個缺點，是民衆沒有動員。我們只看見單純的軍事抗戰；廣大的民衆力量和軍事力量，完全沒有結合起來，因大多數的民衆都顯示着無組織，無訓練，無政治覺悟，無堅定的愛國熱忱和民族意識。平時的一些民衆團體或行幫組織；完全不合戰時需要。待抗戰爆發後，雖然在忙亂混雜中新成立了一些救國團體，但也缺乏領導中心，不能表現什麼力量。而且目前的救國運動，還只在較大的城市中；愛國熱情的激流，還只波動于知識分子，學生羣衆及城市居民中；而佔民衆大多數的，並且在長期抗戰中具有最大作用的農民，至今還沒有普遍的民族意識的覺醒。現在這種民衆動員的情形，和一九二五——二七年當時的民氣比較起來，真是相差太遠了。

第三個缺點，是毫無戰時經濟的準備。戰時與經濟的關係最密切；平時的經濟組織與戰時的經濟組織大不相同。在日本，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便在非常時經

濟與準戰時經濟的口號下，從事種種戰時經濟的準備。但在我國，對於戰時經濟却毫無準備。抗戰爆發，無論在前方，或在後方，我國的一切經濟情況，都陷于極端混亂的狀態。大小生產機關完全停頓；一切日常用品價格，逐步騰貴；海陸交通多數隔斷，國際匯兌和對外貿易，漫無統制；各地工商業大都停止活動；有些農產品價格極端低下，幾乎無人問津。凡此種種現象，都深切顯示出我們的經濟，毫無戰時組織與戰時準備。

以上三點，是我們自己在抗戰途中所發見的最大的弱點。除此之外，當然還有許多次要的缺點，如教育文化的混亂與散漫，外交行動的軟弱的無力等等，也都一一表現出來。我們因為有這些弱點，便牽累到整個軍事上的發展，我們為保證最後的勝利，對於這些弱點，不能不加以深切的反省和改正。

(二) 抗戰中得來的教訓

我們在抗戰中發見了許多自己的弱點，同時，也在抗戰中得到了許多寶貴的訓練。第一個可寶貴的教訓，就是我們的國家，在堅決的抗戰途中，完全統一起來了。在這裏，我們一向所主張的「只有攘外，才能安內」的理論，完全得到了事實的證明。血鬥十年的國共二黨，在抗戰途中，重新攜手合作了；從來沒有越過夔門一步的四川軍隊，于今奔出巫山而參加抗戰了。像現在這樣全國一致的大規模的軍事動員，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像現在這樣的政治軍事的統一局面，也是民國以來所未有。這個統一局面底形成，加強了我們作戰的決心和陣線，加強了我們爭取最後勝利的保證和條件。換一句話，就是加強了我們反抗侵略的力量。

從這次抗戰中，使我們更深刻地認識了日本帝國主義從此之後，我們對於日本也要有「再認識」的必要。若干年來，我國流行着二種對日的病態心理，一種是始終希望中日提攜共存共榮，企圖用外交方式來解決中日問題，始終徘徊在「敵乎友乎」的圈套裏。另外一種是恐日病的作祟，對於日本「皇軍」，好像是神聖不可犯

的威力；始終懷着退讓畏縮卑怯的心理。經過這次抗戰後，現在這二種病態心理，都完全被事實所粉碎了。日本飛機在我全國大小城市的絕滅人性的轟炸，絕對證明了日本帝國主義是如何兇惡而不可親；並且證明了日本帝國主義和我中華民族絕對不能共存共榮。同時，在淞滬一帶，我軍英勇抗戰的結果，使得日本的海陸空軍無所措手足；證明了日本「皇軍」也不見得如何可怕。在抗戰中，我們對日本帝國主義有了更深的認識了；我們認識了它是絕對不可親的東西，同時也看透了牠並不一樣可怕。

從這次抗戰中，使全世界更深地認識了日本帝國主義。敵人底殘酷野蠻和絕滅人性的一切獸行，在這次戰事中，完全畢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了。近來世界各國輿論底一致痛罵日本，各國愛好和平的人士和團體，一致主張對日制裁，就證明各國人士對於日本已有更深刻的認識。國際輿論對於我國這樣熱烈同情，是從來沒有過的，國際輿論對於日本這樣深切痛惡，也是從來沒有過的。我們從這國際輿論的

有力的聲援中，增加了我們自己抗戰的信心和毅力。並且更加相信世界上還有真理和正義的存在。

從抗戰中，我們統一了國家，認識了日本，並且獲得了國際的同情。這是我們抗戰的偉大結果和寶貴教訓。祇要我們能更堅決地抗戰，一定能夠獲得更偉大的結果和更可寶貴的教訓。

(三) 怎樣來健全抗戰工作

對日抗戰已逐漸展開為全面戰了，當前最重要的問題，已經不是怎樣去發動抗戰；而是如何來健全抗戰了。前面已經說過，我們底陣綫現在還不夠堅定和健全，甚至還現出了許多嚴重的弱點。我們必須把這一切弱點改正過來。

動員全國民衆來參加抗戰，是當前第一件要緊的事。但民衆決不是隨便可以動員起來，隨便可以組織起來的。他們有自身的要求和自己的利益，只有使他們自身

的要求和利益，與整個民族前途相符合，才能動員他們，組織他們。現在我國一般人民底生活都陷于奇貧極苦的狀態。多少年來，在專制政治之下，他們沒有過問政治的權力；沒有享過政治上的自由和平等，他們除了完糧納稅以外，不知道和國家民族有什麼深切關係；他們只感覺到苛捐雜稅太重，經濟上的剝削太厲害；不曉得帝國主義的猙獰，亡國奴的可怕。因為他們沒有過慣國民的政治生活，所以國家觀念很薄弱，不知道所謂「保衛祖國」，「爭取民族解放」。因他們的經濟生活太苦，他們自身救死不遑，也就無心救國，無力救國了。這是根本問題，是不能動員民衆的根本原因。一九二五——二七年的民氣高漲與現在的民氣消沉底分水點，就在這裏。組織民衆，如果忽視了這個根本問題。想來組織民衆和動員民衆，那真是緣木求魚。

當此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要求全國民衆爲國家效死；必須實行二個動員民衆的前提：（一）政治上的民主；（二）經濟束縛的解放。必須立即實行徹底的民主

政治，給人民以真正的選舉，創制，複決，罷免的權力；給人民以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及救國運動的絕對自由，才能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救國情緒。同時，必須立即實行經濟上的解放，廢除一切苛捐雜稅，減輕人民負擔，改善人民的經濟生活，他們才有餘力來救國。政治上的民主和經濟的解放，是動員民衆，組織民衆的先決條件。

要健全抗戰工作，提高抗戰力量；動員全國人民起來，我們必須要有一個良好的領導的政治組織和經濟制度。在政治方面，現在南京國民政府，範圍龐大，組織空洞，運用不靈，絕對不適合于戰時的需要。爲保障抗戰的勝利，爲增高政治工作的效能，改組國民政府，使其合乎戰時需要，實爲目前迫切的要求。在經濟方面，必須有一個最高的戰時經濟組織，必須把現在許多的重床疊架的經濟機關，如建設委員會，全國經濟委員會，實業部，鐵道部，交通部等統一起來，組成一個集中的統制和管理機關。只有這樣，目前一切混亂的經濟現象，才能剷除。抗戰力量才能

增加。

動員民衆，改組政治組織，統一經濟機關，爲目前增加抗戰力量的最主要的工
作。（文化戰線第三期）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論三種戰爭及其運用

王紀元

將來的戰爭，是怎樣性質和怎樣傾向的戰爭呢？

帝國主義的軍事專家們，對於這一問題的認識有二種不同的意見：第一種見解，以為將來的戰爭，是龐大的大規模戰爭，戰爭範圍，將擴大至生產的各部門；而且，其結果必陷于大規模的持久戰，全國國力都將傾注于戰爭之上。換句話說，將來的戰爭是一種國力戰。

代表這一派見解的軍事專家是德國名將魯登道夫將軍（General Roudendorff）魯氏在其所著的『全體性戰爭論』（Total War）一書中，曾經這樣地說：

「近代的戰爭，其勝負的最後決定，不單在戰線上的戰鬥行為，而在于戰爭所必需的物質的基礎，即：社會的經濟的力量。申言之，一國之工業力、運輸力、農業力、財政力等綜合結成的力量，才是決定最後勝利的準則」。

曾經來華任軍事顧問的德國名將沙克特將軍，于一九二八年在德國門興城演說時，也曾經這樣地說過：「國民全體，應該隨時隨地作直接參加戰爭的準備。吾人之任務，在使全國青年，受軍事教育之訓練，一旦戰時爆發，所有全國產業，都轉換到軍事生產之上……」。

東方的瘋狗——日本軍部——也曾經明白地說明：「今後戰爭，是綜合的國力戰，戰爭的勝負，決不單繫于武力方面。但武力是戰爭的主體，是國防的核心，所以武力的充實，實在是國防上的第一義。不過，同時若不圖綜合國力的充實，那正如畫龍而不點睛一樣……」。

第二種見解，以為將來的戰爭，是極神速的機動戰，最後勝負的決定，將在最短期間內完全實現，其戰爭的方式，將是比較小規模的，完全機械化的特選部隊的戰爭。

代表這一種意見的是德國軍事著述家梭爾登，以及英國的伯納·斯替特（Bern

ard Sturet) 將軍。至于英國的「坦克萬能」專門家弗拉少將，則鼓吹更力。

弗拉少將的理論，是基于科學發明之軍事上的利用立論的。因飛機、毒氣、坦克、死光、細菌戰爭的發明，與大規模的運用，將使大規模的軍隊少了戰鬥上的作用。而選拔少量的特選部隊，就足以控制敵人，完全掃滅敵人了。這一戰爭原則，尤其適用於無充分現代化軍備設施的殖民地或其他半殖民地國家。

無論是前者或是後者，依照帝國主義的軍事專家看來，弱小民族是永不會亦不應該有翻身的餘地。因為它沒有充分現代化的產業組織，沒有充分準備的軍備設施，如果一旦「不識相」而要與強國相對抗，那是自取滅亡之道。中國的軍人中，中了帝國主義的軍事理論家的毒素的，一定不乏其人。

我們如果單純地依照這一原則立論，那非流于悲觀主義的陷阱不可，而產生了聊以自欺欺人的像胡適之一類的「等待五十年之後，再來拿回滿洲」的論調不可。再悲觀一點的，就會發出：「又又麻將，國家事，管他娘！」的自願做亡國奴的音

調來了。

將來的戰爭，果完全決定于「唯武器論」及「唯經濟論」的基礎上的麼？

我可以直截了當地回答：「不然」。

固然，我們認定：武器的優良與經濟的供應能力的高強與否，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因素，然而，這一主要因素的決定，還應該通過國家機構的力量。不然，敵人的武器，可以變成我們的武器，敵人的經濟供應力，會變成了我們的經濟供應力。武器與經濟供應力，一定要通過政治的組織力，才能堅不可摧，牢不可破。

魯登道夫及其一羣的戰爭理論體系，是建築在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戰爭基礎之上的。我們站在弱小民族反帝戰爭的理論體系上，應該認定戰爭的形態有三種：

第一是武力戰爭，

第二是經濟戰爭，

第三是政治組織力的戰爭，（包括思想戰與政略戰二者）。

由這三種形態綜合起來，而成「全體性的戰爭」(Total War)。而後一種政治組織力的戰爭的運用，尤為決定前二種戰爭的基石。

什麼是武力戰爭呢？這大概誰都知道的，武力戰是軍力與軍力的對比，這一戰爭的形態可以分爲三種：一是陸上戰，一是海上戰，而另一則是空中戰，這三者同時運用起來，則變成了立體戰爭。

陸上戰的戰鬥方式是：(一)平地戰或山林戰，(二)各種陸上化學戰，(三)在戰線內の間諜戰與宣傳戰，(四)破壞敵國要地的戰爭。近來因爲軍事科學的發達，陸上戰必須和空中武器配合起來，才能充分發揮其威力。

海上戰的方式，是：(一)艦隊間的戰鬥，(二)海軍要塞之攻擊與破壞，(三)本國間海上交通的掩護，敵國交通路的遮斷，(四)敵國要地、艦隊根據地的破壞。要海軍能充分發揮其戰鬥力，亦非佐以空軍不可。

空中戰的方式是：(一)空中戰鬥，(二)敵國要地的空襲，(三)擔任戰線

內的宣傳戰的任務，（四）空中防衛本國的要地。近代國家戰爭，很少以空軍單獨力量，爲戰爭的主體的。

什麼是經濟戰爭呢？經濟戰爭的目標，不單是實行國內的經濟統制，以便在戰時的物質資源，可以自給自足，而是進一步企圖打破敵國的經濟，使敵國的國家組織崩壞。至少亦應使敵國的戰爭行爲陷于困境。這是經濟戰略的重心。其主要手段第一是破壞敵方的經濟力，擾亂敵方經濟；第二是對敵國施行經濟封鎖，第三是以更厲害的手段，對付敵國對我的經濟封鎖；第四是敵國戰費籌措的設法阻礙，第五是自國戰費籌措的圓滑完成；第六是總動員資源之獲得與保持；第七是國民生活的安定。保障軍事妥密進行。這七點如果能完全做到，那末，在經濟方面即可制敵入于死命，于武力戰爭的進行，更可順利地遂成了。

在目前國際關係異常複雜的情勢之下，經濟戰爭的進行，是有相當困難的，如何才能圓滑與巧妙地運營，那有賴于國內自身政治組織的健全與否，有賴于國際間

外交手腕的利用的。

最後：我們要問：什麼是政治組織力的戰爭呢？比較具體地分析起來，政治組織力的戰爭，包括三項內容：第一是外交戰，在可能範圍內，與敵方利害關係相反的國家，訂立軍事互助同盟，或其他類似的協定。在可能範圍內，使與敵方素來保持極親善關係的國家，到此刻變成了中立，或者直接間接對我們予以相當援助。在可能範圍內，使原來取中立靜觀政策的國家，到今日則不約而同地加入我們的陣綫與敵方取敵對行動，至少亦可給我們正義的援助。

我們且看一看我們今日的四週，與日本帝國主義利益絕對相反的國家有蘇俄，與日本帝國主義互相競爭權益的國家有英、美等，與日本帝國主義臭味相投的國家有德、意二國。我們處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外交出路之何去何從，是顯而易見的事。我們的外交無一敵國，就是德、意二國，在重分世界殖民地資源，在厲行法西斯政治的過程中確和日本沆瀣一氣；但是，在發展遠東市場的過程中，他們的利益始

終是不一致的。這裏儘有我們的圓滑運用的餘地。

我們今日的外交關係的運用，最基本的是在於我們有沒有焦上抗敵的決心，有沒有爲抗敵而犧牲一切的決心。決定了這一指標，那末很快地就可以定下我們的外交國策，我們的對日本態度，如果只是取「水來土掩，兵來將擋」的消極和猶豫行動，那末，走向來一貫的倫敦路線，是不算錯的，因爲中國的抗日，原是消極的。然而，坦然地說，這是誤盡天下大事的。這不過是叫敵人慢慢的進，而我們則慢慢的退的政策。

如果我們的抗日政策是澈底的，那末對外對內，都應該有更澈底更堅決的態度和事實來表現。對內，當局應該站在第一線上，積極地領導民衆、組織民衆、武裝民衆。免得弄成今日大多數熱血青年有請纓無路，報國無門的苦悶。對外，應該明示各國以澈底抗日的決心，告訴各國我們是再無妥協或商量的餘地的。除非日本自動把日本軍隊退出去，自動地把東北四省，平津冀東交還中國，才可從容談判，這

樣國際間的沉悶的調和空氣，根本就不會老是籠罩在我們的左右的。同時，與蘇俄的關係，則應該迅速地由平常的友誼關係，轉度到軍事性的結合關係。我們相信，只要我們有澈底抗日的行動表現，對蘇俄的軍事性結合，並不困難。老實說，日本仇視蘇俄，比仇視中國更來得利害，而六年來日本的囊括東北四省，攫取華北，主要的固然在吞併全中國，而另一方面，亦在完成對蘇俄作戰的具體計劃。

政治組織力的戰爭的第二項內容是內政戰。明白地說，便是利用敵方各政黨關係的矛盾，挑撥在野政治團體的反政府行動，擴大敵方內部的壓迫與被壓迫的矛盾關係。內政戰是利用敵方內部經濟利益的不平衡，政治思想的衝突，社會機構的鑿柄，遲滯等現象而運營的。

凡是一個侵略的帝國主義國家，其政策多為極少數財閥、軍閥、政治家所操縱，而與大眾的利益相矛盾扞格的，在日本這種現象，暴露得更明白。這是日本帝國主義挑撥對外侵略戰爭最基本的弱點。至於我國則不然，抗日則全國立刻統

一，對日抗戰愈緊張，統一愈堅強，現代國家組織愈完成，擁護政府和信仰領袖的信心愈鞏固。因為這是民衆和政府的血和淚的結合。

政治組織力的戰爭的第三項內容是宣傳戰，宣傳的目的，是在喚起國際間對我的同情，渙散敵國內部的結合，使心理戰爭的作用，我方取得絕對有利的地位。

第一次大戰期間，協約國的所以能夠戰勝同盟國，德國的所以受各國人民所共棄，其重要的關鍵在於協約國方面宣傳手段之巧妙地運用，卒使非洲、美洲和印度人民都歷盡艱苦，犧牲一切而願爲其宗主國效命。甚至素來毫無關係的我國，亦有五百萬華僑參加作戰。及戰爭結束，英、美、法、日、意、諸國的眞面目完全暴露出來，大家才叫上當，這完全受宣傳所蒙蔽的。這種蒙蔽眞相的宣傳政策，當然不是我們在抗敵過程中的手段，我們的宣傳政策，是在把眞相向外界宣示，用眞實來換取國際間的同情。

以上是三種戰爭形態的扼要的敘述，我們運用這三種戰爭的手段，應該是一貫

地連繫的。軍事上我們採取持久作戰的方式，以消耗敵人的國力，使敵國人民疲于供應。經濟上我們竭全國的財富，用在神聖的對日戰爭上；同時儘量破壞敵人的經濟來源，杜絕漢奸的資敵以糧或其他物質的行爲。政治組織上我們充分發揮我們的優點，而且圓滑地運轉外交關係，一面竭力揭破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這三種戰爭是不能缺一的，而且不能分開的。我們應該充分發揮我們的三種武器的力量，來獲取對日抗戰的最後勝利！（八，二五夜吳淞血戰聲中）

爲民族解放而戰爭

白濤

戰爭是可惜的，和平是可愛的，有五千年文化歷史的中華民族，一向酷愛和平的精神簡直成了一種民族的特性，然而現在是被日本帝國主義者逼得我們不能不用最後的戰爭來保衛我們國家了。

這種戰爭就叫做民族解放戰爭，雖然是不得已的，然而神聖的，全中國的人民爲了要保衛自己的國家都不能不參加這種神聖的戰爭。是的，我們應該爲民族解放而戰爭。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要求生存的話，起碼必得有幾個最低限度的條件。就近代一般國家所具備的條件來說。領土、主權、人民就是最低限度的三個條件。我們中華民族既然是一個近代的國家，不待說這三個最低限度的條件是絕對不可缺少的。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却採取了一切野蠻殘酷的手段來佔領我們的領土，侵奪

我們的主權，屠殺我們的人民，直使我們亡國滅種以遂其吞併亞洲的野心。

中華民族既是一個五千年文化歷史的民族，他不但對於過去的人類社會有過偉大的貢獻，就在將來的世界地圖上也要占光榮燦爛的一頁。偉大的中華民族，是絕對不能讓日本帝國主義者來滅亡的，只有舉起民族解放戰爭的旗幟去答覆牠的佔領、侵奪和屠殺。

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動員了全國的力量來滅亡我們中華民族了，以前發生的蘆溝橋事件不過是佔領平津和冀察的開端，接着全國各地都要遭受牠的殘殺和侵奪，中華民族的最後關頭是已經到臨了，全民族的一切有血氣的人們，趕快武裝起來跑到民族解放的戰場上去吧！

在這個民族解放的戰爭當中，不待說全民族的精神力量是一個決定勝負的重要因素。這就是說，中國的軍事設備還不如敵人，但一般人民及士兵的熱情和憤怒却要勝過敵人萬倍，單是憑這點熱情和憤怒所凝結成的犧牲意志，亦可以操得最後的

勝算。不過，戰爭究竟是一切力量的對比，各種正確的認識和估計還是必要的，所以當着我們拿起刀槍走到戰場上的時候，首先必須很冷靜地考慮以下的幾點：

第一 戰爭應該是全部的而不是局部的

自甲午戰爭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便看透了中國一盤散沙的弱點，所以一方面採取以華制華政策，挑撥中國內戰，坐收漁人之利，一方面採取個個擊破政策，消耗少數的兵力，換得中國大部的土地以作爲下一次進攻中國的資本，九一八事變便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最成功的一個傑作。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竟毫無損失地節節地侵略了中國數省的土地和利權，因此便率性提出了許多滅亡中國的條件，要中國政府公然承受，一旦所求不遂，又馬上用武力威脅地方。利用地方軍人的得失心理來取得地方局部的權益以達到其蠶食的目的，此次蘆溝橋事件即不外這套把戲的重演。然而我們應該知道，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所以老是玩這套把戲，而且

一玩就得成功，完全是由於我們的不抵抗和局部抵抗所招致來的。假如當着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候，我們就全面的抗戰下去，即使我們成了一個戰敗的國家非獨將東三省交給敵人不可；但那時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受的損失一定比我們還大，我們還有機會休養生息去收復失地。現在呢，日本帝國主義者不但沒有受着損失，而且利用我們東北的人民和物力來進攻我們，使我們連一點準備的時間都沒有。倘若現在我們還不全面抗戰的話，而使廿九軍個個兵士都能爲國犧牲，但敵人以一國的力量，動員了幾十萬軍隊來對付我們一軍，結果還是非慘敗不可的，那時候平津一被敵人佔領，中國的鐵道交通完全隔絕，華北各省失去聯絡，敵人再包圍各省實行各個擊破的政策，我們就要全面地抗戰也不可能了。所以目前我們必須馬上全面地抗戰下去，不要再蹈過去一切失敗的覆轍。

第二 戰爭應該是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

我們本來是一個酷愛和平的民族，對於國際間一切慘無人道的戰爭素來是反對的，但目前日本帝國主義者既然逼得我們不能不走到民族解放的戰場上去，我們便不惜犧牲一切生命和財產來應付這個神聖的戰爭。刀槍拿在侵略者手中是犯罪的，但拿在自衛者的手中却是人道的。現在爲了挽救我們國家的滅亡，爲了保衛我們自力的生存，這種民族解放的戰爭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神聖任務，同時也是我們中華民族歷史絕續的最後關頭，我們是不能不盡可能地用一切的方法和手段去獲得最後的勝利。每一種戰爭都有它的戰術和戰略，就一般常識來說，我們也不能只是等着挨打而不去進攻的形勢。自然我們是被侵略者，一切戰爭的發生都應該由侵略者負責，我們只是應戰而非求戰，但只要別人一向我們攻擊了，我們便應該馬上舉行反攻，占取戰爭上一個有利的地位。我們應該澈底明白，這一個神聖的戰爭，決不是一種敷衍、寒責、了却心願的行爲，而是求得中華民族的自由、獨立和解放的大事業，最後的勝利比目前的戰爭還更重要，所以在每一個戰略或戰術上不容許有一分

毫的讓步和疏忽。爲了占取戰爭上有利的地位，我們隨時隨地都應該變被動的爲主動的。如果完全站在被動的地位，待敵人需要停戰的時候就停戰，待敵人大舉進攻的時候才應戰，這只能說是敷衍塞責，結果只有失敗，我們是不忍再見這種戰爭的。以前蘆溝橋和整個平津的形勢，實在比戰爭的時候還要危險嚴重得多。我們應該馬上變更那種形勢，不要坐等敵人深築壕壘再來攻擊我們。

第二 戰爭應該是自主的而不是依賴的

近代的國際關係是非常複雜錯綜的。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自然不能脫離國際的影響，尤其是應該取得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主持正義的人同情和援助，但我們應該有自主的能力，不可存一點依賴的心理。九一八事變以後，我們曾經依賴過國聯，但國聯使我們失望了，現在我們却千萬不可再失望一次。明確點說。在戰爭當中，爲了種種關係，我們可以聯合友國去打擊敵人，乃至於和利害相同的國家訂立

攻·守·同·盟·，·但·一·切·計·劃·和·行·動·必·須·是·自·主·的·，·不·要·作·了·別·人·的·計·劃·和·行·動·的·附·庸·。
譬·如·舉·一·個·例·子·來·說·吧·：·這·兩·年·來·中·英·的·關·係·總·算·是·不·錯·的·，·但·如·果·我·們·處·處·都·去·
依·照·英·國·的·計·劃·和·行·動·便·會·上·當·。·最·近·舉·行·的·英·日·談·判·和·艾·登·外·相·對·於·盧·溝·橋·事·件·
的·談·話·，·就·是·給·我·們·的·一·個·很·好·的·警·告·。·我·們·只·可·利·用·英·國·與·日·本·的·利·害·衝·突·，·來·
增·厚·自·己·的·力·量·，·削·弱·敵·人·的·力·量·，·但·不·可·被·她·利·用·去·作·討·價·還·價·的·勾·當·。·而·且·，·
在·戰·爭·展·開·以·後·，·我·們·還·要·嚴·厲·拒·絕·一·切·帝·國·主·義·者·的·干·涉·，·並·謹·防·那·些·可·以·結·勾·
日·帝·國·主·義·者·作·間·諜·的·外·國·顧·問·等·等·。·自·然·，·同·時·在·另·一·方·面·我·們·還·得·自·主·地·聯·合·
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而·其·同·奮·鬥·。

第四 戰爭應該是決死的而不是倖存的

中國是弱國，在軍事設備上遠不如人，自然不能隨隨便便將整個民族的生命拿去一擲，但事實上是能不能真的得到一個偏安之局，讓我們從容準備作戰。就拿準

備一點來說，也是一個不合算的打算。東北四省是整個失掉了，冀東和察北兩個傀儡政權，又成了敵人今日侵略我們華北的根據地，平津迭次漢奸的蠢動和去年偽匪進攻綏遠，都是這個不合算的例證，幾年來的痛苦經驗，已經使我們覺悟了絕對沒有妥協偏安的餘地，目前唯一的道路只有全面積極的抗戰。即使中國節節抗敵下去終是不免滅亡，但那時却有兩個結局：一個是敵人和我們一道滅亡，一個是我們被敵人滅亡而敵人却已消耗元氣淨盡。就前一個結局來說，至少我們出一口大氣；就後一個結局來說，到底我們還比較容易再生。兩人決鬥，往往總是不怕死的得着勝利。挽着衣袖一同滾水，這是弱者對付強者的唯一方法。目前中國四萬萬人應該除掉與日本共同生存的僥倖心，而抱定與日本一道死亡的堅決意志，不苟且，不偷安，準備一切爲中華民族的生存而犧牲。只要中國四萬萬人都抱定壯烈決死的精神而沒有一點倖存的企圖，那些貪得無厭，好大喜功的帝國主義者未必敢來侵犯我們，這樣一來，中華民族便可以從死中求生了。（大道第八卷第五期）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

進 化 書 局 新 書 預 告

唯物辯證法講話

永田廣志著

施復光
鍾復亮合譯

西洋哲學史

秋澤修二著

施復亮
寇如松合譯

東洋哲學史

秋澤修二著

啓哲尊譯

日本獨占資本發達史

瓦茨淮格著

鍾復光
曾波清合譯

日本歷史綱要

康拉德等著

王永煦譯

日本歷史讀本

王漁邨
李文泉合譯

貨幣與信用

卡茲洛夫等著

陶遠
陳建晨合譯

國際金融論

陳建晨著

俄國通史

樸克羅夫斯基著

胡伊默譯

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緒論

許德珩著

土地問題小叢書

黃松齡等編

外

交

請政府速定外交國策

胡愈之

一 外交國策是必要的嗎？

外交國策是不是必要的？這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

一個主權完整的獨立國家，必然而且必須有確定的外交國策。譬如在大洋中航行的船舶，必須有確定的航線。譬如一個意志獨立的人，對於職業或事業，必然有確定的計劃和企圖。只有一種國家，沒有確定的外交國策，就是半獨立國家，或半殖民地國家。半獨立國家或半殖民地國家並不是不需要確定的外交國策，但因爲這些國家主權不能獨立，所以外交國策也不能獨立。這些國家在對外關係上頭，只好俯仰由人，讓帝國主義隨意擺佈，這樣就說不上有什麼外交國策。

但是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或者要竭力爭取獨立自由的國家，外交國策却是絕

對必要的。因爲假如沒有外交國策，應付對外的一切事變，就沒有一個預定的方針，勢必至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但在平常時候，不能有充分的外交準備，在發生意外事故的時候，也不免手忙腳亂，倉皇失措，甚至於一切外交行動互相矛盾，互相抵觸，有外交竟不如無外交。

不但如此，在現代國家，不但國防是全民的國防，政治是全民的政治，外交也應該是全民的外交。所謂全民的外交，就是說，全國國民對於對外關係，有共同的立場，共同的認識，並且以共同的行動，來作政府外交的後盾。因此也就必須預先有了確定的外交國策，才能把政府和全國國民的步調行動，完全一致起來。所以爲了內部的團結和對外的一致，外交國策的確定，也是絕對必要的。

但是另外有兩種說法，認爲外交國策，並不是必要的，即使有必要，也決不能公開宣佈。我們再看這兩種說法，有根據沒有。

第一種說法認爲外交政策應該隨機應變，而不是固定的，刻版的。因此確定的

外交政策，不但難可能，而且並非必要的。這一種說法，是把外交國策和外交行動混合起來。外交國策和外交行動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外交國策是根據民族意志和國情來決定的。國情又包含歷史條件，地理環境和國內的政治社會制度等要素。這些雖然不是永久不變，但是斷不至於早晚不同。尤其是民族的意志，在一個相當的長時期內，是決不至隨便變更的。例如法德兩個民族相互仇視的意志，經過一百多年並沒有消滅。英國期望保持海上的霸權，經過數百年都如此。因此根據這些不變的民族意志和國情，決定對外關係的原則——外交國策，是絕對不可能的。反之根據此種外交國策所採取的外交行動，則儘不妨因時制宜，千變萬化。所以認為外交行動應該變動不居，因此主張不要確定外交國策，這一種說法，當然不能成立。

第二種說法，認為外交當以國家利益為前提，於必要時儘不妨出以詭秘，甚至越秘密越好。要是預先宣佈外交國策，對方既已洞悉底蘊，勢將無從出奇制勝。這是一種主張秘密外交的說法。秘密外交實際上是一種帝國主義的外交。帝國主義外交

的目的，是戰爭和侵略，這原爲國內國外的民衆所反對，所以必須保守秘密。反之，弱小民族，或民主國家，根本上不需要有什麼秘密外交。因爲弱小民族的自衛行動，民主國家的和平政策，本無不可告人之隱，只有採取完全公開的方式，才能引起全世界的同情，以增強外交的力量。要是採取秘密外交，反不免上了侵略國的圈套。至於外交機密，有時不能洩漏，但這和所謂外交國策完全不同。因爲外交國策是指對外關係的原則，在這中間，斷無機密可言。所以認爲外交應該秘密而反對確定外交國策，也絕對不成理由。

二 我們有沒有外交國策？

外交國策是不是必要，既然不成爲一個問題，現在我們要問的是：中國究竟有沒有外交國策？

我們要是甘心自欺欺人，我們儘不妨說，我們已經有了外交國策。但是說一句

老實話，却不能不承認，直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一個外交國策。

中華民國創立已經二十六年了。可是不幸得很，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憲法；我們還沒有一個民選的代議機關；我們還沒有一個充分強大的國防軍備；甚至我們還沒有一個明白確定的外交國策。

這是並不足怪的。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以來這一百年中間，始終沒有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國最初發生對外關係是被動的，歷來中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是被動的。因此中國的一切對外政策也完全是被動的。清代末年所謂以夷制夷政策，實際上就是「受制於夷」。在北洋軍閥時代，內政部受帝國主義的宰制，外交更不用說完全執行帝國主義的命令。直到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公開宣佈了對外政綱。這對外政綱的主要點是聯合全世界被壓迫民族，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這可以說是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所手定的對外國策，也就是中國第一次公開宣佈的對外國策。可是在當時中國國民黨還沒有提得全

國政權，對外不能取得代表全國的資格。十五、十六年，國民黨北伐勝利，南京政府成立，但因對內採取反共政策，影響到外交方面，以至國民黨原來的對外交綱，不能澈底執行。十七年的濟南慘案，十八年的奉聯戰爭，充分表示出中國依然沒有確定的外交國策。在這時期中間，一面和蘇聯斷絕邦交，一面唱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高調，一面又縱容各帝國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侵略。外交國策不確定的結果，使日本帝國主義得以乘虛而入。到了二十年，便發生了民國歷史中所未曾有的重大事件：東北四省，因不抵抗而遭喪失。九一八以後，中國最初打算倚賴國聯，以解決中日問題。後來發現被帝國主義操縱的國聯，並不能幫助中國奪回東北四省，於是在外交上竟至手足無措。甚至連抵抗侵略收復失地這一點民族自信力，都完全失掉。二三年前，竟有許多人提出「敵乎友乎」的問題。一個國家，對於直接行使侵略的國家爲友爲敵，都沒有一致的認識，又從那裏去談外交國策，前幾年還有許多人爲了東京路線、莫斯科路線、日內瓦路線而爭辯着，這尤其證明了中國並沒有

確定的外交國策。

因爲沒有確定的外交國策的緣故，所以一般對於外交的意見，非常紛歧，非常不一致。在這幾年以來，當局和在野方面，流行兩種完全相反的見解，這兩種見解在表面自成一說，在實際上却把一般國民在對外問題上的最低限度的共同認識，弄模糊了。所以應該特別提出來檢討一下：

第一種見解可以稱爲無抵抗主義的外交。就是說，中國人是愛和平的，中國是和平的國家，所以一切國家都是中國的友邦，卽使是直接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的國家，也並不是例外。因此卽使事實上是我們的敵國，我們也不能拒絕和它攜手。這種無原則無保留的『敦睦邦交』政策，實際上只是一種不抵抗主義的外交政策。這樣不但增長了侵略國的氣燄，而且認一切國家爲友邦，等於沒有一個真正的友邦，也就等於孤立外交斷不能成爲一種外交國策。

還有一種見解，可以稱之爲『自力更生論』。這在表面和不抵抗主義的外交，

完全相反。而在實際上，這兩種見解，却同樣的否定了外交的本質。自力更生論者，認爲一切的國家都不可倚靠，中國只有倚靠中國自己。這原沒有錯，本來一個國家都只有倚靠自己的力量，求生存和發展。可是一個國家要是不能閉關自守，便無法避免國際的關係。在國際關係中間，要是不能利用各國間的衝突矛盾，本國的生存發展也便一無保障。假如依照極端自力更生的說法，簡直就不必辦外交，就不必有外交部和駐外使節。所以就整個國家的政策來說，自力更生是當然的，但是把自力更生當作一種外交國策，那就等於否定外交國策，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

三 怎樣決定外交國策？

再看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宣言中所指出的「對方針」：——

「吾人始終如一之目的，厥爲對內求自立，對外求共存，即使蒙受損害，超過忍耐之限度，而決然出於抗戰，然亦祇有自衛之心，絕無排外之意。故犧

牲之決心與和平之期望初無矛盾。……至於其他國際關係，自當循國際和平之路線，力謀友誼之增進。凡政治的協調，經濟的合作，必本兩利之原則，以求相互關係之日趨於密切」。

在這裏第一段說明對日關係，只指出了和平與抗戰兩者都有可能，但是「忍耐之限度」在那裏，「和平」和「犧牲」的限界又在那裏，宣言裏面並沒有明白指出。至於「本兩利之原則，以求相互關係之日趨於密切」，原為一切國家對外政策的本來的任務。因此三中全會宣言雖然透露了一些政府自衛抗戰的決心，參加國際和平線的企圖，可是這些至多不過是應有的外交概念，如果說是外交國策，那是絕對不夠的。

要怎樣才能算得是外交國策呢？

第一，外交國策應該是整個民族意志的表現。一切民族都有共通的意志，就是求生存和發展。但是除了這共通意志之外，每一個民族根據獨特的歷史地理條件，

都各有獨特的民族意志。外交國策首先必須把這些獨特的民族意志，充分表現出來。不然就不能算作「國策」。比方說，英國是一個島國，英國人民有一大部分是依靠航海貿易爲生的。因此保護海上的貿易道路，成爲英國外交國策的基調。大戰後的戰敗國家，對於擺脫和約束縛這一點，抱着非常堅決的意志，所以修改和約成爲主要的外交國策。美國由於獨立戰爭的慘痛經驗，最痛心疾首的，是歐洲國家的干涉政策，因此使以門羅主義爲外交國策。沒有一個民族，沒有共同的對外意志。不顧到民族意志，根本就不成爲外交國策。

第二，外交國策要和國內政策的目標一致。反之，國內政策也應竭力求和外交國策相適應。嚴格地說起來內政和外交不過是達到一個共同目的所用的兩種不同的手段。拿法西斯國家來說，唯一的政治目的，是在發動戰爭，製造戰爭，因此在內政方面必然要實行獨裁，壓迫民衆，在外交方面必然要破壞一切保障和平的約束。反之，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對內對外，都以和平爲目的。因此在國內自然傾向自

由主義，在對外自然傾向集體安全主義。所以決定外交國策，必然同時應該把國內政策一併加以考慮，以免對內對外政策中間發生矛盾和衝突。

第三，外交國策是根據各國的民族意志，國家需要和特殊國情來決定的。所以各國的外交國策，儘可以有種種不同。但是就一般的傾向來說，現代國家外交政策却不外三種原則。

(一) 孤立政策 像英美過去的外交政策，主張對一切國際關係，儘可能保持中立，或者像瑞士、比利時那樣保持永久局外中立。

(二) 同盟外交 這是一種帝國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主張聯合一部分帝國主義國家，以反對其他國家。同盟外交是以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人民的利益爲其犧牲品。

(三) 集體安全制度 和同盟外交完全相反。主張結合一切大國小國，共同保障和平與安全。

這三種外交政策中間，孤立政策事實上已成爲過去的落後的政策。由於現代國際關係的複雜，空軍戰術的進步，無論何國，已不能以自力單獨保障本國的安全。連英國這樣的強國，也不能不放棄其「光榮的孤立」地位，其他國家更不待說。因此現代外交政策原則的決定，不外同盟外交和集體安全制度這兩種。前者是舊式的侵略的外交政策，而後者是大戰後產生的和平的外交政策。

第四，決定外交政策，必須根據目前階段的國家需要，而確定一個立場：不是進攻的立場，便是防守的立場。一個國家需要內部建設或者遇到外來侵略的時候，應該採取防守的立場，而對於國際局勢主張保持現狀。反之，在內部建設已告完成，國力充實，而國家對外需要還沒有達到目的的時候，當然採取進攻的立場，要設法變更修改國際的現狀。舉例來說，德意兩國以及在大戰後受和約束縛的國家，在外交上採取進攻的立場。但是法國的外交却始終採取防守的立場，就是維持現狀主義。

四 我們需要怎樣的外交國策？

我們需要怎樣的外交國策？這本不是本文的目的。因為外交國策，應該由政府作最高的決定，而且要確定一種適合於目前中國需要的外交國策，決不是這一篇短文所能濟事。但是根據上節的說明，我們却可以想像出中國外交國策應有的一個輪廓。現在寫在這裏，以供一切研究外交問題者的參考。

第一，中國民族對外意志，這已經由過去二三十年以來不斷發展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事實，充分表現出來。中國民族運動的目的，在於解除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一切壓迫搾取，在使中國由半殖民地國家而成爲獨立自由的國家，這一點已經是沒有疑問的，而且中國民族除自求解放之外，絕對不願意威脅任何其他民族。中國所企圖的是遠東和世界的和平。而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却是和平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所以中國任何時期，任何種的對外國策，都要以民族獨立自由與和平爲其基

礎，這是絕不成問題的。

其次說到中國的國內政策，倘使依照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政綱，目的在於建立民主共和國，同時實施社會改良政策。因此要使內政外交趨向共同的目的，我們的外交政策就應該傾向和平與自由，而和現世界的民主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互相攜手。反之，對於法西斯獨裁國家，斷沒有發生密切關係的可能。這也是十分明白的。

第三，說到三種外交政策的原則，孤立政策本來已是過去的落後的外交政策，而且中國的地理位置，國防實力，國際環境，和英美瑞士比利時都不相同，中國要是採取孤立政策，就等於自殺政策。因為中國即使要孤立，帝國主義決不會讓中國孤立的。除這以外，同盟外交也決不是中國所能採取的。中國不是帝國主義國家，沒有資格和帝國主義國家訂結平等的相互的同盟，假如訂結這一類的軍事同盟，就是拿自己當作帝國主義的犧牲品。因此，中國的外交國策，除了採取集體安全制度

的原則，別無他途。而且集體安全制度和中國民族的和平意志以及民主政治的要求，也是完全適合的。

第四，中國自廣州國民政府成立，以至九一八爲止，國民黨的對外政策，採取了進攻的立場，就是變更現狀的立場。因爲當時帝國主義各國正在穩定狀態，而中國亟需恢復已失的主權，所以外交活動，集中在廢除不平等條約這一點。但是從九一八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作大規模的不斷的進攻，這時中國一面需要抵抗侵略，一面需要經濟建設，培養國力，因此在一般對外政策上，自然只有採取防守的立場，除了對於已失的領土主權，抱收回的決心外，對於其他非侵略國的關係，自不妨以維持現狀爲滿足，自然，這種防守的立場，並不是放棄中國民族解放的一切基本要求。但爲應付國家民族的緊急危機起見，却無妨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工作，從緩進行，以避免陷於外交的孤立地位。

從上面所提出的幾點，我們可以設想，中國的外交國策，應該包含以下的幾個

具體原則：

(一) 以對日本帝國主義，實行堅決的民族抗戰爲手段，求貫徹中國民族獨立解放的目的，並確保遠東和世界的和平。

(二) 不惜一切代價，以求收回九一八以來喪失的國土和主權。

(三) 以中國爲中心，聯合英美法蘇等民主國家，促成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的建立，藉此以增強國際聯盟及其他國際和平事業的力量。

(四) 在抗戰時期內，除日本帝國主義外，其他外國在中國的權利及利益，中國暫時不要求變更現狀。中國並歡迎日本以外的國家，尤其是各民主國，給予資本援助，以完成中國的國防建設。

五 結 論

自從最近華北事件爆發以來，一切對於侵略國家妥洽的幻想，一切委屈求全苟

安旦夕的迷夢，全被華北日本駐屯軍的大砲，擊得粉碎了。政府軍隊和民衆已一致表示了發動民族抗戰的決心，在這時候，除了軍事和政治上的加速準備外，有一件最迫切需要的事，就是對外國策的決定和宣佈。我們不能否認，我們到今天還沒有一個爲全國上下一致認識的外交國策。外交關係整個民族的生死存亡，我們不能永遠含糊了事。而且中華民族所要求的只是國家的獨立自由與和平，所以更應該把這些正當要求，向全世界公開坦白地提出，使國內政府與民衆對外認識獲得一致，使外國一切公正輿論對中國增加同情，更使敵人因此而寒心。總之，在這發動全民族抗戰的前夜，外交國策和憲法有同樣的重要。國民大會固然應該除製憲工作之外，同時決定外交國策。但政府却不妨在目前立即決定宣佈外交國策，等到將來，再請國民大會加以追認，總之在目前，決定抗戰和決定外交國策，都是非常迫急的事，早決定一天，對於國家民族，就減少一天的浪費和損失！

對於上海抗戰應有的認識

錢亦石

上海抗戰，已於八月十三日爆發了！這是我們給日本帝國主義的總回答，這是中華民族一鳴驚人的第一聲！

在八月十三日以前，中國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六年之內，失掉四分之一的領土，這一段屈辱的歷史，真夠我們痛心！但到了八月十三日，是中國歷史的轉變點，是中華民族做奴隸或做主人的新界線，我們踏進這個轉變點，我們越過這個新界線，一個偉大的時代已到來了。從前我們在侵略者的前面屈膝求饒，今後我們要驅逐侵略者；從前我們是『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今後我們要收復一切失地；從前我們所受的屈辱，是痛心，今後我們要揚眉，要吐氣。

上海抗戰是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與敵人搏鬥的起點，橫在我們前面的是戰場，是大砲，是血跡，是火光，同時也聽到自由平等的呼聲，也看見勝利與光榮的

遠景。

自上海抗戰爆發到現在，已過了半個月，因為軍事當局的動員迅速，因為前線將士的英勇犧牲，因為廣大民衆的積極擁護，在上下一心全國一致的條件下，我們已獲得初步的勝利了。當這半個月中間，雖然在戰場上堆積不少的血屍，有大批的傷兵折了臂，斷了足，雖然在後方，有千百萬的失業者，有像洪水一樣泛濫的無家可歸的難民，甚至有一些友邦的同情者，被大世界誤落的炸彈以及敵人投向南京路的炸彈打死，可是沒有一個人抱怨，沒有一個人悲觀。這次全國一致乃至全世界一致的反侵略戰爭的精神，在人類歷史上還未見過，就說這是第一次，也許不是過分之詞吧！

戰局的發展，以公共租界為根據地的敵人，早在我軍包圍之中，黃浦江上的敵艦不時被我國空軍襲擊，也不得逞，擾亂京杭各地的敵機，先後被擊落與受傷者達八十架，這些鐵般的事實，把漢奸們所傳播的中國不能在目前作戰的謬論打得粉碎

了。近幾日來，戰局的重心，已移到吳淞口沿江岸一帶，但在我國嚴密防禦之下，敵人縱有軍艦與飛機的掩護，仍不易登陸，就算有些地方偶然登了陸，然而也不易「生根」。我們正在用全國的力量與敵人拚死活，祇要有決心「犧牲到底抗戰到底」，一時的勝敗，局部的得失，是無關重要的。根據半個月來作戰的經驗，敵人在吳淞口的企圖，一定要被我軍的鐵拳打破，這種自信力，我們是應該有的。

或許有人說，「一二八」抗戰的結果，敵人不是從瀏河登陸，使我軍全線動搖，不得不自動的撤退嗎？是的，「一二八」抗戰，誠然因瀏河不守而失敗，誠然在失敗後，以簽訂上海停戰協定收束。但這次「八一三」抗戰，的確與「一二八」抗戰不同。第一，「一二八」抗戰發動於十九路軍，未得到中央的全力支持，那是一種孤軍抵抗，至多祇能說是局部抵抗。而這次「八一三」抗戰，誰都知道是中央開了國防會議決定的，這不是局部抵抗，而是全面抗戰的開始。第二，「一二八」抗戰，敵人從海陸空三方面進攻，我國祇有陸軍被動的應戰。這次却不然，我國陸

軍一開始即站在主動的地位，即對敵人採攻勢，又加上神勇的空軍，在天空活躍，使敵人的高射砲失其效用。這些顯著的進步，曾引起外國軍事觀察家的驚嘆。第三，「一二八」抗戰之初，敵人曾誇口在四小時內佔領全上海，有些人在當時都認為中國失敗是必然的。現在呢？情形顛倒過來了，大家所憂慮的問題，不是敵人佔領上海，而是我們在短時間內能否消滅敵人？這種心理的改變，也證明我們的進步是一日千里的。第四，「一二八」抗戰的時候，中央未能以全力支持的原因，由於國內還演着「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悲劇。現在則全中國在「抗日第一」的原則之下，實行鎗口對外了，這即是說，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已團結如一家團結如一人。拿全國的兵力、財力、智力與侵略者比雌雄，勝利之果自然不屬於國內矛盾百出的侵略者。第五，就國際關係說，在「一二八」抗戰的時候，幾個大國同情我們的少，支持敵人的多。近五年來的事變，證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沒有止境，使日本與列強間的矛盾，尖銳起來。加以這次上海抗戰發生以後，日軍的殘暴無所不

至，甚至不宣而戰，封鎖我國海岸，無緣無故的砲擊美國旗艦，用機槍掃射奔走和平的英大使許閣森。因此，以前支持敵人的國家都把臉兒掉過來同情中國了。有以上五點不同，所以「八一三」抗戰決不是「一二八」的重演，所以「八一三」抗戰的血史也決不是「一二八」的續編。萬一吳淞口沿江岸一帶，我們在軍事上有不幸的結果，可是我國全面抗戰的陣線，一定要跟着展開，決不會再來一次上海停戰協定。我們相信政府有「抗戰到底」的決心，就是政府爲民族的前途打算，也應該有這種決心。

前面講過，上海抗戰是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與敵人搏鬥的起點。這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有事實來證明。近半月來，因上海抗戰的爆發，而華北抗戰也一天天的展開了，不僅是展開，我軍已由綏東進攻察北，並且收復商都南壕塹尙義張北等地了。因此，我們不妨這樣說，上海抗戰勝利，即是全面抗戰勝利的起點。

如果有人問：上海抗戰與華北抗戰那一方面重要呢？我們應該確定的回答，敵

人向上海進攻，直接的目的，是擾亂我國的經濟中心，而間接的目的，則在牽制我國的軍力，以便在短時間內完全佔領華北。換句話說，敵人所垂涎的地盤，是在華北，不在上海。所以，在上海抗戰爆發的前後，敵人正在集中全力進攻南口，想用獅子搏兔的手段，打通平綏綫，一方面可以吞併察哈爾綏遠，另一方面又可以分兵從平漢津浦兩綫南下，蠶食河北省南部。這幾日內，青島的局面更嚴重起來，整個的華北快要陷入烽火中了。在這種情形下面，我們的戰略，除調派重兵保衛上海外，同時應該向平綏平漢津浦三路進攻，守住南口，收復平津，予敵人以痛擊。我們必須爭取上海抗戰的勝利，尤其必須爭取華北抗戰的勝利。這兩種勝利是分不開的。假使有人希望把上海事件單獨解決，或者用全力支持上海抗戰而忽視華北抗戰，那是一種不容許的錯誤。

根據上面的估計，我們應該認定：上海抗戰是全面抗戰大鏈條中的一環，決不是僥倖所能取勝，更不是短時間內所能解決，我們要爭取上海抗戰的勝利，必須在

持久戰的局面之下，才能辦到。「流出最後一滴血，戰到最後一條鎗」，無疑的是我國政府與民衆應該共守的信條！

不過，我們需要持久戰，是沒有人懷疑的。現在擺在面前的問題，是怎樣才能實行持久戰？

正確的回答是這樣：實行持久戰，決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除在軍事上總動員，調派全部國防軍速赴前線與敵人角逐外，要集中全國的人力，就必須在政治上總動員，如組織民衆，保障民衆的各種自由，釋放政治犯之類；要集中全國的財力，就必須在經濟上總動員，如勸募救國公債，禁止現金逃避，加緊國防經濟建設，調節戰時生產與消費之類；用政治的與經濟的力量來支持軍事，則軍事的力量才能盡量發揮，我們才可以把敵人拖得精疲力絕，等到敵人精疲力絕的時候，再拼我所有的力量，向敵人的主力猛烈的進攻，以期一舉而消滅它。

光是這樣，依然不夠。我們要抗戰，決不可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必須利用

一切國際的矛盾，接受一切國際的援助，在外交上把敵人的敵人都拉到我們這邊來。日本帝國主義的第一個敵人是蘇聯，所以我們在抗戰時期的外交，無疑的是首先與蘇聯結成親密的友誼，從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到簽訂互助公約，同時再與英美法攜手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

如果我們在軍事上 政治上 經濟上、外交上有一個通盤籌算，各種佈置與行動，都以有利於抗戰為前提，那就很容易實行持久戰了。

我們對於上海抗戰，主張這樣，我們對於全面抗戰也主張這樣。

中日戰爭與九國公約會議

藍天照

一 中日戰爭爲什麼會引起國際行動

最近十日的國際形勢底發展，一步一步地有利於我們。十月五日，羅斯福總統公開指斥侵略者底罪惡；六日美國國務部正式確認了日本爲侵略國，違犯九國公約與凱洛克非戰公約。七日，國聯大會也通過了一個議案：正式譴責日本暴行底非法；勸告各國盡量援助中國；並建議召開九國公約會議。我們暫且不管將來九國公約會議底結果如何：但目前這種國聯和美國底一致行動，至少增進了我們在國際上的優勢，至少證明了中日戰爭已經引起了國際行動。

但是中日二國戰事爲什麼會引起國際行動？英法諸國爲什麼要譴責日本而相當同情於我們？這決不是它們好管閒事，也決不是它們真正主持正義特別愛護中

國。事實上，它們底一切行動都是根據它們本身利益而出發的。最近美國底表示和英法控制下的國聯行動，顯然是由於下面二個因素所促成：

第一、英美法三國在華經營百年，它們在中國已經有強大的政治經濟勢力。它們有領事裁判權，有內河航行權，有駐兵權，在天津上海漢口各處有租界，更在中國各處有幾十萬萬元的投資；它們這種權利決不能忍受日本一步一步的進攻而隨便放棄，中國這個世界無比的良好市場，它們也決不甘心隨便撒手。六年來，日本佔領了滿洲，還想佔領華北，更想滅亡整個中國。日本帝國主義這種狂暴的侵略行為，直接間接危害到英法美各國存華利益。日本在華勢力擴大大一點，英美勢力就弱小一點。這樣，在對華政策上，加強了各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加強了日本與英美之間的正面鬥爭，迫使英美為保持其本身的一切在華利益，不能再事忍耐，不能不有所舉動。這是最近英美對中日戰爭援助積極行動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有幾種國際條約底存在，使得英美法對於日本的侵略行為，也絕對不能

完全緘默。九國公約第一條第一款明白規定「當尊重中國之主權獨立，及領土的與行政的完整」；第四款規定：「當自行抑制，勿利用中國之情形，以求獲得足以減損友邦臣民或市民權利之特別權益或特典，並勿容許有害友邦安寧之行為」。凱洛克非戰公約第一條規定「締約國以各該國人民之名義，鄭重宣言：彼等罪責戰爭，以解決國際爭端，並在相互關係間廢棄戰爭為國策之工具」。同時，國聯盟約亦嚴謹規定各會員國間或與非會員國間的糾紛，必須用和平的或仲裁的方法解決，不能從事戰爭。六年來，日本帝國主義底對華侵略，不僅破壞了中國「領土的與行政的完整」；而且「減損友邦臣民或市民之權利」。日本底行動，顯然破壞了這些條約。英法三國對這些條約都負有重大的責任和義務。它們不能袖手旁觀，完全忽視或默認日本目無「法紀」的暴行。故羅斯福總統演詞中，特別強調維持條約尊嚴與國際法律之必要。因為在資本主義世界，資產階級底一切特權和利益，都是建築在條約，契約或法律基礎上的。如果全世界一切條約都成了廢紙，資本主義的國際

關係根本沒有方法維持；資產階級底利益，也根本要發生動搖。所以，這次英美法三國爲維持資本主義世界底「紀綱」起見，爲維持它們在華的「利益」和「安寧」起見，它們也不能不有所行動，不能不勉強負起九國公約和非戰公約底條約責任，來召開九國公約會議。

此外，還有一點有力的推動國際行動的，就是我們自己堅決抗戰，獲得了全世界最大多數人民底同情，獲得了各國輿論底擁護。因此，全世界公正輿論底督促，以及蘇聯外交底積極支持和鼓勵，也是推動英美積極動作的一個因素。

二 關於九國公約會議的估計

九國公約會議，已有國聯大會通過。不久即將在比利時京城開會了。這次會議，是一種具體的國際行動；不管它對於中日戰爭採取調解方法或實施制裁，意義都相當重大；其經過，其結果都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所謂九國公約，即是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在華盛頓專為中國問題訂結的一種公約。原來的簽字國有美國、比利時、英帝國、（包括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印度、）中國、法國、意大利、日本、荷蘭及葡萄牙等九國。在九國公約簽字以後加入的，還有玻利維亞、墨西哥、挪威、瑞典、丹麥等五國。就九國公約本身的性質來說，在表面上，雖然規定尊重中國領土完整，主權獨立。但事實上，毫無實際的拘束力與制裁力！各締約國對於條約的責任與義務，亦只限於「各締約國間，為無隔閡之相互交換意見」。日本帝國主義底侵略行為雖然公開的破壞了這個條約；但約文上，並沒有明文規定對於侵略國應該怎樣處置或制裁。正因為這個條約太空泛了，太沒有力量了，所以我們的政府，不向九國公約申訴，而只向具有制裁性的國際聯盟申訴；希望國聯來主持正義對日本加以制裁。

現在由國聯出面召開九國公約會議，表面上，似乎國聯對於中日戰爭，還是相當積極！但實際上，是國聯逃避問題，逃避責任，逃避制裁。國聯召開九國會議的

表面理由，是使美國有參與處置中日糾紛的機會，但實際上，又是避免蘇聯來過問中日事件的妙法。今次國聯召開九國會議。可謂極盡狡猾巧妙的外交手腕了。這當然是英國的傑作。

就九國公約本身來說，就由國聯召開九國會議的經緯來說；這次英美所發動的九國公約會議，不容我們樂觀。英國是這個會議底中心，它底行動，可以左右會議底行動。目前的英國態度，祇要它自己底利益能夠保持，祇要國際條約能敷衍過去，它總是趨向於調解而避免制裁的。最近英國人民的反日空氣雖然高漲！但英政府是反對實施經濟制裁的。近日英國的遠東政策，惟一希望是在不損害其利益範圍內，迅速終止中日戰事。因為中日戰爭，對於它毫無利益可言：戰事越延長越擴大，對於它的損害也越大越深。而且在戰事過程中，它自己底處境非常困難。日本勝了，它固然沒有利；中國勝了，它也並不歡迎。如果中日正式宣戰了，日本海軍必然加緊封鎖中國海岸，斷絕任何外國船舶進口。此時英國處境更加危險！若使英國聽從

日本封鎖，則上海租界和香港都將成爲死港，成爲一片荒地；若不遵從日本封鎖，則英國自己有捲入戰爭漩渦的可能。所以，中日戰爭對於英國是一件最煩惱的事情。

現在的英國政策，就是想藉九國公約會議來解除這種煩惱。因爲有國聯處理中日事件，英國有許多困難：一則，國聯盟約明白規定了制裁條款！在國聯責任上，不能避免對日制裁；二則，蘇聯是國聯委員。英國不願聽李維諾夫在國聯大會上的煽動的演說。不要蘇聯來過問中國事件。三則，英國還希望和日本在一個會場上見面，九國公約會議，日本也許有出席的可能。

在英國立場上，九國公約會議對於它是有利的。在這個會議上，有美國參加，在英美有力的聯合之下，比較容易對中日兩國提出帶有強制性的調解方案。因爲目前英國對於中日事件，是希望妥協，調停，而不主張對日制裁。同時現在美國的態度，也很明的趨向於調解而不主張制裁。在這一點，英美態度相當一致。九國公約會議，就是爲適應英美這種調解政策而召集的。它們都恐怕制裁，會引起日本底極

端反動。

所以，現在就一般的趨勢來說，九國公約會議一定是調解性質的會議。十三日羅斯福總統在他的廣播演詞中，對於這點，已說得很明白。他說「未來九國公約會議之主要任務，端在對於中日糾紛，設法調解；在實際上採取壓迫之前，必竭盡一切調解方法，以期覓取方案」。

現在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這個調解問題。在當前局勢之下，在日本帝國主義大風壓境之下，調解底結果，一定對於我們不利。在我國立場上，我們要反對調解。拒絕調解。我們要求英美各國對於違犯條約者加以制裁。目前的國際形勢，英美豈備日本侵略，破壞條約，對於我們是有利的。若是九國公約會議完全採取調解辦法，對於我們却有害。現在重要利害關係，就在這一點上，如果英美對調解企圖不能實現，它們既正式宣佈日本違犯條約，它們為維持外交尊嚴計，對於日本必然還有進一步的辦法，這即是羅斯福總統所說「若九國公約會議調解不成，則美國政

府自當進一步，考慮實際方法，如對日斷絕商務關係」。是的，只要調解不成，只要我們堅決抗戰到底，英美諸國為維持其在華利益，為維持其外交的與條約的尊嚴，它們不能不考慮進一步的辦法，對侵略者予以制裁。九國公約會議未必對於我們有利，但當前的國際形勢却實在對於我們有利。問題只在我們自己如何努力，如何抓住國際優勢而取得最後勝利。

三 我們應當怎樣來應付九國公約會議

九國公約會議不久，就要開幕了。這是一件最當前的國際大事，關係我整個國家前途，我們必須集中一切力量來應付這件大事。

九國會議，在原則上我們應該積極參加。但在開會之前，我們必須作一些必要的準備和工作。第一件要立即做的事，就是在九國公約會議開會之前，應宣佈對日絕交。關於對日絕交問題；以前我也主張應該慎重，應該從整個抗戰前途底利害上

來考慮。但現在英美各國既正式確認了日本是侵略國，我們便再沒有考慮的餘地了，我們只有立即對侵略國斷絕一切外交關係。此時我們宣佈對日絕交，對於九國公約會議有二個重大作用，一則可以斷絕英美的調解觀念。再則表示我們抗戰決心，使英美不敢提出過於不利我國的調解方案。而且中日絕交以後戰事必然更加擴大！可使英美態度更加積極而實施對日制裁。第二種要立即做的事：我們必須向國聯或英美堅決提出邀請蘇聯參加九國公約會議。蘇聯是遠東政治上非常重要的國家，它雖非九國公約簽字國，但它是國聯會員，中國既是向國聯申訴的，它當然也有參加九國公約會議的權利和必要。

對日絕交和邀蘇聯參加，是我們在九國公約會議上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

在九國公約會議中，我們必須利用一切機會，宣佈侵略者底種種罪惡，及其破壞國際條約的種種事實。在根本上，我們必須堅持要求會議對侵略國制裁；我們要指明侵略者與被侵略者之間絕無調解的餘地。

就退一步說，假如英美必定要採取調解的步驟。那麼，我們自己也要提出方案，我們必須要求將中日糾紛從頭算起，必須將收回滿洲問題列入。如果收回滿洲問題撤開的調解方案，我們根本反對。我們這次抗戰，不將滿洲收回，決不能能手。從這次血的經驗中得到了教訓。我們萬萬不能再讓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訓練和組織我們的同胞來打我們自己了。如果我們不立即將東北收回，再讓日本軍閥在那裏經營六年，再訓練幾十萬大兵，那麼幾年以後，日本軍閥可以毫不動手，完全可以採用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毒計，來滅亡中國了。所以收回滿洲問題，是我們在九國公約會議上誓死必爭的問題。萬一各國不能接受我們的要求。就是會議破裂亦所不惜。

總之，現在的國際形勢可以說是對於我們有利的，但勝利的前途，還待我們積極地去爭取。我們必須運用一切方法，打破英美苟安調解的企圖；使它們放棄對日敷衍的態度。在這次九國公約會議中，如果，我們的抗戰能夠表現得更有力，我們

的外交能夠施展得更有效；英美法對日本採取較強硬的措施，並不是不可能的。英法在尼翁會議上所取的堅決行動，也許可以表現於九國公約會議上。

現在日本對於九國公約會議，還沒有確定的表示，還在觀望風色。它參加與否？大概要看最近在上海及華北的戰事發展爲決定。上海戰事它如果打出一個勝利的結果，如果英美事前對它又有相當疏通，日本也許會參加，以期把勝利的事實，擺在會議前面。同時再用些空洞的欺騙的言質，以期得到各國事實上的調解。所以在自後一個月以內的軍事發展，對於九國公約會議結果，有至爲重大的影響。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把軍事動作與外交進展，完全配合起來。我們只有真正「抗戰到底」，才能保障外交上的勝利。（文化戰線第六期）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

注意敵人最近的外交陰謀

王亞南

一 以「持久抗戰」答覆「速戰速決」的效果

中日戰爭延續到了兩個多月的現在，我們與敵人所處的地位，都和戰爭開始時，不大一樣了。這可以由次幾方面得到一個大概的說明：

第一，就戰略上講，敵人對華發動戰爭的主要目的，原本在華北；它其所以在上海方面掀起種種挑戰行動，其用意不外是威脅中國的中央政府，並牽制中國的軍力。同時，中國在上海方面應戰，雖然除了政治的外交的經濟的關係外，還有軍事上牽制敵人的作用，但在戰爭開始的兩三週內，我們不時已聽到「墮敵計中」或「不應與敵人作對陣戰」一類非難，可是到最近，敵人對華北戰事雖達到了「適可而止」的局面，其對上海戰事却陷入了「欲罷不能」的苦境；它反過來以上海戰爭為

決定其華北戰爭命運的關鍵了，於是我們扼着了敵人的痛處，在上海作持久戰，使敵人對華北的戰事，無法結束。而況

第二，就國際情勢講，更增加敵人在這不能速決的軍事上的焦慮了。在戰爭初發動時，它自以為又把握着了「九一八」當時的國際動態，可以肆行無忌；同時在中國方面，亦因我們忽略了「時間」與「自力表現」是獲取國際援助的重要因素，因而感到英美法蘇諸國過於慎重，過於冷淡了。但最近兩月來，國際情勢丕變了。譴責日本，抵制日貨已成爲最大部分世界的普遍傾向。至現在爲止，只獲得了各國精神的援助，可是事實已昭示我們：我們如更能在較長時間內表示自己的決心與力量，我們定可由各國滿足我們所期待的積極的具體的希求。

第三，就國內情勢講，我們亦與敵人在背道而馳。由日本帝國主義者麻醉欺騙的日本民衆，已經在戰爭發展過程中，漸漸警覺過來，因爲戰爭的負擔，戰爭的直接痛苦，特別是戰爭不能照軍閥預示的期間結束，和世界反日局面的展開，使他們

由惶慮而憤怒，而進行各種方式的反帝國主義戰爭的醞釀了。戰爭如繼續下去，他們的不滿與反抗，將益成爲日本軍閥的腹心之慮。反之在中國方面，却由戰爭戳穿了日軍這紙老虎，粉碎了一向由「武器萬能論者」造成的恐日病，同時，在抗戰中表現的力量，表現的團結精神，充分表示中國的光明前途，要在鐵與血的艱苦淒慘過程中爭得，簡言之，就是要持續抗戰，始能集中我們的力量，鞏固我們的團結。

總之，無論從以上那一方面講，我們愈抗戰下去，就愈爲有利；敵人則愈戰爭下去，愈爲不利。所以，我們以「持續抗戰」答覆敵人的「速戰速決」，那是此次對日戰爭的最高指導原則，且是由事實證明其精確不移的原則。

二 敵人「二元外交」的原委及其運用

然而當我們已發現這原則的效用，並打算繼續運用這原則的時候，我們的敵人逐漸由事實上的困難，由中國的堅強的抵抗力量，由國際與國內的惡劣環境，悟到

它是處在被動的不利的地位了，由是，它知道單靠橫蠻的暴力，不夠扭轉當前的逆境，不能達成中國「屈膝」的場面，不會很有利的結束戰爭；結局，繼「速戰速決」之窮的「二元外交」的法寶，又開始採用了。

論到這裏，我得對於它這「二元外交」的實際，附帶略予釋明。日本由其資本主義經濟的落後性與脆弱性，從而，也由其政治組織的畸封建性，以致金融資本不能建立起寡頭支配，以致金融資本家階級的政治統治，處處都遭受封建的軍國主義勢力的劫持。結局，在政府的對外關係上，特別在對華政策上，資本家階級的「利潤」要求，和軍閥的「勳功利祿」及「發揚國威」要求，表示了緩進與急進的參加和磨擦。這是日本的「二元外交」政策的由來。

不過，在這種分析上，我們儘管承認日本政府外交與軍閥外交的相當距離；比如，就目前戰爭的情形說，我們儘管肯定日本金融資本及其直屬政治系統及文化系統的反戰爭動態和要求，但我們却不能因此就忽視它對於這「二元外交」政策的統

一的狡猾的利用。

讀者想未忘記「九一八」事變當時的情形：「九一八」事變的發動，無疑是日軍閥的主謀。最能體現日本金融資本意嚮的當時民政黨政府，大體是持着反對立場的。但對華侵略活動既經發動後，軍閥的那種積極冒險政策，不但爲政府所支持，政府甚且運用它與軍部之間的某種對立，作爲其緩和國際空氣，打開外交僵局的手段，即當時日本政府一方面任軍閥在中國東三省擴大軍事佔領，一方面則向世界直接間接傳出似是而非的淆惑聽聞的消息。表示那種武力活動，全是出於一部分少壯軍人的企圖，使各國把日本政府的責任減輕，並使各國認定操切的制裁步驟，將激動日本國民公憤，致政府更失其駕馭軍人的權力。在各國對遠東政策徘徊不決的當中，這種外交戰略能收到莫大的效果。在實際，日本輕易奪取了東北三省，這不能不說是它的成功祕密之一。此後對於熱河的佔領，對於華北各省的特殊化，一部分都由於它在或隱或顯的運用這祕訣。

不過，日本狡猾運用這外交手段或祕訣的對象，並還不僅是在遠東有利害關係的各國，同時還在其對手方的中國。因為中國方面在遭遇日本侵略的場合，它不能由遠東關係各國獲得積極的支援，就極容易墮入日本所設的這種「玄」中，期望日本政府阻制其軍閥的操切冒險活動。「九一八」以後的一列外交慘痛事實，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由於我們太不肯注意敵人的這一套陰謀。

三 「自動以外交手段結束戰爭」的企圖

可是，在我們方面不論有了怎樣苦痛的經驗，敵人一臨到它緊急的關頭，它自會毫不遲疑的把一向救急的法寶或成功的祕訣運用起來。

據我們前面分析的，日本在戰略上，在國際及國內關係上所處的逆境，正是它軍國主義者「速戰速決」政策敗北的說明。近兩週來，經過日本軍事機關嚴格統制的新聞，及其他言論機關，竟吐露出了一些與軍部意見不一致的消息。本月一日，

日本法西斯色彩非常濃厚的東京都新聞，首先提出了從速結束戰爭的要求；其社論表示：「日政府應事先準備，免蹈往昔日俄戰後東京暴動的覆轍」；並表示：「長期戰爭雖非所辭，但非日本之利，亦非東亞之福，事如可行，俟上海戰事告一段落時，似可由日本自動以外交手段結束戰爭」。——這是從正面表白敵人最近在作何打算。

不能以戰爭結束戰爭，自然祇好「自動以外交手段結束戰爭」。然則怎樣自動用「外交手段」呢？本月四日的東京朝日新聞社論，曾就華北新政權向世界，向中國表示了日本的「王道」與「正義」。它說當前華北的新政權，不求脫離南京獨立，不求日軍久駐華北。但如中國不再考慮其態度，不肯與日本合作，並繼續訴之於持續戰爭，日本就顯然不能撤退軍隊，並還可能的迫而半永久的佔據中國重要地點，以圖控制持續的反抗行動，和促起中國的反省」。

可是日本表示的這種「王道」精神，究還不夠轉圜世界的反日輿論。在國際聯

盟宣佈譴責日本違反條約前一日，即本月五日，美國大總統突然向世界發表了斥責侵略國的演說，接着美國政府於次日正式宣佈日本爲侵略國，說日本「在中國的行動，不合國際關係之原則，並違背九國公約與凱洛公約之規定」，由於美國態度之直角度的轉變，英法蘇諸民主國家，乃都有進一步的反日表示，而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之召集，遂得成爲不久即可實現之事實了。在這當中，各國民間反日空氣的濃厚，和抵制日貨運動的抬頭，更使侵略者於國際名譽的損失外，復對於經濟制裁的前途，抱着莫大的惶慮。

但狐狸精式的日本外交，却仍得面對着這種不利場面，表演其傳統雙簧戲法。羅斯福總統發表其反日演說之次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即以異常橫蠻的態度，表示「日本不惜以戰爭掠取資源」，其露骨闡揚大陸政策，說者稱之爲「爆彈宣言」。可是過了兩天，同一外務省的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却又發表了一種類似更正其發言人之「爆彈宣言」的聲明，表示日本並未違反條約，其曲解事實的措辭，雖

令世界人士聞之冷齒，但其態度却較不橫蠻得多。並且，對於那種「爆彈宣言」，在閣議上還引起責任問題的波瀾；東京朝日新聞等報紙，還有攻擊政府發言不慎的非議。這種紅黑花臉的演出，縱會不完全是故弄玄虛，以淆惑世界人士的視聽，但至少總可表明日本軍閥這時已需要以「外交手段」，結束這非戰爭所可結束的戰爭了。我們可用以次幾件事實，來補充說明。

德富蘇峯是日本的一位以文章報國的名記者，他的言論，向爲日本一般較不進步的社會人士所尊重，對於大陸政策，他是最感興趣的。在前週中，他竟在大阪朝日新聞發表一篇「準備應付最惡時局」的一篇社論，其中指斥「擊敗中國，事件即可結束」的觀念爲狂妄；全文雖在警戒日人如何應付擊敗中國後的問題，但字裏行間却是暗示日本當前應有懸崖勒馬的覺悟。尤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軍部新聞班長竹原的態度；他原是一位澈底膺懲中國論者，他在最近講演中，却表示華北方面日本軍隊現正求與中國主力作一激戰即行結束；並表示中國當局如願誠意合作，仍可提

攜。此外，如起用穩健派宇垣一成等參加國策審議會的組織，亦表示日本在對華問題上，已打算向着如何結束的方面推移。

不過，所有上述的種種事實與動態，都還是日本速戰速決策略的應有註腳。特別是在目前雖明知道戰爭不能結束戰爭，而必得藉外交以繼武力之窮，以達成其「速決」要求，但在華北沒有一個決定的勝利，特別是在上海沒有一個決定的勝利，它知道外交手段無所展佈，所以，它一方面儘管向世界向中國乃至向其國內放出許多緩和的空氣，安排許多外交步驟，並在實際進行某種「妥協」運動工作，但同時却在中國南北部更積極更熱烈的從事總攻擊戰，意謂這兩方面的戰爭一照預定的期間，得到了勝利，已經佈置好的或正在暗中活躍的外交行動就可表面化，就可成就與中國的「提攜」了。如其這兩方面的勝利，而很快的在九國公約會議以前實現，它的成果，就會更加「美滿」。

但可惜這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片面的打算。

四 從那些方面防阻敵人的陰謀活動

日本帝國主義除了用武力宰割我們之外，更圖用這種外交策略來欺侮我們，愚弄我們，但我們已有充分的苦痛經驗了。蔣委員長在本有八日對美國記者談話中，已正堂堂的表明了我們的抗戰態度。他說：「吾人現正奮鬥，必使日本侵略之武力退出中國爲止；吾人爲和平建設自衛而奮鬥之決心，始終如一，雖至最後一人，一寸土地，亦不稍變此旨」。在國慶日前夕，他更表示：「這次抗戰，斷不是一年半載短期間可以了結的事。實際上，蔣委員長並不是以他個人的資格講話，他是以中國全體民衆的代表資格，向世界也向我們的敵人，表達我們全國人民對於這次抗戰的共同決心和信念。

本來，在我們全國上下抱定「抗戰到底」的堅定國策之前，敵人的一切外交陰謀，似皆無所施展，但爲了順利推進戰爭，並加速爭取最後勝利計，我們仍應從以

次幾個方面，嚴密注意敵人最近的詭譎外交活動：

第一要注意：當前的國際環境，已在有利的向我展開。除德意波少數國家外，全世界的輿論，都站在中國方面，並且，還在各方面採取了反抗日本，制裁日本姿態，像九國公約會議的決定召集，至少已表示列強不復迴避中日戰爭問題的干涉行動了。我們如能在這當中妥爲利用外交機宜，定可收到莫大的效果。不過，單就外交方面說，我們固可推動列強積極干涉日本，同時，日本亦會設法緩和英美法蘇諸國對它的積極干涉。在實際上，它已在國際間從事這種活動了：它不但向各國表明它對中國沒有領土的野心，表明對華戰爭即將中止，並還在不久以前，謊稱中國政府有意與它直接妥協。這種種似是而非的欺騙宣傳，大可影響列強積極干涉的決意。而且，除此以外，它還通過其德意法西兄弟，故意在歐洲造出一些牽制英法等國的亂子，使英法等國對遠東問題的處理感到躊躇。凡此種種，都是我們要非常當心，並且要在外交方面加倍努力的。

第二要注意：上海方面的戰爭，當前變成了整個中日戰爭的樞紐。敵人拚死命想從速結束上海附近的戰爭，在它總攻第一次二次直到最近第五次全歸慘敗以後，它似已採取了半分軍事半分外交的策略；一方面打，一方面派遣伊藤等外交界的閒人通過上海的有力外國人，從事斡旋活動。它雖明知道這種活動不會得到結果，但（一）可以投合一部分因產業關係，希望上海戰爭早日結束的外人的心理；（二）可以偽裝日本對於華中區的上海，並無侵略野心；由是（三）可以緩和和日本最近在上海一帶的野蠻行動，所激起外國人士的反感；特別是（四）可以由這種「調解」空氣的散佈，而鈍減中國大無畏將士們的敵愾心。此外（五）幸而上海戰事能照松井司令一再宣佈的預定時間結束，這又不失為一件預備的外交工作了。所以，敵人最近在上海方面的外交上的陰謀活動，我們是不能不盡量設法揭露的。設我們更把這種活動與下述的「顧慮」連繫起來，其影響就非同小可了。

第三要注意：過去中國各社會層裏面，特別是政治組織經濟組織裏面，都滿佈

着對日本特別感到「興趣」的人物，他們在主觀上也許不自認是有「親日癖」，但其言論行動之有利於敵人的加深侵略，那却是千真萬確的。抗日戰爭發生以後，這般人依舊「原封未動」的留在那各社會層中，他們有的也許表示得「非常抗日的」了，但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的骨髓裏面，却會由敵人通過政治經濟權利賂脈，而注入了某種毒汁或不可醫治的病根，一到時候，或者一有機會，他們就不免要舊病復發，而在客觀上（其主觀上的想法，當然聽便）成爲敵人的「內應」，敵人想藉外交手段從速結束這次戰事的場合，這般人的行動，就最值得大家注意，日本帝國主義儘管在國際間散佈欺騙宣傳，儘管在上海方面頻作間離運動，如其我們沒有「內奸」，我們全國上下都表示抗戰到「最後一人最後一寸土地」，它的一切伎倆、將毫無所施了。

所以，在上面三點中，以最後一點最值得注意。我們可以附帶在此這樣指明：以「持久抗戰」答覆敵人的「速戰速決」，是中國此次對日戰爭的指導原則，是中

華民族當前爭取生存的最高原則。在敵人侵略軍隊不掃數退離中國領土的限內，一切中途調解妥協的運動，都是爲敵人運動，都是反民族運動，都是漢奸運動。

我們得以蔣委員長的戰至「最後一人最後一寸土地」的決意，來粉碎並消滅這

種運動。（文化戰線第六期十月十五日）

進 化 書 局 新 書 預 告

哲學方法論

陳此生著

先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史論

拉哈特著

施復亮合譯
鍾古熙

論理學

三枝博音著

寇松如譯

資本論讀本

川上貫一著

葉波澄譯

自然辯證法

岡邦雄等著

潘谷神譯

景氣論通說

岸忠助著

姚芷孛譯

蘇聯貨幣金融概論

哈博特著

藍天照譯

資本主義貨幣制度論

約爾孫著

高叔康譯

科學論

戶坂潤著

李華卿譯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

彭健華著

中國社會史講話

杜滄白著

經

濟

戰時金融問題

馮克昌

自展門了偉大的全面抗戰以來，已經一個多月。我們的金融，賴當局迅赴機宜，立刻頒佈了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自始就似乎非常穩定，這自然是值得欣慰的事。可是在金融穩定之中，我們却不幸看到江浙兩省秋繭登場，承買者寥寥無幾，內地米穀棉花豐收，商人亦多無力採辦，各地工商業，亦很多在半停頓狀態中，有大批員工，或者失業，或者減工。在持久抗戰的計劃下，正應加緊促進生產，而不幸有這些不健全的現象，浮在我們面前，當然是值得注意的。我們試分析它的癥結所在，有一部份或許是受到交通阻塞的影響，也有一部份是由於工商界心存畏懼所致，而其中最大的原因，在金融方面，還有其深刻的內在的恐慌存在，實在是無可諱言的事實。

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在穩定金融，防止資金外逃，節制人民消費這幾方

面，確乎是奏了很大的功效；可是生產資金的活動，也因此受到很大的拘束，這對於產業的進展，影響實亦非小。雖然財政部爲兼籌並顧，已命令中、中、交、農四行辦理貼放，以流通內地資金；但因限制很嚴，在中國現有的金融機構裏面，似乎還不夠活動金融。我們覺得，要謀戰時金融的活動，實在還有另謀有力的補救的必
要。

我們在談補救辦法之前，首先得研究目前金融恐慌的原因，究在何處？我們敢簡單的說一句，目前恐慌的所由起，要不外乎「支付工具的不夠應付」。所謂「支付工具」不夠應付，換句話說，就是通貨不夠應付。通貨何以驟然會不夠應付？照我們粗淺的觀察，不外是由於一方通貨緊縮，而一方通貨的需要反而增加所造成。通貨緊縮的原因，最顯而易見的，第一是戰事開始以前，有將近一萬萬元的資金外逃；第二是人民儲藏現法幣，以備需用；第三是物價略漲，通貨的效用稍減。通貨需要增加的原因，最重大的一點，就是因爲戰時信用恐慌，所有平時在市面流通的大量的

票據，驟然減少，因此現法幣的需要格外加多。在通貨緊縮的需要反增的特殊情形下，當然是要不夠應付了。

我們知道目前恐慌的原因，既在於通貨不夠應付，那麼要消解恐慌，自然就要增加通貨。可是我們應如何增加通貨？這也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們要研究這個問題，不妨借歐戰期內英、法、德三個主要戰國應付金融恐慌的辦法，來做我們的參考。

歐戰時法國所取應付金融恐慌的辦法，最初可說同我們現在差不多。像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頒布的一個命令，就是限定各銀行存戶提取存款的數目，以餘款百分之五為限，並以二百五十佛郎為最高額；惟對於工業的工資，有充分證據提出的，得特予通融，不受限制。但到八月廿九日及十月廿七日，又頒命令將限定支付的最額提高至一千佛郎及餘額百分之五十，——商業需要者且定為百分之七十五。——而此項延長支付存款的辦法，却一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才頒佈命令，

定於翌年三月三十日起實行廢止。不過他們在金融恐慌發生時，就由法蘭西銀行總分支行儘量接受商業票據的重貼現，並且在巴黎特設了一所辦事處，專供了商界人士直接前往接洽貼現。因此從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一日法蘭西銀行接受的重貼現票據，就由十五萬萬餘佛郎增加至三十萬萬餘佛郎，到十一月一日更增至四十四萬萬佛郎。同時因票據可以貼現，票據信用自然好起，在十一月中旬有人估計，除法蘭西銀行所有的商業票據以外，在市面流通的承兌匯票數目，亦有好幾萬萬法郎，因為有這許多通貨流通，所以延期支付存款辦法，不久就修改了。

英國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六日有一個命令，規定在八月四日以前所訂契約，應於九月四日以前償付的款項，一律延期三十天；銀行的存款，也可援用這個規定；惟對於勞工工資，機關薪給，和五英鎊以下的債務等項除外。但是因為同時又規定了一個有效的辦法，准許國庫發行一英鎊半英鎊的紙幣，貸放與各銀行，其數額是按各銀行的存款總額百分之二十，即總共二萬二千五百萬英鎊，因此各銀行並沒有援

用這個延期支付的辦法，僅最多使用了這批國庫的放款一千四百萬英鎊以維持存戶的自由提款，就使一般存戶恢復了信心，不再提回存款。至於工商業方面，則有英格蘭銀行以票據重點貼現等方式放出巨款（該行放出款額曾到一萬二千萬英鎊）同時流通市上的票據餘額，亦有五千餘萬英鎊，因此恐慌時期，到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四日就完全結束，工商業沒有陷於停頓，失業數目，亦減至最低額。

德國因受到國際糾紛的威脅，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九至三十一日曾一度發生強烈的恐慌，德國國家銀行總共償付了各銀行及私人的存款約達二十萬萬馬克；並做出票據貼現十六萬萬馬克；但因事前早有佈置，不久就使人民恢復了信賴的情緒，所以始終沒有頒布延期支付的辦法。德國事前布置的計劃，非常周密：在一九一一年開始發生的國際示威事件之後，他們的銀行家，在摩洛哥事變中，就預先有所感覺，因此他們的私立銀行，早已拋清了所有的商業票據，其中國外票據很多；所以在恐慌時期，無需向德國國家銀行請求重點貼現。同時，德國的銀行制度

有一個特點，那就是能使德國國家銀行擺脫一切與中央銀行無直接關係的附屬業務，而另外設立一批有特別營業目標的銀行，如抵押銀行，保險銀行，放款銀行，票據放款銀行，地產銀行等等，這種組織，除了分業的便利外，還有分担危險的優點，並且可以財產和有價證券為準備，發行多量的紙幣，無需專募黃金，所以德國國家銀行得以集中力量，應付事變。在戰時，德國還由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的法令，創立了一個借貸局，其營業目標是以票據及貨物為抵押，放款與工商業，儲蓄會，信用公司等。其所發證券，與帝國金庫所發的庫券一樣，可作為德國國家銀行的準備，並可作為發行新紙幣的準備。這項證券，最初的發行額是限定十五萬萬馬克，到一九一五年便增至三十萬萬馬克。另外，在戰事開始之初，各市政府和商會，又在幾個城市中，創立了幾家戰時信用銀行，有的專做商業票據的貼現，再以此項票據向德國國家銀行重貼現；有的專做手工業和零售商的放款；有的專做抵押放款。因有這許多金融機關供給各業，資金金融自然活潑，所以各銀行的存款數

目，立即恢復原狀，並且不斷增加。因此後來幾家國家銀行所承銷的公債，佔總額百分之七十，成爲銷行公債最有力的支柱。

我們就歐戰時各主要國所取應付金融恐慌的辦法來看，一言以蔽之，也無非是以各種方式增加通貨的流通而已。他們的經驗，在我國現有情況之下，固然不能全本應用，可是也不失爲一個很好的參考。我們以爲照我國目前的情形，各銀行錢莊的頭襯，都非常短絀，票據貼現，又未普遍盛行，要想活動金融，照英國那樣由國庫貸款與各銀行的辦法，是可以取法的。不過我們應改由政府發行鉅額金融公債，（數額亦可比照各銀行存款總額百分之幾），貸放與中，中，交，農四行，由四行以此爲準備，發行法幣；同時爲分散危險計，再由四行公布辦法，以各種方式（一部份信用，一部份以財產爲抵押）拆放與各金融機關，並由財政部切實監督，令各金融機關分頭向內地農工商各業放款。等到金融漸見活動，對於安定金融辦法，也不妨酌予修改，以期逐漸納入常軌。

照上面這種辦法，表面似有膨脹通貨的形式，但是結果決不會有通貨膨脹的危險，其理由如下：第一，這是應需要而來，祇要通貨的供給不超過需要，是不會影響到它的價值的。第二，這是有限的膨脹，一定要政府發行了一批金融公債，才能發行一批通貨；而政府發行公債的數量，當然視需要而定，所以與不管準備有無，無限發行紙幣的情形不同。第三，這是很有伸縮性的，因為公債可以買賣，放款亦可以收回，到將來信用恢復，市面通貨太多的時候，四行就可以賣出公債，收回法幣，即使公債一時不易賣出，那麼還可以收回放款，所以很有伸縮餘地。第四，這且含有減少財政的通貨膨脹危險的意義。我們知道，財政的通貨膨脹是最危險的；同時我們亦知道，在持久戰的期間惟有在政府可以設法增加稅收（尤其是直接稅）和發行救國公債的時候，才能避免財政的通貨膨脹；我們又知道，惟有使金融活動，使全國生產力得充分的發展，使人民經濟充裕，各業皆有羨餘，才可供我們政府加稅和發行救國公債，所以我們要活動金融，就是在培養戰時財源，實在是籌劃

戰時財政的釜底抽薪之法。因此我們敢說，上面這一個辦法，形式雖似膨脹通貨，而結果即有減少通貨膨脹危險的可能。

除了通貨問題以外，還有金融機關問題，與金融活動能力直接有關，當然亦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們的金融機構，在中央儲備銀行尙未正式成立，稟據貼現未能普遍進行之前，當然說不上怎樣健全；但自新貨幣政策實行，發行權集中於中，交，農四行以來，在四行合作之下，對於全國原有的金融機關，實已很能盡統制領導之效，所以照目前情形，我們主張應儘量運用原有的金融機關，發揮調節金融的機能，以資熟手；而不主張多所更張。不過我們覺得全國金融中心，現在仍舊放在上海，却有特別提出的必要。誠然，上海是東南財富的集中地，我們爲保管這些財富，並暫時利用牠作爲籌集戰費的要區，自然不使將所有金融機關，驟然收縮；但是，在海口已被敵人封鎖，內地交通亦在在受敵人飛機大砲威脅的現狀下，上海早已成爲一半死城，早已不是一個全國貿易的中心，一般金融機關也差不多僅

成爲一個保管財富和支取生活費的所在，事實上已不成其爲一個金融的動脈。現在內地產業金融急待調劑，但因各銀行總行都還是設在上海，一切都要聽命上海，因此整個的社會金融，也跟着停滯了。我們希望各銀行應從速將總行遷移內地，——似以漢口爲宜——建立一個可以自由運用職能的金融中心。至上海方面，名義改爲分行，營業規模，不妨仍維原狀。不然者，則我們的通貨問題，就是解決了，而沒有一個可以自由發揮職能的健全的金融中心，好比人身患了心臟病一樣，雖有正常的血液，仍不能使人體康健；結果，整個社會金融，還是不能普遍活動的。

最後，我們覺得金融問題解決了以後，還不一定真正就能夠促進全國的生產；我們要發展戰時生產，還有下面兩個條件，不可缺少：第一，政府應從速確立一個戰時經濟統制的中心機關，確定一個整個的計劃，切實統制並調整各種經濟活動，負起督促指導之責，同時應另訂一種保護戰時工商業的辦法，獎勵人民經營事業；設立中央職業介紹所，調查登記全國人材，並分配於各業，務使人人有工作的機

會，人人能盡其才力。第二，全國資本家事業家，都應抱着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決心，以大無畏的精神，各在本位努力，盡力向內地生產事業投資，盡力為國家發展產業服務。要這樣，我們的生產事業，才真能加速地發展。（廿六年九月廿一日）（大公報）

抗敵戰術論集

上海進化書局總經理售

在抗敵戰爭中應當採用什麼正確的戰術，這是目前一個最重要的實踐問題。這本集子對於這個問題有明白正確的答覆和指示。其中包含四篇重要的論文：（一）論革命的戰術——遊擊戰；（二）被壓迫民族與遊擊戰；（三）遊擊戰的基本原則；（四）抗敵戰術之理論與實際。這些論文，關於遊擊戰的性質，它的歷史教訓，它與中國抗戰的關係。它的組織方法和活動原則，它的政治工作等，都有很正確實際的說明。從事抗戰及準備從事抗戰的朋友們都非讀不可。全書五萬餘字只收成本一角。救國團體整批購買還可特別優待。

抗戰時期之財政

孫懷仁

「金錢就是武器，炸藥，被服，裝具」！——英國戰時標語。

「鋼彈既斃敵人，其次則以錢彈制之」！——德國戰時標語。

美國財政學者薛立格曼教授 (Prof. Seligman)，對於近代戰爭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敘述，他說：「……大砲愈大，則其生命愈短；飛機愈精，則其破壞之機會愈大。隨衛生法之進步，而制服類之更換次數加多；隨科學之應用完備，而海陸上所受之損失益大。因而不獨無限擴大基本的經費，且依破壞之純淨消耗，乃隨兵器能率之進步，益至增大。現代之戰爭，不僅爲一切戰爭中之代價最高者，且亦爲最浪費者」。 (轉引自陳譯戰時統制經濟論四九六頁，原文在薛氏所著 "Our Fiscal Policy in the Financial Mobilization for War") 這幾句話，把近代戰爭之如何

的依存於經濟力，可以說已明白的表現出來了。所以，近代戰爭之勝負，與其說是取決之於人力，毋寧說是取決之於物力來得妥當些。可是在這個交換經濟社會中，戰爭要能得到充分之物力的補充，就需要有充分之交換物力的金錢——戰費，因此，本文前面所引英德兩國戰時的標語，也可以說是近代戰爭中顛撲不滅的真理。

譬如在歐戰的當時，各參戰國幾乎都盡其所能的支出戰費，像聯合國方面的法國，支出戰費共達五百七十一萬萬元，同盟國方面的德國，支出達六百六十六萬萬元，總合全世界化於歐戰中者，計三千七百七十二萬萬元。倘若以交戰日數來平均計算，那末最多的如美國，每日要支出七千二百二十萬元，最少的如意大利，每日也要一千三百八十萬元。這些數目，的確可以使我們聞之咋舌的。現在我們對日抗戰，在軍隊科學化的程度上講，在士兵的給養上講，雖然都未必會及歐戰那樣的規模宏大，因而戰費也不會像歐戰參戰國的那樣多，但是，我們所要支出的戰費，也決不會是一個很小的數目。目前這個抗戰，時間究竟要延長得多久，此刻還不得而

知，若就我們的常識而判斷，最少也得一年，多則二年三年。倘若以動員二百萬兵士（現在的現役兵額，已近似於此數），連續戰鬥兩年，每日每名士兵消耗七元八角五分（此數係歐戰中英、法、俄、意、德、奧平均每日戰費之半數，包含給養及軍器消耗等在內）來計算，每日即需一五、七〇〇、〇〇〇元，兩年共需一、四六一、〇〇〇、〇〇〇元。這個估計的根據，在兵士每日消耗上，也許會失之過高一點，不過在兵士人數方面，我們却是估的一個最低限度，因此，雙方扯直以後，所估雖不中，但相差也不會很多了。

這樣一個每日支出一千六百萬元的龐大戰費，對於目前的中國財政情形而言，誠然是不勝其負擔的。現在我國軍務費預算支出，每年四萬萬元左右，平均每日一百十萬元，與我們前面那個估計比較，每天要不足一千五百萬元，相差自不能以道里計。而事實上，目前的中國財政，年年都有一萬萬元以上之赤字，預算收入方面所列者，俱屬虛列數字，本不足憑，一旦到了戰爭時期，自然這虛列的情形，尤須

顯露。就以今日租稅而論，九九%是由關、鹽，統三稅所構成，（廿六年度預算中共列七七三、五一〇、七二六元），戰爭期中，海岸自然被敵人封鎖（二十五日下午六時起，滬汕間海面已被封鎖，唯尙限於華方船隻），貿易銳減。這樣關稅收入就不可靠；同時又因爲沿海作戰的關係，海鹽鹽稅收入斷絕，大都市工業統稅當亦告停頓。此外，其他各種租稅收入，國有財產、事業、營業、行政等收入，當然亦須相當減少。這樣的結束，要以目前的財政情況來應付戰費，不唯是不足，抑且是不可能。

因此，這裏爲應付抗戰的戰費起見，財政就根本有急速加以調整之必要。從來對於戰時財政的調度，主要的不外是三條路；第一是發公債；第二是增租稅；第三是膨脹通貨。這三條路各有各的長處，也各有各的短處。以籌款方法的迅速程度而言，自然以第一及第三的兩條路爲是；以籌款方法的穩健與戰後國民經濟的不受壓迫而言，自然以第二條路爲上策。可是我們目前抗戰時的財政，究竟應該走那條

路呢？在這裏，我可以鄭重提出，第三條路我們絕對不能走，同時，也是一條最要不得的路。我們現在的抗戰，雖然自信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但未來的事情必竟是不可捉摸的，我們與其到戰後受苦受難，毋寧在抗戰期中，堅苦的想其他辦法。歐戰時的德國，滿望將來能打勝仗，在戰時就大發鈔票，預備以敵人的賠款來整理，可是結果弄得滿身瘡痍。我們中國這個風雨飄搖的經濟，斷不容再來這麼一個冒險的嘗試。

這第三條路的通貨膨脹，在中國目前既不能走，自然祇有發公債與增租稅了，但除此以外，我們以為還有許多補助手段可以用，譬如一切不急經費的節約；金銀及軍用品的徵發，公營事業的加價等，都可以作為緊急調度戰費的手段。以下，我們可以更具體一點的敘述。

這裏，首先可以提出來的，就是如何以公債調度財政的問題：

關於以公債來調度財政的設施，可以分成兩方面來討論：第一方面是募集新債

的問題；第二方面是展還舊債的問題。

(甲)募集新債 戰時公債的發行募集，主要的當然是內債。在戰時發行國內公債，通常有一個很大的便利，就是人民愛國心的利用，因此在募集的時候，費力既少，而效果反而極好。不過，在這裏要注意的有兩點，就是內債的發行，一方面有使人民財富發生不均衡的弊害，同時，另一方面有促使銀行增發兌換券的可能（因公債可作發行準備），為針對這兩點毛病，而使其減少弊害起見，我們抗戰時的內債，應該符合幾個標準：（一）須為小額公債，使平民亦有應募之可能；（二）利率應低，但不能無利，因無利之結果，將使購募者不踴躍；（三）不折不扣，十足發行；（四）可作一切公私之擔保品用，但不能充作發行準備。這種公債的募集，應採用公開發售制度，我們以為應使全國任何公私機關、商店，義務的推銷發售。在此內債未發出而軍事急需款的時候。可發行一種短期的國庫憑證，向中央銀行借款，將來再由公債收入歸還，以資調劑。此外，在外債方面，我們也主張舉借，尤

其對於我們能供給軍需物資的國家，更應該從速訂立借款協定，就是借款條件苛刻一點（但以不損害領土主權爲限）也不妨事，因爲現在已經是對日抗戰第一義了。

（乙）展還舊債 這展還舊債，也是目前必要之圖。現在我們財政上對於內、外債償還的本息，每年支出達三萬萬元以上（廿六年度爲三二四、六九三、七五四元），這裏有二萬萬元左右爲內債。在這全國發動抗戰，危急存亡之秋，我想賢明的內債所有人，他們不應該再斤斤較量於本息，（因爲國家假若不保，債權決不復再能存在），所以國家也就不妨宣布全部展緩償還。關於外債方面，日本部分當然不必再還，至於其他各國部分，我們以爲應該從速分別磋商，實行停本付息，（因爲在目前要再借外債的時候，本息全部展償恐怕是難的）。這樣一個展還舊債的結果，每年也可以省發三萬萬元，不啻發了一筆新債。

其次，我們要討論到增稅，與其他財源的問題了。

關於戰時的增稅，不外兩方面，一方面是把舊有租稅增加稅率，另一方面是創

設新稅。現在我國現行的租稅，前面已經講過，主要的由關、鹽、統三稅所構成。這三種稅，不僅是道地的間接稅，同時，在抗戰時期中，收入都將大大的減少。因此，說到舊稅增加稅率，在這三大租稅中，關稅就根本不可能；至於鹽稅，未始還沒有辦法。譬如把新疆、西藏等之石鹽，青海、寧夏、蒙古等之池鹽，四川、雲南等之井鹽，整理加稅，不過這樣所增有限，而人民受害却是無窮（鹽稅本來是一種惡稅）；至於統稅，本來是極易轉嫁的間接稅，戰時人民消費節約，即增稅率，亦難望增稅收，何況原有重要沿海工業，又已慘遭一度打擊了呢（譬如紗廠、香煙廠、麵粉廠、已有一部分在滬戰中犧牲）。所以，現在舊稅中之可能增徵者，不過是印花稅、所得稅、銀行稅等數種而已。

如今，舊稅既難望增徵，因此抗戰期中之徵稅問題，我們主張集中目光在創辦新直接稅，這樣，不但可以調度戰時財政，同時，也可以乘機糾正現行間接稅比重過大的稅制。在這裏，我們以為對於直接稅方面，應該做的有三點：（一）把現行

的所得稅，增加稅率；（二）把現在虛列預算的遺產稅從速實現，並提高已擬定之稅率；（三）創辦一般財產稅。

在租稅方面除掉這樣一個變更之外，戰時中應該創設幾種臨時性質的租稅：

（一）戰時所得稅，（這種稅，是把戰時之所得額，所超過平時所得額的部分，課以重稅，不過在中國缺乏統計，辦理時比較困難一點）；（二）超過盈餘稅（這種稅是要先規定一種工商業的標準盈餘率，在此標準率以上之盈餘額，課以重稅）；（三）臨時財產稅（這種稅是要規定一個各個人所有資產的限額，如超過限額以上者，課以重稅）；（四）特種消費稅（這是對奢侈品、娛樂品等消費所課的稅）。這種臨時性質的稅，不僅得到收入，同時，對於戰時財富不平衡分配的現象，多少可給予以一種緩和。

此外，我們對於其他財源之獲得，覺得還有以下的幾種辦法可行：

（一）政務費厲行緊縮，一切官吏薪俸、津貼等，按比例折扣發給，即所得愈

大者，折扣亦愈大。此外，一切不必要的物件費，亦應盡量節約。

(二) 一切國有營業事業加價——例如鐵道、輪船、航空的票價，電報、電話的使用費，郵件的郵票，公共建築物的利用，一律加高費率。

(三) 從速實施管理外匯，動用一部分外匯平衡基金。

(四) 規定人民保有金銀之最高額，超過部分概由政府備價收回，人民如能自願獻納者，國家應獎勵之，並給予以公債相交換。

(五) 獎勵人民自由捐輸，達官顯宦，尤應以身作則，努力提倡。但對於這捐輸，全國必須有一統一之機關彙集，並須嚴禁地方政府利用「救國捐」，「愛國捐」，「國難捐」等神聖名詞抽稅，使一般人對此種名詞發生反感。同時，對此種捐輸，國家亦應交付以等額之公債。

現在全面抗戰已經開始了，在這時候再來談什麼戰時財政，難免沒有「言之太晚」之嫌。不過，我們知道，這次的抗戰，是整個中華民族生存與滅亡的一個關

鍵，從而，這個抗戰也不是一個極短時間所能解決的。因此，在目前這個抗戰正在發端的時候，再把這問題提出來吟味一下，也許並不會怎麼沒有意義。而且，這時財政裏面的有些問題，不到戰事發生之時，討論起來也不會感到親切意味的。各位讀者，現在正可以利用了你們目前這寶貴的戰爭經驗，與你們寶貴的知識，也對於這嚴重的戰費財源問題，考案一下，有機會也不妨寫出來大家看看。俗語說得好，「三個臭皮匠，等於諸葛亮」，在政府中雖不乏許多財政專家，但我們這個「臭皮匠」工作，還是值得做的。（文化線第一期）八月二十六日於炮聲隆隆之上海。

進 化 書 局 出 版 新 書

現 代 唯 物 論

永田廣志著

施復亮合譯
鍾復光譯

近 代 唯 物 論

森 宏 一 著

寇 松 如 譯

自 然 科 學 史 概 論

潘 谷 神 編

實 價 五 角 五 分

本書是一本扼要地敘述辯證法唯物論百年來發展史的良著。不但對於初學者是一本頂好的入門書，就是對於有研究者也是一種幫助自己整理思想的好工具。關於辯證法唯物論的一切重要問題，都有正確明白的答復。

實 價 五 角

本書是現代唯物論底姊妹篇。從文藝復興近代唯物論前史說起，歸結於十九世紀現代唯物論底成立。關於哥白尼、開普勒、加利略、培根、霍布斯、洛克、笛卡兒、斯賓諾莎、拉薩特利、狄德羅、何爾巴哈、赫爾維修等人底學說，都有明白扼要的敘述。

實 價 三 角 五 分

自然科學與人類底生產實踐有密切的關係。自然科學底發展，是被人類社會底發展所制約的。本書就是站在這種觀點去研究二千多年來的自然科學發展而給以唯物社會的說明的。值得愛護真理的人一讀。

教

育

戰時教育問題

楊東蓀

近來有些朋友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戰時教育和平常時期教育有無不同之點？』我們的答覆是『有』。

第一，從全國總動員一點來說，政治、經濟、軍事諸部門既然由平時狀態入於戰時狀態，集中一切力量於抗戰這一點，則教育這部門自不能單獨例外。並且教育不是獨立的東西，只有在它與政治、經濟諸部門取得密切聯繫時，才能夠發揮其積極的作用；因此，當一切部門都在變動的時候，教育這部門也不能不跟着變動。

第二，從半殖民地國家反侵略的戰爭來說，更顯示出知識分子在戰爭中地位的重要。現代學校教育制度，原係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把它移植到處在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國來，自然是『橋過淮爲枳』，發生了『鑿柄不相入』的現象。但從另一方面看，却不能否認中國最近幾十年來知識分子在屢次改革運動與革命運動中所起

的積極的作用。目前是全民族的統一的抗戰時候，要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就必得發動全國民衆起來支持抗戰；而所謂全國民衆，主要的就是指着那人數最多而力量又最大的工農大衆而言。但是由於工農大衆文化水準的低落，要他們起來支持抗戰，固然主要的應該把改善工農生活這問題聯在一塊；可是我們也不能忽視智識分子在目前有着組織並教育他們的任務。因此，教育在這時便起着特殊作用，而這作用在平常時期是向來被教育工作者所漠視的。

單就上述兩點來說，已經充分地表明出戰時教育與平常時期教育的不同之點。現在且讓我們來談

戰時教育的方法問題

這第一是實施集體主義的訓練方法。掃除自私自利的觀念與行動，養成爲民族國家而犧牲的精神；嚴格執行自我批判，克服智識分子的動搖性與浪漫主義；實施

嚴肅而有紀律的有戰鬥性的集體生活，在集體生活中體煉出組織的方法與工作的技術；提高政治教育，在政治教育中養成強有力的幹部；側重有組織的活動，在有組織的活動中養成民主的精神；廓清一切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與「我行我素」的感情衝動，提高現實主義與崇尚理智的精神；這一切，都不是過去個人主義的訓練方法所能做到的，只有集體主義的訓練方法才能夠完成這些任務。我們堅決地認定：戰時教育只有緊緊地把握住集體主義的訓練方法，教育在抗戰中才能夠充分地顯示其積極的作用。不但如此，同時，我們還誠懇地要求全國教育工作者澈底地了解並執行「教育者也應被教育」的原則，在教育過程中要認定自己同時也是被教育者；只有這樣，教育工作者才能夠實現集體主義的訓練方法。

第二是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過去形式主義的學校教育，真是漏洞百出：它把教育與現實生活打成兩橛，把學與用，知與行分離起來，教育活動變成了沒有靈魂的木乃伊。它在平時，既是空洞無物；到了戰時，由於浪費財力，物力與人力，它

將成爲抗戰展開的障礙物。要補救這缺點，便只有拿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來代替它。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把教育與現實生活打成一片，把學與用，知與行聯繫起來，它是理論與實際的統一的教育；它的最高原則，就是在一切集體組織中，在一定的計劃之下，把一切活動，一切工作以及經常發生的事件，都認定是教育活動的主要內容，也即是教育活動自身。但這裏所謂一定的計劃，必然是通過某一正確的理論與認識而得到的結論；不然的話，便會犯着實用主義與經驗主義的錯誤。澈底地了解了這原則，教育工作者就會懂得那具備了教室，實驗室，研究室及以圖書館的教育活動固然是教育活動，但根據這原則而發生的一切活動，又何嘗不是教育活動呢？尤其是在戰時，我們更有理由認定後一種教育活動將成爲最有效而又最廣大的教育活動，將成爲支持抗戰的最有力的支柱；甚至前一種教育活動，在目前，也必得根據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的原則，才能夠發揮其最大效能。

上述兩個方法，其實只是一個。如果要改造中國教育，我們認定首先便應該從

方法上着手，而方法中最有力而又最有效的就只有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這一改造，不能實現於平時，我們但願爲着增強抵抗力量起見，能夠實現於戰時。方法問題談過了，現在且讓我們來談

戰時教育的實施問題

戰時教育的實施，有着兩個主要原則：第一是戰時教育的實施，即戰時教育的一切活動，都有一個總目標，這就是集中於抗戰這一點上，以爭取最後勝利；第二是戰時教育合理化的原則，即費最少的財力物力以收得最大的效果。

根據這兩個原則，我們對於現有學校的處理辦法是這樣的：第一是對於專門以上學校的處理，把不必要的即與抗戰無直接幫助的學校，一律停辦，而由政府擇定幾個地區，開辦幾所與目前抗戰有直接幫助的大學或研究院，例如醫科大學、理科大學、工科大學、抗日政治大學之類。在這一改革過程中，希望政府把那一向爲學

閱·所·把·持·而·視·爲·一·己·私·有·的·專·門·學·校·與·大·學·校·予·以·澈·底·的·改·造·，·我·們·認·定·學·術·與·文·化·是·全·民·族·的·所·有·物·，·決·不·能·讓·少·數·學·閥·把·持·，·一·方·面·造·成·壟·斷·的·局·面·，·使·得·許·多·有·學·識·的·人·不·能·展·其·所·長·，·一·方·面·造·成·派·系·的·鬥·爭·，·把·整·個·教·育·界·學·術·界·鬧·得·一·場·糊·塗·。·其·次·，·我·們·主·張·把·不·必·要·的·學·校·停·辦·，·不·但·合·於·抗·戰·的·需·要·，·並·且·合·於·眼·前·的·事·實·：·一·則·由·於·私·人·經·濟·的·窮·困·，·能·夠·負·担·鉅·額·學·費·的·專·門·學·校·以·上·的·學·生·一·定·大·量·的·減·少·，·因·此·，·即·令·各·大·學·各·專·門·學·校·按·照·老·模·老·樣·辦·下·去·，·其·結·果·恐·怕·是·教·授·多·於·學·生·，·而·不·免·於·浪·費·；·一·則·由·於·民·族·解·放·戰·爭·的·展·開·與·持·久·，·還·拿·着·「教·育·爲·百·年·大·計」·的·理·由·，·叫·大·批·學·生·在·學·校·裏·過·着·平·常·時·期·的·生·活·，·即·令·學·生·一·向·是·綿·羊·，·到·這·時·恐·怕·也·要·變·成·了·覺·醒·的·獅·子·，·教·授·們·在·教·室·裏·只·管·講·得·眉·飛·色·舞·天·花·亂·墜·，·學·生·們·恐·怕·也·不·會·安·坐·在·那·裏·靜·聽·你·們·這·些·撈·什·子·。·這·些·是·事·實·，·是·鐵·一·般·的·事·實·，·離·開·這·些·事·實·，·而·高·唱·「教·育·爲·百·年·大·計」·的·理·論·，·主·張·維·持·原·狀·，·這·不·是·自·欺·欺·人·，·便·是·別·有·用·心·。

其次，是對於中學的處理。中學這階段，是過渡的階段，但爲着要養成更多的幹部，來配合目前的民族解放戰爭，我們便不能僅僅這樣了解就算了結了對中學教育的任務，我們還應進一步，認定中學在某種教育活動之下，可能地養成多數的爲民族解放戰爭而努力的幹部。基於這個認識，我們主張提高中學的政治教育，並按照戰時的需要，來改革中學的整個課程。同時，基於上述兩個原則，更希望中學教育在數量上在性質上都有一個改革。

再其次，是對於小學的處理。小學原來應該是國民義務教育，但在過去，我們仍舊有着廣大的兒童，被摒除在這個國民義務教育的圈子外邊。目前，我們並不主張停辦小學教育，恰恰相反，我們要求今日的小學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在怎樣把那些失學兒童都能享有他們的受教育權；同時，基於上述兩個原則，更希望小學教育在性質上有一個改革。

再其次，是對於職業教育的處理。過去職業教育的最大缺點，就是把它與現實

社會打成兩橛；學校造就的人才，現實社會並不能夠充分運用，並且有許多人才，由於學校教育過程把學與用，知與行分離起來，根本就沒有用處。在持久抗戰中，由於海口的封鎖與戰事上迫切的需要，一切有助於抗戰的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的大規模或小規模的經營，都有着相當的前途；因此，職業教育便應當朝着這個方向充分地發展下去，以支持持久的抗戰。

最後，便是對於民衆教育的處理。民衆教育最主要的部門，是農民教育與工人教育；這是戰時教育中最主要的對象，我們要動員全國民衆積極支持抗戰，首先就得動員全國教育工作者積極參加民衆教育的工作。在抗戰這一總目標之下，全國教育工作者應該擔負起新啓蒙運動的重大任務，起碼的工作，至少應該是提高並強調民衆的政治教育、科學教學與文字教育。關於這點，作者在戰時教育旬刊有一篇要從戰時教育中樹立起新文化的基礎，說得頗爲詳盡，這裏用不着贅述。但主要的，我們必得強調民衆教育在戰時教育中的重要性。

對上述這些道理，我們還得重複述一遍的，就是要在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這一原則之下來處理這些問題，這即是說有學校設備的固然是我們的教育場所，就是那沒有學校設備的一切集體生活也一樣是我們的教育場所，定要一座洋樓式的民衆教育館才來談民衆教育，這簡直是夢想。我們不要忘記，在戰時，一切活動，一切事物，都是我們教育的園地與資料。並且，沒有這一原則，作我們教育的骨幹，就是齊集許多專家對這些處理作更詳細的規劃，到頭來，也只落得一場空。最後還讓我說幾句，以作本文的

結 尾

第一，全國教育工作者應站在自己的崗位上，集中自己一切力量，支持抗戰到底，並担负起新啓蒙運動的重大任務。

第二，戰爭熾滅了文化，但同時也創造了文化，在民族解放戰爭中更有着這樣

的前途，我們正不必緬懷舊的一切，打從今天起，我們應從全民族的新的生活中，從新啓蒙運動的工作中，樹立起新文化的基礎。

第三，全國教育工作者，應當從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中，體煉出新的教育經驗，建立起新的教育理論，我們的主要任務，不但是用自己的力量支持抗戰到底，並且進一步要替教育與文化的領域創造出一個嶄新的局面。

第四，在民族解放戰爭的巨流中，每個教育工作者都應過着克苦耐勞的生活。在過去正常工作中，生活所需，有着恆定的收入；一旦轉變爲戰時，收入減少，自不免於感到多少的苦痛。但我們不應忘記，在火線上正有着千千萬萬爲民族爭生存在流血而拚命的將士，我們多少感到一點苦痛，又算得什麼。小市民的生活方式，應該溶化在偉大而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的洪爐中。至於一向待遇最薄的小學教師，則爲着增強他們工作的力量，却必得予以相當的生活改善。

第五，關於失業教師的問題，一方面固然靠政府來解決，一方面也靠自己在工

作中來解決。一向錯誤的見解，都只把教育的對象，局限於學校一個部門，千千萬萬的勞苦大眾又何曾享有過受教育權，又何曾被當作是教育的對象。我們應該打從今天起，把教育對象的視野展開到千千萬萬的勞苦大眾方面去，同時，就從這些工作中運用各色各樣的社團關係以解決自己最低限度的生活問題。至於說：爲着維持失業教師的生計，主張把學校維持原狀，這就等於說：爲着維持失業舞女的生計，主張跳舞廳復業，同是一樣滑稽。全民族的統一的抗戰有一個原則，就是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朋友們，現在正是我們出力的時候啊！

以上是作者對戰時教育問題的大概意見，此外如難民教育問題等等，還沒有談到，即上述的意見，也不夠詳細，留到以後有機會時再來談吧！（文化戰線第四期）

戰時教育方案(生活教育社提出)

王洞若

(一)對於戰時教育應有之認識

(一)戰時教育的必要

目前大規模的抗日戰爭已經發動，我們必須繼續抗戰到底，用我們的人力物力財力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持久戰，消耗戰，才能消滅我們的敵人，取得中華民族之自由與解放。所以在抗戰過程中，我們必須把一切人力財力都集中起來，用之於抗戰，把一切活動，一切武器，都以爭取抗戰勝利為唯一前提。關於這一點，在目前已成爲成千成萬人的共同信念了。因此我們要求目前教育應完全適合於戰時的要求。過往的平時教育，我們應該使其全部改造過來，成爲戰時教育。

有許多人不明瞭目前戰時的嚴重性，不瞭解目前是一個生與死的鬥爭的開場，

因而把戰時看做平時，把戰時教育看做平時教育。他們所考慮的不是怎樣改造平時教育，以適應戰時的要求，而是怎樣及早開學，讓青年們在炮火下上課讀書，他們引證法國歐戰時某地中學在地窖上課的故事來斷言，只有這樣的處危若安，處亂若定來辦教育，才能夠鞏固國本。這種百年樹人的教育觀，在平時原未可厚非，但在國難嚴重期間，尤其是作戰的時候，便不能不顯得是一種有害於整個民族抗戰的理論了。我們主張戰時教育有四個理由：

(1) 在抗戰過程中，我們應集中一切人力直接間接用之於抗戰，倘若我們還是繼續平時教育，終日上課讀書，我們將給幾百萬青年被摒於抗戰的門外，這和國民總動員的主旨完全是不符合的。我們爲什麼不能運用那幾百萬青年的力量來訓練民衆教育民衆以鞏固抗敵的力量呢？

(2) 在抗戰過程中，我們應集中一切財力用之於抗戰；但平時教育論者在這時却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保持平時教育要求國家支出像平時一樣的數萬萬元的

教育經費；另一條出路是因爲經費減少而把教育活動範圍縮小。這兩條路對於抗戰顯然都是有害的。因此我們必須建立一種戰時教育，以謀教育經費之節省，并保證其不至因這種節省，而使教育受了影響。

(3) 從教育效能上來考察，我們更有將平時教育改造的必要。在平時，我們學校裏所教的與社會所需的，已經隔了一道鴻溝；可是一到了戰時，這個鴻溝便越發要加大了。誰要希望這種教育成爲有效的救國教育，就好像緣木求魚。

(4) 對日抗戰，不是可以立刻結束的，倘若我們是真心求民族解放，我們就不應該有這種苟且偷安的心理。中華民族解放戰爭是一個長期的艱苦鬥爭的過程；那些把教育看做是百年大計的人擔心戰時教育破壞了原有的教育精神，認定這一個變革只是一個短短的期間，因而是徒勞無益；這實在是一種謬誤的短見。

從以上四點看來，我們實在有改革平時教育建立戰時教育的必要。

(二) 戰時教育之基礎的原則

(1) 我們要承認戰時的生活，就是戰時的教育。在抗戰的生活中個人與集體，個人與個人，落後者與前進者之間所起的生活上的變化和作用，隨處都是教育。在救贖的生活中便是受了救贖的教育；在作戰的生活中便是受了作戰的教育。只有這樣的教育，才是最有效的教育。我們不需要在這種戰時的實踐生活而外，還另立一個普通教育系統，在那裏專門上講堂，讀死書。這樣就等於「放下金鑛不採，在砂裏淘金」。只有和實踐需要打成一片的教育，才是目前我們所需要的教育。它可以節省時間上的浪費，所學的就是實踐的生活所需要的，過去的那種讀書，實習，然後再實行那種冗長的分割的過程是被絕對刪除了。不僅如此，它可以節省財力與人力的浪費，過去一提到辦教育，就是校舍教員薪水辦公費一大筆開支，招收學生，聘請教師入學考試，月考，會考這一大堆麻煩，但是只要我們一承認戰時的生活就是戰時的教育，這一切浪費都可以避免的了。一切軍隊一切民衆團體和藝術團體只要略加計劃與調整，統同立刻可以成爲我們戰時的學校。

(2) 我們要認定和整個抗戰（軍事，政治，經濟）配合的有計劃有組織的生活便是上好的戰時教育。我們不僅零星地拾取生活教育，我們還應該和整個抗戰配合起來，作成精密的計劃，作成有組織的生活，在這當中來取得最好的教育。這就是說我們絕不零星地把抗戰中某一部份的生活算做我們的教育，我們更要求把有關抗戰之全面的認識（空間的與時間的）算做我們戰時的教育。

(3) 戰時教育在基礎的意義上便是戰時的一個普及教育運動。中國義務教育辦得幾十年了，但是文盲的百分數直到近年來，還是沒有怎樣地減少。這種現象絕不能完全歸之於人事上努力得不夠，主要地還是由於客觀上沒有感着最迫切的需要。現在迫切地需要普及教育的時代已經到來了。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倘若不能喚起千千萬萬的民衆來支持，來參加；倘若不能提高他們的文化水準，增加他們的認識，來頑強地鞏固這一個運動，誰也不能保證它會獲得最後勝利的。因此普及大眾的教育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已經作為相互作用的兩個東西。我們要普及戰時

教育，來鞏固我們的民族解放的抗戰，同時我們要在民族解放的運動中來開展普及大眾教育運動，提高大眾的文化水準。我們幾十年來所沒有完成的一時工作，使它與民族解放運動同時完成，這實是太值得我們幹的一件事業了。

(4) 平時教育應切實地考慮戰時的要求，作全部徹底的改造，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教育成爲一個鞏固抗戰的支柱。不過，倘若爲了事實的牽制，一時不易辦到的話，我們要求它逐步向戰時教育的推移。

(二) 戰時教育方案

(一) 戰時教育之目的

1. 培養并充實軍事力量，以作持久戰，消耗戰之人力的補充；
2. 培養技術人才，以謀抗戰物力之數量的增加及效能的提高；
3. 謀民衆力量與軍事力量之攜手；

4. 普及民衆教育，提高民衆文化水準。

(二) 戰時教育之總則

1. 把一切產業組織，戰時工作組織，及任何可以形成集體生活的地方，統在爭取中華民族之解放這一個目標下面，變做戰時的學校。
2. 抗戰之一切活動及對於抗戰之全面的認識，便是戰時教育課程。
3. 在上述新的戰時學校內所施行的有組織有計劃的集體自我教育，便是戰時教育的槓杆。

(三) 戰時教育之機構

1. 除研究院而外，各級學校皆予以改造。
2. 全國設戰時教育設計委員會，省設戰時教育工作委員會，縣設戰時教育指導委員會，來主持整個戰時教育工作。
3. 按(甲)各人之生理狀態；(乙)工作能力及(丙)當前工作需要，將原

有學生，民衆以及失學兒童分別加入4所列各項組織。

4. 戰時教育機構。

(甲)文化細胞與文化網。

文化細胞是戰時教育基礎的機構；家庭，工廠，店鋪，軍隊，里弄，村落統可以組織，它的工作有識字，傳信，口頭新聞報道，衛生，唱歌等活動。

文化網則爲若干文化細胞之總體。它對文化細胞的活動負着輔導的責任。此外，它可以舉行壁報及其他文化細胞所不能單獨進行之事項。

(乙)戰時工作教育機構。

利用戰時各種各樣的工作組織作爲戰時教育機構。倘若文化網文化細胞代替了過去的小學教育及民衆教育，那麼這種戰時工作教育機構便多少是代替中學教育及普通科的大學教育。

按工作性質分，可有義勇護團救隊，偵察隊，新聞網，國防生產突擊隊等新的教育機構。

(丙)各種戰時工作幹部訓練班及救亡大學。

各種戰時工作訓練班有類平時教育之師範學校，救亡大學則類平日教育之師範大學。當前工作需要某種幹部便開辦某種幹部訓練班。

(丁)研究院

這是與國防生產及軍事技術有關的研究機關；實科教授，成績優良的實科大學生及專家方得加入。

(戊)戰時宣傳與教育機構

如劇團歌詠團，戰時普及教育隊，戰時教育服務團，農村服務團，宣傳隊等等。

(四) 戰時教育之方法

1. 如何把普通的團體和戰時工作組織轉變為戰時教育機構。

(甲) 建立嚴肅的集體生活。

(乙) 在集體生活中舉行政治的自我教育。

(丙) 在集體生活中舉行工作的自我教育。

(丁) 必要時，在集體生活或個別訓練方式下進行文化教育。

(戊) 勵行工作檢查，自我批評，并總結各種工作經驗。

2. 自我教育之具體方法。

(甲) 配合政治經濟各方面的情勢，訂定工作計劃。

(乙) 工作執行。

(丙) 工作檢查。

(丁) 自我批評。

(戊) 工作經驗的總結。

(己)理論的檢驗及變化。

(庚)理論與經驗的紀錄(時間與精力可能允許的話)。

3. 每一機構內應設一專人或專組，負責主持計劃，檢查批評，總結，及校閱工作紀錄之責。

(五)戰時教育之課程

1. 必修的深程

(甲)集體生活中之各項知能爲集會，衛生，秩序等知能，團體與個人之認識等。

(乙)世界大勢之認識。

- 一. 近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
- 二. 帝國主義與殖民地。
- 三. 世界主要國家對立之陣容。

四·世界前途的瞻望。

五·其他。

(丙)中國與日本的認識。

一·中國與日本之歷史地理的認識。

二·日本侵略中國之歷史。

三·中國國內之和平與統一。

四·中國全面抗戰之意義。

五·中國之必然的勝利。

(丁)戰時常識：如軍事常識，防空防毒救護之知能。

(戊)民衆訓練工作的經驗與理論。

(己)識字教育工作的經驗。

以上可按各人，各戰時教育機構之文化水準而異其學習之程度。

2. 選修的特種科目。

按戰時工作組織之性質異其科目。

3. 研究事項。

(甲) 機器之製造與修理。

(乙) 賤價而又耐用的防毒面具之製造。

(丙) 汽油之代用品。

(丁) 生產合理化之研究。

(戊) 其他。

(二六) 戰時教育之教師

1. 戰時教育之教師，已失去了它絕對的意義；不僅是教育者影響了，教育了被教育者；同時教育者也為被教育者所影響，所教育，

2. 在不同的工作領域內相師相學。

3. 但在相對的意義上，教師還是存在的。

一切工作幹部都是戰時教育的教師；

前進的知識份子，前進的大衆，前進的兒童和技術專家——都是戰時教育的教

師。（抵抗第七號）

戰時教育的具體辦法（生活教育社提出） 滿力濟

生活教育社提出了一個戰時教育方案，這個方案已經引起廣泛的注意，並且有許多人已開始研究如何實現這種教育了。有一位朋友說：「比如我們書店，有一二百個同人，要想執行戰時自我教育，應該如何着手呢？」這個問題實在是很重要的，而且也一定是許多人所急於要問的，現特根據我們的研究，加以詳細的說明。

戰時教育之根本路線是在有組織的抗戰行動中，執行經常的艱苦的自我教育。但是在全面抗戰中，各種人羣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所以我們在執行這種教育時，必須按照實際的情況，採用各種不同的形式。這些形式歸納起來約有如下數者：

（一）戰時工作組織，如軍隊，抗敵後援會，各界救亡協會，以至救護隊，各種服務團，劇團，歌詠團，等等，這些組織是比較直接的戰鬥團體，他們的行動，

也是比較直接的戰鬥行動。所以他們推行戰時自我教育也比較便利。在這些團體中，我們認爲目前第一步應該立刻在自己的組織系統中成立一個自我教育委員會，或自我教育部，專門負責發動、設計、監督、指導本團體內集體的自我教育工作。在這些團體內，我們不需要在實際的工作之外，再另外劃分出很多學習的時間；我們可以在實際工作本身中有計劃地打進教育的活素，讓他開出教育的花，其具體的方法如下：

- a. 每天或每數天有一次嚴格的集體生活討論及時事討論，並由時事討論更深入到一般的政治討論。
- b. 在日常的工作討論和工作佈置中隨時隨地注意到自我教育的工作。例如檢查過去的工作，接受過去的教訓；詳細研究工作的方法，方式，條理，克服各種各樣的錯誤等等。
- c. 在日常工作中，有計劃有程序地培養新的幹部，注意每個幹部的進修。

- d. 有計劃有程序地提高必要的技術的訓練。
- e. 嚴格的執行自我批評。

(二) 一般的職業團體，如書店，商行，工廠，報館，行政機關，等等。這些地方固然有集團的生活，但未必都已直接參加抗戰行動；所以我們決不能僅僅要求他們在本身工作中訓練自己。我們認為在這些團體中必須用如下的方法來辦：

- a. 推舉或者聘請一個戰時教育設計員，負責計劃指導戰時教育工作。
- b. 認清自己的團體在全面抗戰中間的特殊使命，把自己的工作和教育着重在這個方面。

- c. 單獨或是合其他團體舉行集體生活討論，時事討論，或政治研究。
- d. 和同性質的團體聯合起來組織戰時服務團，或各種有利於抗戰的團體。在這些有組織的集團工作中，提高自己的技術訓練。必要時也可以請求有經驗的人來作實地指導。

e. 其他訓練幹部自我批評同上。

(三) 大學或各種專門學校研究院等等。這些地方現在有一個很大的矛盾，就是他的組織和課程簡直和抗戰毫無關係，而事實上他又不能不受戰事的影響，並且在這時要想把學生關在與抗戰隔離開的圍牆裏，也很不容易。對於這種地方，我們認為目前應通過如下的大改造，來執行戰時教育：

a. 設立一個戰時專門教育委員會，按照戰時的需要，看全國應有那些最高的專門研究機關，然後再看各大學的特點，和特殊情況，將各大學改成各種專門研究所。性質相同的可以合併起來；性質相異的可以分開，多餘的就裁撤掉，沒有的立刻補設起來，大概現時極需的有如下的幾種：

- 甲，機械工程研究所（附兵器研究所）；
- 乙，化學戰爭研究所（附防毒研究所）；
- 丙，戰時經濟研究所（附戰時財政研究所）；

丁，糧食管理研究所；

戊，交通管理研究所；

己，電信研究所；

庚，軍事政治研究所；

辛，航空研究所（附防空研究所）；

壬，醫藥研究所；

癸，其他。

b. 使這些研究所和各該部門的工作組織；緊密地聯在一起，全所的指導員和研究员，都要儘可能全體參加各該部門的實際工作。

c. 各研究所應完全放棄舊日那種迂緩無用的課程，而以各該部門之緊急需要爲課程。

d. 各研究所除去專門的研究外，也應有經常的時事討論，政治研究，及其他必

要的訓練。

(四)中小學校，照我們的想法，應該全部停辦，但如果把學校解散了，則學生都分散開來，很不容易團集起來，所以我們認為這些學校仍可以暫時存在，但必須照如下的方法加以澈底的改造，使能適應戰時需要。

a.全體師生皆停止一切平時的生活程序，而組織中學生救亡協會，兒童救亡協會，或各種戰時服務團，以此等救亡生活為教育生活。

b.在此等組織中，成立自我教育指導委員會，依據一般救亡團體的方法，執行政治的，時事的，工作的，自我教育。

c.組織戰時普及教育服務團，或小先生服務團。推行民衆教育。在教育民衆的工作中，教育自己。

d.在一般的工作以外，更儘可能地注意到語言文學方面的進修，和各種基本常識的學習。

(五)一般散漫的民衆。在這些地方，執行戰時自我教育比較最爲艱苦，但也最爲重要，這裏的辦法大概如下：

a. 由政府、救亡團體、教育團體、切實合作，組織戰時普及教育委員會，負責設計指導，同時動員大中小學生之文化人組織戰時普及教育服務團，深入民間進行教育活動。

b. 活動方法，最好完全改變舊日的態度，注重民衆組織工作。首先根據他們的日常生活，組織一般的互助團體，爲難民互助會，戰時互助會，民衆消防隊，村鎮里弄聯合會之類，然後再漸漸把他轉化爲直接的抗戰團體。在教育活動中進行這些組織在這些組織中的生活中，進行普及教育工作。

上述五種辦法，可以代表現時執行戰時自我教育的五種形式。但形式雖不同，其根本路線還是一個。就是在集團的抗戰行動中，推動抗戰的實踐教育。所以我們一方面應該顧慮到各種人羣的實際情況，一方面也應該集中火力在這一條總的路線

上，不過爲了保證這種教育能很好做到，我們最後應該提到一個最高的組織問題，就是建立一個全國戰時教育設計委員會負責領導一切。這個委員會可由教育部，救亡團體，教育團體，共同組織之。但這個問題，是組織與行政的問題，本篇限於篇幅，留待下再次談。（抵抗第八號）

戰時教育的課程（生活教育社提出）

張宗麟執筆

（一）擬訂戰時教育課程的四個原則

第一，根據戰時教育方案，平時的各級學校應該暫時停止，另行建立教育機構，所以戰時教育課程必須依着新的機構而訂立，不應該在舊時的學校課程裏加入幾許戰時材料與科目，（如在課餘加防毒等科，在其他各科中加些戰時教材），就算得戰時課程。

第二，新的教育機構必須根據當前的需要，及各人生理狀態和他的能力。所以這個新的機構在縱的方面可以有文化細胞，文化網，幹部訓練班，救亡大學，研究院等，在橫的方面仍舊存留着兒童、工人、農民、商人、士兵、家庭婦女和智識份子等，同時在工作的另一方面還有直接參加抗戰工作與做後方生產工作的不同。所

以釐訂戰時課程就比平時的課程要複雜得多了。既要根據機構的縱橫兩方面，更要顧到工作的另一方面。

第三，釐訂課程必須先決定幾個重要原則。戰時教育課程的總原則當然是「抗戰」。在這個總原則之下，必然要分析到爲什麼要抗戰？怎樣纔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民衆怎樣加入抗戰的各部門？這三點也就是（1）抗戰的意義與認識，（2）發揮集體生活的力量，（3）民衆盡力學得戰時各種技術，並且盡力供獻各種技術到抗戰的途上去。這三個原則，在戰時教育機構的任何一方面都要完全遵守。

第四，課程的實施，是釐訂課程者必須顧到的。在抗戰期中不允許個人隨便生活，在戰時教育課程裏也就沒有給個人自由享樂的材料，或者造成個人將來可以享受的科目，實施戰時教育課程也就必須用集體的生活來配合戰時的需要。我們再不能用過去獎勵個人的風頭主義，再不應該用以前形式的班級制度，我們今後實施戰時課程必須通過集體的生活。換句話說，人民戰時的集體生活就是戰時教育課程。

我們更可以說，將來抗戰勝利民族解放成功以後，全國人民都必須過集體的生活，今後的課程都必須通過集體生活而得實施。這裏所謂集體生活不是形式主義者的集體，就是說不是只有集體的形式的形式就算是集體生活。能夠發生集體力量的集體生活才是實施戰時教育課程最有效的方法。所以在我們提出的教育綱要裏曾經提出有組織有計劃的集體自我教育。這點雖然屬於方法方面，但是不顧到實施方法的課程，根本就是不能實行或行了無效的。在平時還可以騙人，在生死關頭的戰時就不應該自欺欺人，危害整個民族。

(二) 課程綱要

有二點得先聲明：(1) 爲着討論方便起見，這個提要是依照年齡與職業等自然分界的，計分兒童，工人，農人，士兵，店員，中學生與大學生，婦女，其他等九部分。(2) 因限於篇幅，各級課程只是大綱的大綱，比較詳細的大綱，另行

發表。

第一：屬於兒童的，從初生到前期青年期（約十四歲）都屬於這期，暫分下列三個時期：

（一）嬰兒期的課程 嬰兒唯一的課程是按時吃，睡，便溺，洗澡等幾種養護。爲着集中人力起見，嬰兒似有公育的必要。在經濟力量不能做到盡善盡美的養護時，必須做到能夠不妨害嬰兒的教育。

（二）幼兒期的課程 在課程的形式方面如遊戲，故事，唱歌，工作等都可以保留，但是整個幼兒生活必須緊緊把握住「集體生活」的原則，盡力克服幼兒唯我獨尊的心理。各科的材料，必須利用兒童興趣，集中在「抗敵」「世界和平」二點上。戰時的幼稚園與嬰兒院應該合辦，並且應該採取公育的辦法。

（三）兒童期的課程 在戰區的兒童，直接可以做抗戰的工作，如間諜，通信，救護，檢查等。所以戰區的兒童除一般課程外，必需選擇體力能夠勝任的兒

童，特別注重這許多工作。一般的兒童課程是：民族意識，抗戰意義，戰時常識，一切文字語言等必須用這三點做實質。用每一村或每一街里為組織單位，實施集體的生活教育；根據即知即傳的原則，採用小先生制等，實行前進的小孩教小孩兼教成人。

第二：屬於工人的，工人本來是有組織的，並且對於本身的意識也相當清楚。利用工人原有的組織，實施集體的生活教育比較容易。不過必須強調「抗戰意義」，「民族意識」二點，這樣纔能使工人了解在現階段必須先抗戰才有工人出頭的希望。工人的技術是需要相當學習時期的，訓練抗戰必需用的工人技術是工人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點。改變平時工業學校的迂緩方法及徒弟制的壟斷方法也是必要的，在戰時訓練工人技術，必須用突擊的方法。

第三：屬於農民的，農人是安土重遷的，利用這一點可以實施抗戰教育。擴大保鄉的工作便是抗戰。聯保組織不是農民組織，所以必須從農民自身利益上來組

織，從這個組織裏來施行教育。農民也有相當技術，改進耕種的方法是農民教育中極重要的一科。不過必須與抗戰有利一點配合起來，各種烟草鴉片等是有害於抗戰的必須即刻停止，又如爲着敵人種棉花等也應當停止。所以「農民技術」一科，必須遵守整個抗戰國策進行，不能以個人的收入爲利誘。

第四：屬於士兵的 中國今日抗戰士兵，都經過多年訓練。但是在訓練上是否應該增加二科？一是游擊戰，二是政治訓練。這二科有一部分是互相關聯的，如游擊戰的基礎是民衆組織；軍隊要做組織民衆的工作，能夠與民衆組織配合起來作戰，必須有充分的政治訓練。

第五：屬於店員的 店員佔市民的多數，但是從來沒有很堅強的組織。所以「組織店員」，與「了解抗戰的重要性」，是店員課程中最重要之二科。許多補習學校平時以補習店員的技術爲唯一目的，今後應該把這些技術科目放在第二位。

第六：屬於中學生和大學生的 過去教育眼雖然不應清算，但也不能不急去

補救。過去中學生和大學生的政治訓練是不夠的，尤其是實踐方面很欠缺，所以這方面應該特別加強。其次中學生與大學生已有的能力是各不相同的，應該斟酌他的能力，立刻在實事上學習，使他的能力突進。例如學工科的學生，過去學了三年還不能實用，現在必須在一個月內使他已有的知識在實踐上與工作緊緊地配合起來。其他如文科，法科，醫科，商科，教育科等都應該如是。

第七 屬於婦女的 凡女學生，女工人，女店員和農家婦女都可以引用前幾項課程。只有一般家庭婦女，平時真是過着天高皇帝遠的生活，戰時不但不能有助於戰士，反而爲壯丁們的累贅。在抗戰期中可以運用許多臨時組織如里弄組織等，使這批婦女從家庭裏跑出來參加集會，又從集會中加以初步的政治訓練，同時分派她們做各種有助於抗戰的工作，如做戰士的衣服等。經過一個時期，指導這批婦女自己單獨組織起來。

第八：其他 不屬於上述七類的民衆很多，如和尚，尼姑，道士，教士，無

職業的遊民，（靠幫口吃飯的流氓也應列入這類）妓女，舞女，肩販等。這許多不同職業的民衆，有的在戰時不得不失業的如妓女等，有的可以歸類的，如和尚等可以總稱爲教民，分述如下：

（一）教民 各種宗教爲着維持他的當地勢力，對於戰爭決不會袖手旁觀的。所以這次抗戰發動，教民參加救護等工作很踴躍。我們應當趁這個機會給他們正確的政治教育，使教民明瞭抗戰的真義，參加抗戰中救護等工作不是爲着神道。

（二）遊民 遊民與失業羣不同。遊民是各業中都有的，平時完全靠敲詐過日子。這般遊民在戰時的危險性很大，——做漢奸。不過遊民都有封建的組織。通過這個組織，抓住他們的龍頭，施行正確的政治訓練，同時用分配失業羣的辦法，分配他們到各業去。利用遊民已有的能力，給他各種技術的訓練，也是很重要的功課。

(三) 肩販等 與肩販同性質的有車夫，挑夫等。在鄉村裏都是農民的副業，在都市裏才是專業。這些人本來有組織的，不過是幫口的組織，缺乏政治作用的。所以改進他們的組織，應該是最重要的一科。初步的政治訓練當然可以在改進組織中做去，就是說改進組織與初步政治訓練是一件事的兩面。

(四) 屬於官吏及公務人員一部分，在戰區內的，只能在各項公務上受訓練，在後方各省可以用最迅速的方法，集中訓練，科目注重於消除養尊處優的態度，養成辦事迅速與認真的精神，並糾正對於政治的認識，至於各種技術訓練，在事實上是來不及做的。

末了，必須提出來的，就是對於有專門學問的學者。平時已有的研究院，不但不應廢棄，並且應當擴大，同時也應當竭力增加研究的效率。真理與學術決不會騙人的，在今日的中國，誰能夠對於民族解放的抗戰有供獻的誰就是有真本領真學問；同樣的，無論那一門學問，倘若對於世界和平與中華民族解放運動最有供獻

的，這門學問，我們必須盡力研究。不然，無論是玉皇大帝創造的學問；無論是天之驕子的學者，我們只好請他罷休！（抵抗第九號）

民衆武裝論 李華卿著

民衆武裝究竟是什麼呢？它與全面抗戰有什麼關係呢？它在怎樣的條件之下才能夠完成呢？它應該怎樣的組織運用呢？呢與遊擊戰術有什麼關係呢？現在經李華卿先生竭其對軍事學研究的所得，並以科學的方法與態度作了一個週詳的敘述與解答。全文兩萬餘言，一脈清新之氣。至於裝幀之優美，定價的低廉猶其餘事。在這緊張而偉大的時代裏，理應早讀爲快。

定價：法幣壹角

代售處：
一、救亡日報館：
二、進化書局：
三、五洲報書社：

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六三一號
上海拉都路敦和里內源源里十七號
上海望平街二二一號

戰時教育的教師（生活教育社提出）

張勁夫執筆

根據前面我們所提出的基本意見，戰時教育的中心準則，便是「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或「集體主義的實踐教育」。我們認為戰時教育的教師，已隨着戰時教育內容方式的根本改造，而變其性質了。他雖然還是存在的，但已失去了超然的地位，絕對的意義。他已不是像過去那種如「教死書」「死教書」爲生的教書匠，而是集體實踐抗戰工作上的工作指導員，或文化技術輔導員。他教育人，同時也接受人的教育；他影響人，同時也接受人的影響。在集體生活裏面，他不是一個超然的空頭先生，而只是執行集體工作，推動集體生活最積極主動的一員。我們必須肯定：所謂教育的作用，不是死知識的傳授，而是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生活與生活磨擦下面發揮的。所謂教育的效能，不是死知識的記分，而是在具體工作的實踐與開展上面來考察的。

根據我們所提出的具體辦法，我們認為要開展戰時教育工作，目前迫切地需要着如下的教師：

等一，在各種大學專門學校研究所方面，需要自然科的各種技術專家，以及各部門的專門人才。

第二，在中小學生的抗戰工作組織方面，需要大批的青年兒童的工作指導員，文化技術輔導員。

第三，在各種戰時工作組織，職業團體方面，需要政治及戰時常識的技術指導員。

第四，在一般民衆方面，需要着最大量的民衆教師，——民衆運動的工作幹部。

推行戰時教育有一個核心要求，便是要「速」而「有效」。目前究應如何很快的來解決上面所提出的教師問題呢？我們認為有兩個根本要點：第一對原有的教

師，絕對不能估計過高，須得很快的把他們大大的訓練改造一番，改造他們必須是要合乎：一、對抗戰有正確的認識，二、適於集體主義的生活，三、能在實踐工作上面輔導人影響人的條件。第二，對七十二行的手藝人，廣大的前進青年兒童及民衆，絕對不能估計過低，他們只要加以短期的緊急訓練，便都可以成爲有力的技術人才，政治文化輔導員，宣傳與組織的幹部。依此我們認爲須迅速的用如下的方式來解決教師問題：

在各種大學專門學校研究所方面，首先要把原有的教授技師，加以短期的訓練，如不夠，再向國內及友邦去廣泛的搜羅。

在中小學生的戰時工作組織方面，須把原有中小學教師加以根本的改造。再充分運用大學裏面的優秀份子，加以短期的教育訓練，便都是很好的中小學教師。

在戰時工作組織及各種職業組織方面，重在集體自我教育。臨時需要的政治教師或技術教師，可與政治工作的團體及技術機關取得連繫。

在一般的民衆方面，這是戰時教師最主要的一個部份。我們認爲須舉辦大量的幹部訓練學校，每縣至少辦一所。招收文化人、普通科的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及前進的大衆，分成若干組，加以軍事政治文化技術的普遍訓練，其訓練辦法可分三點；一、首先集中在一起，訓練基本的學科。爲期最長可過半年，頂好是兩個月。二、然後分發出去担任各部門工作，每週分區舉行訓練一次或兩次。三、再以其工作性質分成若干組，經常作研究活動，另請專家巡迴輔導。出席各組研究會，作經常的巡迴訓練。戰時教育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把一般散漫民衆訓練組織起來，因此，解決一般民衆的教師問題，是當前最迫切的一件工作。

目前也正有着許多人在談戰時教育問題，然而他們所談的戰時教育，內容既不求根本改造，對廣大的民衆教育更忽略不管。因此。在教師方面，他們所考慮的，只是替原有的找出路尋飯碗，既不改造舊有的，又不提訓練新的幹部。我們可以說，這種戰時教育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我們要向廣大的教育工作者號召，要實行戰時教育，絕對不是你過去那副身手所能勝任的，你必須自動自覺的來在當前偉大的抗戰洪爐裏改造自己，鍛鍊自己，使自己真正成爲一個能幹而強有力的戰時教師，——不，抗戰工作指導者。

我們要向廣大的文化人青年學生前進民衆小孩子號召，你們不是要獻身抗戰嗎？來，請到教育的戰綫裏，來作普遍而深入的民衆動員。請不要忘記，沒有廣大的民衆起來，我們的抗戰是不會有光輝的前途的。

當客觀存在着變革的根據時，人的努力，便是舉足輕重的條件。全國教育工作者攜起手來，加強我們的戰鬥力，擴大我們的戰線，守緊我們的崗位，面對着廣大的青年民衆努力吧！——作艱苦而實在的努力吧！

附上海市戰時普及教育服務團工作大綱

一·工作總路綫

(1) 在戰時工作的組織中進行教育。

(2) 將民衆組織起來，進行教育。

二·工作的原則

(1) 在有組織的行動中，執行全面抗戰時的自我教育以輔助他人計劃學習爲主要任務。

(2) 在各個不同的對象中運用各種不同的形式；但以抗戰爲歸宿。

(3) 教育民衆的組織，應從文化的，經濟的發展到戰時工作團體，在每一個進程中引起其自覺。

(4) 全面抗戰越發展，都市將越縮小，因此本團工作，應特別注重鄉村。

(5) 文字符號爲民衆取得抗敵救亡知識的必要工具，因此本團應鄭重注意文字之普及的工作。

(6) 接受黨政機關指導，並取得當地駐軍人士密切聯絡。

三·工作內容

(1) 在各種與本團有關係的組織（包刮已有的及新創的）內，進行集體主義的教育。

(2) 在各種與本團有關係的組織內，進行一般政治教育。

(3) 在各種與本團有關係的組織內，就主觀力量所及的範圍內，進行戰時技術教育。

(4) 在各種與本團有關係的組織內，進行宣傳，組織民衆之理論經驗的教育。

(5) 在文盲中施行識字教育。

(6) 運用原有的學校及教育團體，改造質的內容，遇行適合戰時的教育。

四·工作及其進行

(1) 本團之下層基礎工作：

甲、在已有的各種戰時組織中，如：

a. 軍隊 b. 義勇軍 c. 救護隊 d. 傷兵醫院 e. 偵察隊——等。

乙、在鄉村裏，在生產與職業性的組織裏，如工廠，店舖，礦穴中，建立經濟性、文化性、或戰時工作性的團體如：

a. 互助會 b. 讀書會 c. 歌詠會 d. 國術隊 e. 俱樂部 f. 工人義勇隊 g. 保衛團 h. 農民義勇隊 i. 除奸團 j. 偵察隊 k. 失業工人會 l. 婦女救國會等，按需要分別舉行 1 2 3 5 四種教育。

(2) 推動地方當局及學校當局改變教育機構

1. 建立中學生救亡協會；

2. 建立小學生救國團；

3. 建立小先生團，小先生隊。

輔助其執行上款 1 2 3 5 各種教育工作，并進行彼等自身之自我教育及上款之第四項教育。

(3) 在上述各組織中，選擇優秀分子開辦訓練班，培養各團體自我教育幹部。

(4) 本團團員自身之自我教育：

1. 一般的訓練（包括政治集體自我教育，宣傳與組織）；
2. 戰時技術的分組訓練；
3. 其他文化上的修養。

(5) 擴大戰時教育運動：

1. 出版定期刊物。
2. 建立戰時普及教育服務網；
3. 口頭宣傳；
4. 擴大組織。

(6) 戰時教材編輯：

1. 兒童戰時教材；

2. 民衆戰時教材；

3. 宣傳組織民衆之理論及經驗。(抵抗十一號)

文

化

當前宣傳上的幾個問題

施復亮

——同時也是理論上的及行動上的問題——

(一) 輕視理論是對的嗎？

「現在是實際幹的時候，不是空談理論的時候」。「現在所需要的是實際的方案，不是空洞的理論」。這差不多已成爲一般流行的意見，是多數人所認爲「無可非議」的了。有許多朋友聽了這樣的話，也就老實只管埋着頭幹，而不肯抬起頭看一看，更不肯絞着腦想一想。這種精神是可敬的，但是這種態度是對的嗎？

要「實際幹」是對的，但是怎樣幹呢？幹底前途和結果是怎樣的呢？「實際的方案」是需要的，但是你底方案是根據什麼原則來製定的？用什麼方法和什麼力量

來實行？實行底結果將怎麼樣？這些都需要我們抬起頭向各方面看一看，統着腦向各方面想一想。

現在我們在「實際幹」的當中，遇到了許多困難問題。我們所提出的「實際的方案」多半沒有方法或沒有力量實行。例如組織民衆問題，肅清漢奸問題，救濟難民問題，救護傷兵問題，慰勞將士問題，軍隊中恢復政治工作問題，改革政治機構問題，救國公債問題，戰時統制經濟問題，保障貧民生活問題，戰時救國教育問題，對日絕交問題，中蘇互助公約問題，以及對內對外宣傳問題，這些都是應當「實際幹」的，但是有的幹得不好，有的幹得不夠，有的簡直還沒有幹。有許多「實際的方案」提供出來，也沒有人理會。這是什麼緣故？我們不能不抬起頭向各方面看一看，統着腦向各方面想一想。

因此，嚴正地說起來，我們固然需要實際的幹，同時也需要切實的想。「不想」的幹是盲目的幹，「不幹」的想是空虛的想。幹與想是應該統一的，即想好了

幹，幹好了又想。這就是理論與行動底統一：根據理論去指導行動，根據行動來充實理論。在每一個有所行動的人，尤其是參加這有關於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戰工作的人，決不能輕視或忽視正確的理論。只有正確的理論，才能解答我們底困難問題，才能指示我們向正確的方向去行動。

一種正確的理论，決不是某一個人憑空所能幻想出來的；那一定是綜合無量數人底無量數經驗而成的。既成的理論，雖然不一定完全適用於當前的行動，但要使當前的行動向着正確的方向發展，絕對必須有一種正確的理论來指導。我們當前的抗戰，如果要達到最後的勝利，也無疑地需要一種正確的理论來指導。

現在我們所需要的理論是促進抗戰勝利的理論。我們抗戰底目的，是要根本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新中國，以達到中華民族底澈底解放。因此，我們底抗戰理論，就必須能夠幫助我們達到這個目的。理論宣傳底重要，也就在於這一點。

可是我們日前在宣傳上竟不知不覺地犯了許多錯誤。這些錯誤的宣傳如果讓它流傳下去，對於抗戰底前途一定會發生不良的影響。我希望我們大家及早來糾正或防止這些錯誤。

(二) 過份誇張自己底力量和勝利

過去有些恐日病者和親日派，以爲中國根本不能跟日本作戰，中國底軍隊，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都不及日本，如果跟日本作戰，一定要失敗。這種理論，當然是漢奸理論，已經被一個多月來光榮的抗戰事實打得粉碎了！

可是現在却發生了一種相反的理論，以爲我們底軍隊在種種方面都好過日本，單靠我們底軍隊便可以戰勝日本。這種理論也同樣是不正確的，有害的。誰也不能否認，我們底將士比日本底將士勇敢而肯犧牲。我們底將士那種前仆後繼奮勇殺敵的精神，是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的。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我們底武器不及

別人，我們底經濟力也不及別人，單拿我們血肉的身體去跟敵人底較大經濟力所生產的飛機大砲相搏鬥是不能持久的。因此，我們除了動員全國一切軍事勢力去跟日本作戰外，還必須動員全國一切政治勢力和經濟勢力去促進抗戰底勝利。現代的戰爭，任何國家都不能單靠軍事力量來獲得最後勝利，何況半殖民地的中國。過份地誇張自己底軍事力量，會使我們放鬆政治的及思想的動員，而招致我們所極不願見聞的惡果。

過份地誇張自己底軍事勝利，結果也是不好的。我們自然希望有軍事上的勝利，因為勝利可以鼓勵我們底勇氣，提高我們底自信心。但我們也不必諱言軍事上的失敗，因為失敗也會引起我們底憤怒，激動我們底復仇心。「勝敗是兵家之常事」，戰敗也。用不着隱諱，而且應當把戰敗底原因敘述出來，以便大家都接受失敗底教訓。無論勝敗，我們都要求有正確的報導。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國家，用不着對民衆欺騙。關於軍事上的佈置和作戰計劃，我們固然不能要求知道；但關於作

戰底經過，我們是應當要求知道的。我們希望報章上關於戰況有更正確的記載，不要過份地誇張自己底勝利。像過去那樣過份的誇大宣傳，結果是很壞的，幾乎令人對於真實的消息也不相信了。最壞的結果是令人把戰事看得太簡單大容易，一遇到挫折就以爲大事去了！我們要知道：我們所遇到的是一個武器勝過我們的強敵，我們與它作陣地戰在某一時候某一地點失敗是不足怪的，我們能夠死守住某一定的陣地，多抵抗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使敵人費了很大的代價才能爭得尺寸土地，那便算是我們底勝利。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永遠只有一步一步地往後退。沒有獲得最後勝利的可能。恰恰相反，只要我們能夠發動全國一切力量抗戰到底，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如果我們有了這樣的認識，那就不必過分誇張目前一時一地的勝利了。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對於敵人和自己底力量，都要有正確的估計，不要過高，也不可過低。我們不可害怕敵人，也不可輕視敵人。

(三) 對於日本一部份統治者的幻想

近來流行了一種意見，以爲日本侵略中國完全是少數野心軍閥（尤其是法西斯蒂化的「少壯軍人」）底私意，並不是日本統治階級底總意。有些人甚至於把日本底另一部分統治者（元老重臣及財閥）描寫得非常「可憐」而值得人們「同情」，希望他們跟我們結成聯合戰線：當我們從外部打擊日本軍閥的時候，希望他們從內部去制裁日本軍閥。彷彿我們底抗戰，也就是替日本底元老重臣財閥「打抱不平」。好像只要日本底元老重臣財閥們當權，天下就會太平，我們就不會受侵略了。

其實，這種意見是根本錯誤而且非常有害的。這種意見，根本不了解日本侵略中國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根本不了解日本帝國主義底特質。我們要知道：日本資本主義底發展，一開始就帶有軍國主義的性質，採取好戰的態度。日本資本主義是在戰爭中長大起來的。日本底每一次對外戰爭，都促進日本資本主義底

飛躍的發展。可以說，離開戰爭便不會有日本現在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一八九四年至九五年底中日戰爭，一九〇四年至九五年底日俄戰爭，一九一四年底日德戰爭（世界大戰）以及「九一八」以來對華的不斷進攻，都是日本資本主義向外發展的必然表現，也是它底「大陸政策」必然要採取的步驟。日本帝國主義底特質，就是以軍事勢力去補充並代替資本勢力底不足。日本底「二重外交」和「二重政權」就是基於這種特質而生的。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但是這種矛盾是統一的，因為日本資本主義如果沒有軍事勢力來補充或代替，根本就不會有現在的資本勢力，即不會有日本底帝國主義。軍事勢力底獨佔，本來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底一個本質的部分。

因此，我們敢堅決地說：日本帝國主義是與中華民族不能兩立的。它一開始發展就向我們進攻，四十多年一直沒有停止過。一八九四至九五年底中日戰爭以及「九一八」以來不斷地對我們進攻是不用說了，就是一九〇四至〇五年底日俄戰爭與

一九一四年底日德戰爭，其目的也在於爭奪中國領土底支配權，前者在於奪取東三省底實際支配權，後者在於奪取山東省底支配權。現在我們國家底領土，差不多已有一半實際被握在日本帝國主義底手裏了。只要日本帝國主義存在一天，就必然要向我們不斷地進攻，非把整個中國變成它殖民地不止。不管日本底政權被握在哪一部分人手裏，只要它底經濟基礎不變，它對我們的侵略決不會停止。我們對於日本統治階級底任何部分，都不應當有一絲一毫的幻想：希望他們會改變對中國的侵略政策。我們要生存，我們不願做奴隸，我們只有澈底地抗戰，直到根本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為止！我們發誓不願與日本帝國主義「共存」於天地之間！主人與奴隸絕對沒有「共存共榮」之理！

不錯，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階級之間，關於對華侵略的意見並不是完全一致的，有的主張急進，有的主張緩進，有的主張用硬性的手段，有的主張用軟性的手段，有的主張「硬軟並施」。但是這些，並不是有什麼原則上的不同，只是有些方

法上的不同。他們底目的都在於支配整個中國，把整個中國供日本發展資本主義的犧牲。不過他們對於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却有不同的意見。所謂元老重臣及輕工業資本家，是主張用經濟的，外交的方法慢慢地把中國滅亡於無形之中的，就是主張用軟性的手段或「硬軟並施」的。所謂軍部及軍需工業資本家，是主張用武力的進攻很快地滅亡中國，使中國「喪失戰意」而後已，就是主張用硬性的手段的。我們可以把前者叫作緩進派，後者叫作急進派。由於國內政治勢力及國際情勢底變化，這兩派在對華侵略政策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有或多或少的變化。幾十年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在表面上之所以有「忽硬忽軟」的不同，就是由於這種原因。可是從「九一八」以來，急進派在日本政治上的地位已經日益佔得優勢，而且利用戰爭來鞏固並擴大這個優勢了。在相當範圍內，緩進派也還有一些牽制的作用，急進派還不能忽視緩進派底意見。急進派之所以能夠大膽地用武力來進攻中國，根本上是因爲他們是代表日本帝國主義底要求和利益的。而且可以說，在這法

西斯蒂化的帝國主義時代，在這行將沒落的帝國主義時代，只有這急進派才是最能代表日本資產階級底利益，反映日本資產階級底要求的。有時整個資產階級底利益是可以與個別資產者底利益衝突的。資產階級政府有時可以為擁護整個資產階級底利益（能不能達到這目的是另一問題），而犧牲某些個別資產者底利益。這次中日戰爭，便是最明顯的例子。日本帝國主義急進派這次對華的進攻，不但有整個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做根據，而且顯然是得到日本資產階級（至少是大部分）底擁護的。日本底元老重臣及財閥，並不像有些人所想像那樣「可憐」而值得我們「同情」。他們在本質上是與日本底軍閥一樣的。西園寺公望對於中國民衆，不見得會比杉山元好過哪里。恰恰相反，日本軍閥底武力進攻，會激起中國軍隊底武力反抗，喚起中國民衆底抗日運動。日本帝國主義緩進派底「中日親善」「中日經濟提携」「中日共存共榮」「農業中國工業日本」等軟性的侵略政策，是會消滅中國民衆底「抗日意識」，在不知不覺之間滅亡中國的。所以我們如果真正要求中華民族

底澈底解放，決不應該爲求縮短戰爭而對於日本底另一部分統治者有所幻想。戰爭底持久，對於我們民族解放前途無妨礙。戰爭底中止（假使日本帝國主義採取「適可而止」的政策和「逐步蠶食」的政策），才會阻礙我們這一空前的瀰漫全國的抗戰運動而使我們受到很大的打擊。

（四）誤認爲中日兩大民族底衝突

有好些人以爲這次中日戰爭是中日兩大民族底衝突，是全中國人與全日本底鬥爭。他們看見日本帝國主義底慘無人道，屢次轟炸無辜平民和救護人員，到處慘殺虐待我們底同胞，就主張採用報復政策，以同樣的方法對付一切日本人，甚至主張虐待或殺戮俘虜。這種意見也是錯誤的，我們不應當盲從。

不錯，我們爲打擊敵人及爭取勝利起見，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施行某些報復手段，是應當而且必要的。我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我國土地，封鎖我國海岸

的行動，更應當立即施以報復，立即沒收日本在華的一切公私財產，立即驅逐一切日本人出國（真正同情我們，幫助我們的日本人除外）。但是我們不應當糊里糊塗地對一切日本人施行報復，更不應當虐待俘虜。

我們要知道，這一次中日戰爭，在本質上決不是中日兩大民族間底戰爭，乃是中國被壓迫民族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我們底敵人並不是整個日本民族，只是日本少數帝國主義者——軍閥財閥（元老重臣也包括在內）。我們不要打倒日本民族，只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不僅壓迫中華民族，並且壓迫它自己國內的工農大衆及小市民。日本底工農小市民，不但不是我們底敵人，而且是我們將來抗戰中最有力的友軍。日本底士兵差不多全是工農小市民。他們是被欺騙被壓迫來打我們的，是真正「可憐」而值得我們「同情」的。所以當他們被我們俘虜過來的時候，便應當優待他們。鼓動他們將來回去革命，跟我們攜手協力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如像前面所說，把日本底一部分統治者認作我們底朋友，根本是錯誤的。反之，把一切日本人都認作我們底敵人，也是根本錯誤的。我們對於日本底任何統治者，都不應有任何幻想；但我們對於日本底工農小市民，却應當運用一切方法去聯絡他們，使他們跟我們聯合在一起，一致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底抗戰越持久，這種可能性也就越大。

(五) 過份重視物力

赤手空拳決不能抵抗飛機大砲，那是不用說的。現代戰爭需要巨大的物力做基礎，那也是沒有疑義的。我們要抗戰，不但需要一定的武器，而且需要一定的經濟力，這是每個人都承認的。

因此，有些人便過份重視物力，以為物力有最後的決定勝負的作用。其實，這種意見也是不正確的。如果物力真正有最後的決定勝負的作用，那末我們底武器和

經濟力既然都不如敵人（這是不用諱言的），我們底抗戰便自然只有失敗了。這種理論，會使我們悲觀消極，害怕敵人，不知不覺地走到妥協投降的道路上去。

可是事實上，物力並不一定有那樣可怕的作用。在相同的社會條件之下，誰勝誰敗，物力確實會起着決定的作用。但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之下，起着決定的作用的却是人力，並不是物力。歷史上各種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其原因便在於此。這是因為物力是人力所創造的，而且是由人力來利用的。

中國與日本底戰爭，是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之下來進行的，人力底作用一定大過物力底作用。日本底士兵是爲少數帝國主義者底利益而戰爭的；戰爭越延長，他們底犧牲就越大，他們底生活就越苦，他們就會慢慢地厭惡戰爭，不肯戰爭，甚至「倒戈相向」。中國底軍官和兵士是爲中華民族爭取生存和自由而戰爭的；戰爭越延長，他們底自信心就越會增長，他們底意志就越會堅定，他們底戰鬥經驗就越會豐富，他們就會越勇敢地越有把握地去戰勝敵人。假使我們能夠使政治與軍事配合起

來，使政治底進步趕得上軍事底進展，假使我們能夠把廣大的工農羣衆組織起來，使他們一致地參力抗戰，假使我們能夠善用一切人力去創造一切物力，使用一切物力，進行持久的全面的抗戰，那末我敢斷言，即使我們底武器和經濟力不及敵人，最後的勝利也會一定屬於我們。

(六) 忽視和平妥協底可能性

我們底抗戰，需要全面的抗戰，同時也需要持久的抗戰。只有持久的全面的抗戰，才能爭取最後的勝利。只有在軍事上、政治上、外交上、經濟上、教育上、思想上實行總動員，只有把工人、農民、商人、學生、自由職業者全部組織起來，才能進行持久的全面的抗戰。也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不會中途妥協投降。

現在除了極少數人（至少就言論界來說），差不多都不注意有和平妥協底可能性。有許多從事宣傳工作的人，過份地誇張全面抗戰底形勢，彷彿覺得從此不會再

有妥協運動底抬頭了。過份的樂觀，將來也許會引起過份的悲觀。

的確，過去是「主戰者不敢言戰」，現在是「主和者不敢言和」了。但是過去「主戰者不敢言戰」的「戰」，現在居然實現了，而且大規模地進行一個多月了。那末現在「主和者不敢言和」的「和」，怎樣能夠保證它一定不會實現呢？只要有「戰」底因素存在，雖然「不敢言戰」，在某一定的條件之下，也是要「戰」的。只要有「和」底因素存在，雖然「不敢言和」，在某一定的條件之下，也是會「和」的。

現在「和」底因素還有沒有呢？無疑地還是有的。第一，過去「主和」的那一部分社會勢力還依然存在，而且還占着很大的勢力；第二，過去「主和」的那一部分人物還公然占據在政府關機內，沒有從政府機關裏面被排除出去；第三，某幾個友邦（尤其是英國）公然企圖調停這次戰爭，希望把這次上海戰爭甚至把華北戰爭當作局部問題來解決；（例如中立區底提議）第四，政府因為顧慮英美底態度及其它

種種原因，還不敢進一步跟蘇聯締結『互助公約』；第五，政府至今還沒有宣佈與日本斷絕一切外交及經濟關係；第六，政府至今還沒有澈底改革政治機構，實行政治總動員，發動廣大的民衆運動。有了這些事實存在，和平妥協底可能性依然是很大的。忽視這種可能性，不但是自欺欺人，而且是對於抗戰前途有很大的妨礙的。

我們爲保障過去既得的光榮的勝利，爭取將來最後的勝利起見，應當一致地努力設法一步一步地來克服這些和平妥協底可能性。

(七) 忘記宣傳對象

我們底宣傳對象是中國民衆，不是外國人民和外國政府。一切用中國文字寫的文章，看的人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中國人，而不是外國人。所以我們底報章和雜誌，應當正對着中國民衆說話，不應當正對着外國人民和外國政府說話。可是近來我們底言論界，却有很多文章是專門對着外國人說話的，我真不知道浪費了那麼

多的紙張做什麼。最明顯的是上海各報對「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評論。照道理說，關於這一問題的評論，一方面應當向民衆解釋這一條約底消極的和積極的意義，同時還應當代表民衆底要求，希望政府進一步與蘇聯締結「互助公約」。可是我們遍閱上海各報，都沒有這樣的意見提出。它們幾乎千篇一律地向外國人解釋這一條約底平淡無奇，深怕外國人會懷疑我們馬上「赤化」似的。這真是一件怪事。它們竟會忘記閱讀這些「中國報」的是中國人，竟會忘記對中國人解釋，只注意對外國人解釋。關於「中立區」問題的宣傳也是一樣，只怕得罪「友邦」而忘記了自己底利害。彷彿「友邦」底面子比我們自己底利害還要緊。何況「友邦」底面子早已由政府底答覆顧全了，爲什麼還要我們那樣賣氣力地去討好呢！我以爲這樣的心理和態度不改變，我們底抗敵宣傳是不會有效果的。

其次，我們底宣傳對象是民衆，也不是政府。我們應當多對民衆說話，少對政府說話。就是我們向政府提出的「建議」，既然公開地發表出來，也應當具有對民

衆說話的意義和態度；不然，儘可以秘密向政府上「條陳」，又何必公開地發表出來呢？我們底意見發表出來，得到廣大民衆底同情和贊助，造成了一種輿論，便會或多或少地影響政府底政策和行動。自然，我們底意見必須是正確的意見，必須是真正能夠代表大多數民衆底利益和要求的意見。

最後，我們還應當始終站在民衆的立場上來發表我們底意見。民衆要求持久的全面的抗戰，要求政治底民主化，我們便應當站在民衆的立場上，一步一步地努力促進政治底民主化，推動持久的全面的抗戰，以達到中華民族底澈底解放。

（文化戰線第三期）一九三七，九，十七。

文化的抗戰與抗戰的文化

沈志遠

當黃浦江畔砲聲初響的時候，一般顛沛流離的上海文化人中間，頗流行着一種消沉的墮頹的思想，彷彿戰端一啓，文化人原有動筆和動口的地盤都被砲火毀壞無餘，所以變成完全無用的東西了；文化人既不中用，連帶地文化本身彷彿也變成無用——至少是不重要了。

儘管讓那些自暴自棄的悲觀論者去呻吟吧，嚴酷的現實迫着他們很快地停止那種呻吟而覺悟到自己在爭民族生存的神聖抗戰中的重大任務。現在我敢說誰都不能不承認：文化的意義並不隨砲聲而消失或減退，而是隨軍事抗戰的展開而日益增高的。應當說，文化抗戰是全面抗戰中的一面，而且是極重要的一面。現在我們看到文化抗戰的各方面正在開始進行，縱然是十分迂緩，不痛快而且很遠地落後於軍事的抗戰。

關於文化抗戰的重要性，現已大家明瞭，似乎無需多講。這裏所要討論的是：拿什麼或從那些方面去進行文化的抗戰？

「文化」這一概念，是包容很廣的；可以說在物質和精神，政治和經濟諸領域內，莫不有文化的蹤跡。但是這樣說起來，未免太廣泛了。如果依照這樣的解釋，那末文化抗戰就無異全面抗戰，因而這樣的解釋實等於不解釋。

這裏我們所講的文化，當然是指平常人們所理解的文化，亦可以說是狹義的文化。這種文化，主要地是指所謂意識的『上層建築』(Ideological Super-structure)而言：政治覺悟、思想、學術、文藝、戲劇、教育、新聞、出版等等方面。因此，所謂文化抗戰，就是這種種方面動員起來以加強和推進全民抗戰的陣勢，它須跟軍事、政治、經濟、外交各方面的抗戰緊密地配合起來，以促成真正的最後勝利。

我們明白了這點之後，前面所提出的問題——拿什麼或從那些方面去進行文化的抗戰？——就有了解答的頭緒了。

我認爲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環，是喚起民衆，啓發民衆的政治覺悟。大家知道，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中，至少有三萬萬以上是政治的盲人。我們常拿人口的衆多，民衆的政治力量，當作我們超過敵國的優勢之一着，這固然是事實；但同時也不能抹煞另一事實，即敵國人口雖祇七千餘萬，但至少有五分之四是多少具有政治意識的；而我們有三萬萬以上即三分之二以上的同胞，却連個「國家」觀念都沒有，莫說理解什麼「救亡禦侮」、「民族解放」這類深奧的口號了。不但如是，即其餘的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民，縱然多少有些政治意識，但真能認識這次全面抗戰之意義和理解自己在抗戰中之責任的，到今日爲止恐怕還要大打折扣，真是少數中之少數了。

這樣，四億五千萬人中，有三億以上對於政治完全迷盲無知，而其餘的一億多人中，到大多數又對這次抗戰和自己的任務沒有明確認識；這種情形，假如任其繼續存在下去，試問我們的民衆力量的優勢在那裏？我們的抗戰勝利的把握又在那

裏？

在拙文「澈底抗戰和領導民衆」（見文化戰線第二期）中我已說過，正因為我們的抗戰是爲自衛，爲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戰，是天經地義的戰爭，我們是絕對地站在正義和真理方面的，所以就絕對地需要把這種天經地義的正義和真理，向四億五千萬同胞的意識中灌輸。相反的，敵人的發動戰爭是爲侵略，爲滿足少數日本統治者羣的慾壑和野心，這種戰爭不但對日本廣大的民族毫無利益而且大大地有害，因此日本的統治者不可能把發動戰爭的真實動機公開坦白地向民衆宣佈；他們對付民衆的唯一手段是欺騙、蒙蔽、造謠、麻醉。

這樣我們可以明白，只有站在侵略、橫暴、自私的貪慾和野心之動機上的統治者，才不需要喚醒和啓發民衆的政治覺悟，而反需要麻醉和窒息民衆的自覺意識，亦即需要大衆文化的阻塞和反動。反過來講，站在天經地義的正義方面的我們，不但絕對不能阻塞民衆的文化，（在現時惟一的就是民族抗戰的文化）使之走向更黑

暗的反動，而且萬分急迫地需要積極提高大眾的文化水準——首先是啓發大眾的政治意識，使他們不但立即認識國家和民族的意念，而且須理解此次抵抗日本侵略的意義和自己的責任。敵人是害怕他的民衆覺醒；我們却不怕，而且用不着怕這個，我們怕的倒是民衆的迷盲、不覺醒、不理解現實的真相。

這裏要順便講到一事，即目前國內也很有些人（當然主要的在統治者羣中間）是害怕民衆覺醒的；他們以爲民衆一覺醒，現存的領導權就要發生問題，因此他們用種種方法和藉口去阻塞喚醒民衆的工作，去妨礙大眾的抗戰文化的開展。實際上這種害怕是毫無根據的。我想現在只有漢奸才會將民衆「喚」起來去反對抗戰的政府或奪取領導權。我要敬告害怕大眾覺醒的先生們：大眾的政治覺醒不但不可害怕，而且大大有助於抗戰之進展的；可害怕的倒是先生們自己的不堅決抗敵，假如先生們自己沒有蔣委員長所昭示天下的「抗戰到底，犧牲到底」的最大決心，那末民衆抗戰文化的開展，民衆一致抗戰到底的覺醒，才真成爲極可怕的东西了。

文化抗戰中的另一重要的環節，是思想的抗戰。在我們的思想陣線上，直到今日，蠹賊始終是很多的。在過去，主要的有唯武器論；在抗戰前夜，等待主義和失敗主義這兩個蠹賊特別猖獗；而現在則彷彿「唯軍事論」又在大抬其頭；此外，「左」傾的高調主義和阿Q主義，也隨時都在活躍。所有這些思想上方法論上的蠹賊，無疑地都是澈底抗戰和爭取最後勝利的道路上的重大障礙。因而跟這些思想蠹賊堅決地鬥爭，創造思想統一的陣容，實行抗戰時期大眾的思想武裝，乃是目前文化抗戰的重大任務之一。

文化抗戰的第三個重要的環節是教育的抗戰和抗戰的教育。關於這個問題，政府和社會輿論已經相當地注意到了：各種非常時期的教育方案被提出來了；學校的課程也在修改和補充起來以適應戰時的需要了；有些戰區大學已準備遷移到內地去或組織戰時的臨時大學了。所有這些事實，彷彿在在表明抗戰的教育已在着着進行，但是稍加細察之後就知道目前抗戰教育的準備工作，還遠遠落在一般的抗戰形

勢之後。嚴格地說，現在還沒有抗戰的教育，因而教育的抗戰自然也還談不到。最明顯的事實是除了一部分國立大學課程中添設一些所謂非常時的選修科目和相當地注重軍事訓練以外，在整個教育領土內（尤其是中小學教育和社會教育）完全看不到一點抗敵救亡教育的影子。例如教育當局對於各級學校特別是中小學校尚未提出抗戰時期的整個教育計劃。普遍實施抗敵救亡的政治訓練的計劃，也未聞提出。中小學校的教科書至今猶無修改的動議；敵人於強佔我平津之後當知立即實行修改教科書，以磨滅我青年兒童的民族意識，而我們當此民族存亡的緊急關頭，還不動議修改教科書，以適應非常時期的要求，這是何等嚴重的疏忽呀！至於社會教育，我國向來就很不發達，現在抗戰期內，為加強喚醒民衆的救國意識計，就更有特別努力提倡的必要：普遍地設立戰時的閱書報室，努力推廣救國播音與演講，張貼抗戰救國畫報等等，都是十分急需的步驟，這當然可與民衆運動同時並進。

最後，新聞的抗戰也是文化抗戰之重要的一環。這可以分為消極和積極的兩方

面：消極的是報紙應當用各種可能方法去根絕一切足以動搖和分裂我抗戰統一陣線。各種謠言和各種言論做劇烈的鬥爭，使之對民衆的意識不致發生不利於抗戰的影響；積極的是報紙應當號召推動組織和指導民衆的抗敵救亡運動，以加強軍事抗戰的力量。直到現在爲止，新聞界同胞對於全面抗戰確已有了相當的貢獻，但依據上述兩方面的任務來估量，實不能不說它距離應盡的任務還遠得很。關於這個問題我已另有專文（戴立報本月二十日言林欄），這裏恕不詳論了。

總之，我們文化人，在這全面抗戰的時期中，應該動員全部力量，拿抗戰的文化以實行文化的抗戰！（半月第一期）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

不能放鬆思想的崗位

艾思奇

在最近的申報週刊裏，看見一篇短文，曾說到『不要忘記了思想戰』。的確，思想的戰鬥訓練，在這實際的抗戰開始的時候，仍是不可忽視的。我們雖然不能說思想可以當做槍砲，可以上前線去殺敵；我們不是精神文明論者，以為單靠高曠玄妙的思想，就可以救人類救世界。我們承認殺敵的實際效果，必須在實際的戰爭上才能顯現，改造世界也必須用物質的力量，不是空洞的思想可以單獨達到目的的。但思想也有它的重大的作用。這作用雖然不能誇大地拿來代替槍砲，然而缺少了它，民族抗戰的工作也不見得就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思想的戰鬥，雖然不能代替實際的戰鬥，但實際的戰鬥却必須通過思想的作用。思想作用的準確與否，和實際行動的前途，有密切的關係。思想的作用是在於認識現實，看清前途，對組織的行動給與正確的指針。

目前有許多關於實際問題的論爭，已經就是一種思想戰。我們不能說現在的實際工作者真的都會忘了思想戰，但也確有不少的人對思想問題已表現了輕視的態度。這態度根源於兩個理由：第一是說，我們現在忙於緊張的實際工作，埋頭努力去做還來不及，那有工夫去注意思想問題或理論問題？這是從工作的必要上來否定思想問題的重要性，意思是我們只需要幹，不需要想。其次是認爲，現在我們要一致抗敵，人人只許統一於整個的愛國熱情之下，去努力，去行動，這時候不許再鬧思想問題，這對於一致行動會有妨礙；這就是工作的性質上來反對思想的重要性：意思是思想戰會破壞統一，所以現在的工作中不需要它。

這兩個理由，是出於兩種錯誤的見解。第一種錯誤的見解是忘記了思想和工作的關聯，工作和思想雖有分別，但工作中隨時有思想的運用，而真正的思想也必須隨時能解決實際問題，所以，工作問題常常同時就是思想問題，思想問題也不能不常常在工作問題中具體化。倘若所謂的思想只是學究的書本上的思想，只是「純理

論「純邏輯」的思想，那對於我們的實踐工作當然沒有用處，我們也不需要這種思想。倘若我們的工作只是純憑熱情的蠻幹盲動，那當然也不需要思想。然除了空理論的思想之外，我們還有不能離開實踐的思想，而我們的救國工作，也必須是有整個的計劃和整個的估量的工作。我們必須有堅定的一貫的態度，必須有正確的行動方法，我們必須從許多種的工作意見中找到最正確的意見，必須把不正確的意見克服，消除它的壞的影響。這樣一來，就不能說我們只需要幹而不需要想了。

第二種錯誤的見解是忘記了思想問題也有它的發展過程。只要不是學究式的「純邏輯」的思想，只要不是離開了人類實踐活動的思想，那麼，它的問題的提出方式也是跟着人類實踐活動的過程而不斷地變化的。思想的論爭在某一個時期會造成派別的分歧，但另一個時期却也會是真正的統一所不可缺少的東西。統一抗敵的力量不能是盲目妄動的羣團，而是需要最清醒的意識的結合。馬路上打死漢奸的行動，是人人一致認為痛快的，但如果單憑一時感情的衝動來行動，不能夠採取最好

的方式，就有被人利用反而打了自己人的危險。真實的思想活動只對於我們的一致行爲有益無慮，倘若客觀現實具有了統一的必要條件時，最能反映客觀現實的思想，一定也最能促成我們的統一。現在全面抗戰已經發生，全國人應該愛國，應該一致抗敵，已經是誰也不容疑義的前提。然而在這前提之下，仍可以有種種的結論：一個結論是說我們最後必勝，一個結論是說我們將化爲焦土，而敵人也沒有利益，一個結論是說我們也有亡的前途，戰也亡，不戰也亡，與其不戰不如一戰。結論的不同，可以形成不同的行動；而不同的結論，又根源於不同的思想。如果我們要在不同的行動中選擇正確的行動，就不能不在種種的結論中找到最合乎現實的結論，也就是要選擇正確的思想。在這選擇的時候，思想的爭論就有了意義。

現在的思想戰不是爲內戰而戰，是爲抗戰而戰，不是爲要給各派人分門別戶，而是爲要決定最好的方法走上共同的前途。不是要打自己人，而是要在打漢奸的時候防止誤打了自己的人。不是爲存宗派的獨佔權利，而是要盡各人最大的民族義

務。這是思想戰的目標，站在思想崗位上的人是不能放鬆自己的任務的。

但這只是一個大的原則，要使我們的思想戰在實踐中發揮最大的力量，是不能停止在空洞的大原則範圍內來討論的。思想的討論，必須在各種更實際的日常工作問題中具體化起來，我們要把正確的理論應用到最切實的問題裏去，而不要盲目的，沒有原則的工作。我們要有工作的理論，要通過理論去工作。才能把工作和理論同時健全起來。

我們的實際工作者，在工作中有了充分的思想的自覺麼？雖不能說全然沒有，但却決不能說充分。試看吧，抗戰發生了，是人人積極地向前去做的時候了，然而却有不少的人很消極，很苦悶。這不單是由於碰到了事實阻難，也還由於對工作沒有思想上的確定的把握。有的人在咀咒團體無用，把組織看做精力的浪費，半悲觀地去做他們的小組的工作。有的人却又因為找不到組織，因此說工作全無辦法，有的人只管組織組織，組織的空架子有了，却不曉得從何做起。倘若我們有了思想的

自覺的話，我們是不是應該排擊那組織的至上主義和工作的高蹈主義？我們是不是應該正確地來了解工作和組織的辯證法的關係？我們是不是應該從正確的把握中來澈底清除自己的無益的苦悶？

工作者沒有思想的自覺，那麼，羣衆又怎能有思想的訓練？熱情，憤怒在這抗戰的期間是不會缺少的，而且只怕太多！我們缺少的是冷靜考量，堅定的認識。打漢奸的熱情可以被抓手來利用，却不會想到應該有計劃地來杜絕漢奸的根源。馬路上無辜的人被打得半死，戰線上大羣的漢奸縱火却無可如何？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民衆組織的工作不夠，另一方面也正由於思想的訓練沒有普及到下層。我們現在還有人輕視民衆的力量，以爲單靠軍事就可以殺敵，又有人太輕視軍事的作用，看見民衆運動不能立刻展開，就非常悲觀。我們現在還有着種種單純的，片面的，形而上學的思想，在千萬人的頭腦裏橫行，阻礙着最全面抗戰力量的結合。

困難是要一步一步克服的，是要把各種工作配合在全面的戰爭中來克服的。我

們不是觀念論的精神文明主義者，不把思想戰當做萬能的法寶。如果沒有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以及一切實際的民衆工作做基礎，那麼，思想戰毫無意義。然而在這些基礎之上，如果竟忘記了思想的戰鬥和訓練，那也必然會在過程中產生莫大的困難和苦痛。因此，我希望在實踐工作中努力着的戰友們，不要忘記思想的自覺。不忘記在這條線上設立一座警戒的崗位。（文化戰線第一期）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

抗戰中的思想問題

沈志遠

全面抗戰中所包括的方面是很多的，思想的抗戰便是其中的一面，而且是極重要的。一面。

可是到現在為止，這一面和政治，外交諸方面一樣，也是比較得落後於軍事的抗戰的。思想是行動的指導，抗戰的行動不但必須所抗戰的思想與之相適應，而且思想必須站在行動前面去指導行動。現在隨着我們的抗戰行動的不斷進展，我們對政治，軍事上的賊蟲——漢奸，間諜和妥協分子，苟安分子們——的鬥爭，也一天天地加強起來了，但是我們對於思想上的蠹賊，對於漢奸準漢奸的思想，妥協，瓦全，悲觀，失敗的思想，以及對於一切足以阻礙全面抗戰之最後勝利的思想或主張，——却並沒有隨着抗戰的展開而進行有系統的，堅強的鬥爭。因此，各種有害於我們民族陣線之鬥爭前途的思想和觀點，直到現在依然隨時隨地的在那裏蠢動：

在各種跟抗戰和一般政治有關的具體問題上，在那裏或明或暗地露出馬腳來。這在需要對強敵進行抗戰到底的現在，是何等嚴重的一種現象啊。

因此，思想上的鋤奸運動，爭取思想上的統一禦侮的運動，在目前實在非常需要，而且它和我們的武力抗戰一樣地需要長期持續，不屈不撓。

在這篇短文中，作者想就自己在言論界中所看到聽到的關於現實政治問題的各種有害的見解或主張，指出其方法論上的根源，並予以嚴正的（即根據科學方法論的）批判。不過可以批判的觀點當然很多，我這裏却祇能擇其犖犖大者。

首先要說到的一種極流行的思想方法病，便是形而上的毛病。大家知道，形而上的思想方法底主要特點有二：靜的觀點和孤立的，隔離的或偏面的觀點。它跟辯證法的動的觀點，相互聯繫的觀點和全面整個的觀點，恰巧是完全相反的。

在「八一三」以前，許多的恐日病患者都持那樣的見解：說我們是弱國，我們談不到打倒別人，祇能犧牲自己；無論怎樣弱法，犧牲自己總做得到的。自然，「

我們是弱國」這一自我估計，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它並不是絕對地正確。爲什麼？因爲在技術經濟的發展水準上，特別是在軍備程度上，我們跟強敵比較，確實顯得是弱國了。但是這僅僅是偏面的估計：在另一方面，我們却也有比敵人強的地方。首先是我們全國上下，不論政府或民衆，不論富貴貧窮，也不論甲黨或乙派，都空前地團結一致，形成了政治上的銅牆鐵壁，足以抵擋敵人槍砲的進攻。我們的對敵抗戰，是有四萬萬民衆之積極的堅決的支持的。這一種偉大的全民團結，堅強無畏的民族陣線，是敵人所絕對缺乏的。表面上日本國內，在軍部的高壓控制之下，也好像是「一致對外」的，但實際上因爲日本軍閥的侵略中國，是藉犧牲日本民衆的利益，甚至犧牲一部分資產階級的利益來進行的，所以大多數和平民衆根本反對戰爭。這種反戰情緒，縱有軍部施以高壓，最近兩個月來始終在不斷地高漲起來，因而敵國內部的種種矛盾，便不斷地尖銳起來。此外，在敵人鐵蹄下過了幾十年奴隸生活的高麗，台灣等等民族的反日運動，也在勃興起來。這樣，在內

部的政治關係上，我們現在的確比敵人強得多，怎麼能一般地說「我們是弱國」呢？

恐日病者祇拿軍備技術的水準去判斷強弱，難怪要得出失敗主義，悲觀主義的結論來了。這種「唯武器論」的主要的方法論，根源便是形而上的孤立觀或片面觀：它把軍備技術孤立起來觀察而拋棄了軍備條件跟其他條件的聯繫：它沒有全面地觀察事情。

自從抗戰勝利的消息不斷地鑽入人們的耳鼓之後，唯武器的恐日病，彷彿像癘疫遇到寒秋一般地斂跡起來了。可是接着却發生了一種表面上跟恐日病相反的新病：這種新病，錢俊瑞先生稱它爲「唯軍事論的虛驕病」，我認爲是很適當的。假如過去的唯武器論的本質是恐日病，那末現在的唯軍事論的本質却是輕敵病了。在前線打了幾次局部的勝仗，或者是擊退了幾次敵人的進攻，於是就有人以爲敵人是「不值一擊的」：我們有着這樣強大勇敢的善戰的軍隊，儘夠可以打退敵人了；他們以

爲單憑我們軍隊的抗戰，就可以制勝；根本把民衆的政治總動員，把武裝民衆發動廣大的遊擊戰，把加強抗戰的政治機構，把實施革命的抗戰外交等任務，都完全視忽了。這樣，口裏儘管喊「全面抗戰」，事實上却祇是「一面抗戰」（祇軍事）的。這顯然是形而上的片面觀在那裏作怪。

輕敵的惟軍事論和恐日的唯武器論，表面上雖完全相反，二者的病源却完全一樣：形而上的片面觀或隔離觀輕敵的惟軍事論者，也一樣地沒有注意到軍事跟政治，外交，民衆等等諸方面的密切聯繫，沒有真確地認識全面抗戰，他們根本缺乏全面的或整個的觀點，而只知形而上地拘泥於一面。

同時，唯軍事論和唯武器論還有另一個共同的思想病源，便是定命論；前者認爲我們民族的命運，唯一地決定於軍事；後者則認爲我們的命運決定於武器。顯然，這種定命論（一切定命論的方法都是形而上的）是完全反科學的思想。在實踐上，它直接或間接地阻礙着我們的最後勝利之實現。

現在我們再回過來考察「我們是弱國」這一自我估計的真實性問題。假如像悲觀的失敗主義者所設想，以爲我們是弱國，所以我們只能犧牲自己。就算我們現在整個兒地是弱國，難道我們因此就一輩子不會變成強國了嗎？這顯然是自暴自棄的觀點。這又是形而上的另一特徵——靜的觀點的產物。事實上，國家民族的強或弱，是完全隨我人之努力奮鬥與否而變動的。我們目前對日抗戰，便是我們自強不息的表現。難道弱國是生成一輩子做弱國的嗎？

第二種流行的思想病，是機械論病。

機械論的特徵之一是只重內容，不重形式；只見現象，不見本質；只知有量，不知有質；實際上是拿前者，來代替後者。

譬如有人主張在抗戰發動之後，我們須少作政治的號召，而應當多多作具體的建議。也有人主張，在這民族解放的實踐時期，我們不需要理論而只要拿出具體的辦法來，拿出應付具體事實的實際辦法來。這些先生們把政治的號召和理論的檢討

看作空洞的，無補於事的，甚至有害的！這樣，把技術的具體辦法跟政治的號召對立起來；把實踐跟理論對立起來；這種以形式（政治，理論）去遷就內容（技術，實踐）甚至拿內容去取消形式的機械論觀點，結果必然要墮入庸俗的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陷阱中去，試問技術性的具體辦法可以脫離政治號召的方針嗎？實踐的策略可以脫離理論的指導嗎？稍具方法論常識的人，一定會給你一個否定的答覆的。而且兩個多月的抗戰經驗告訴我們，漢奸儘管殺儘管產生；極大多數的老百姓雖有仇恨敵人的心理，但總是一盤散沙，沒有給軍隊以應有的幫助，很多地方的老百姓，把抽調壯丁，訓練壯丁看作「拉扶」一樣地害怕；這些事實都說明了目前廣大的政治號召不但不應減少，且應大大地加強擴大。假如以為消滅漢奸和組織民衆（使老百姓不但不怕「拉扶」，而且個個自願地爲抗戰服務）要靠具體的技術上的辦法就能達到，那就無異把消滅漢奸和組織民衆看成單純的技術問題，而不是嚴重的政治問題了。要是這種機械的，庸俗的實用主義支配着我們每一個人的意識的

話，那末全面抗戰的前途至少是很黯淡的了？重實踐而輕理論的毒害，亦與此同。

另外一種機械病的具體表現是重現象而忽本質，事實上是拿本質去等同於現象，也就是拿現象去取消了本質。譬如關於和平的問題，苟安派，瓦全主義者所要求的和平，跟真正適合中華民族利益的和平，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在苟安派的心目中，假如敵人能答應將蘆溝橋事變後增派到中國來的軍隊完全撤去，表面上保持華北五省的領土主權完整，一切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那就是值得萬分慶幸的事了（也許打個大折扣，苟安派也很願意的）。這一來，中日的和平（假如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願是這種敗類的話），自然立即實現。但是現在的中國絕對大多數人所要求的和平，却是：經過長期持久的全面抗戰，以達到恢復「九一八」以前的狀態，並實現中國之澈底的自由平等條件之下的真正的永久和平。顯然的，這樣的和平和瓦全式的和平，從表面現象上看去是一樣的，但本質上却是南轅而北轍。前者是在暴日鐵蹄下做奴隸的「和平」，後者才是平等，自由，相敬，相愛的真正

和平。反過來說，表面上不和平的舉動，本質上倒可能具有真實的和平意義的。例如我們的抗戰，本身就是維護世界和平正義的。假如將來全世界酷愛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武力制裁侵略國，那也是一種表面不和平而本質上和平的舉動。

還有一個重現象而忽視本質的例子，也值得提出來說一說。向來有（現在依然有）許多人談到外蒙問題時，總把外蒙跟偽滿同樣看待，彷彿偽滿既是日本的傀儡，那末外蒙便是蘇聯的傀儡！日本帝國主義者和一切在反赤旗幟之下助桀為虐的人們，無時不在努力做這樣的宣傳；他們正要想藉此以分裂我們五大民族的統一陣線；他們，尤其是日寇，正想藉此以辯護「滿洲國」的合法，藉此作為侵略中國，進攻蘇聯的護符。我們知道，事實上外蒙古共和國和偽滿外表下彷彿相同，本質上簡直完全相反的。我們平心靜氣地講，根據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大中華五大民族，本在平等的原則上，它們本有各自治理之權，那一個也不能強制地統治別一個。五族共和原是依據自由聯和之原則而實現的。而外蒙古則向來在承認中國宗主

權的條件之下獨自成立自治共和國。我國既承認它的自治，它在侵略者不斷威脅之下，當然有與利害相同的鄰邦實行親善合作的權利。但是因爲在蘇蒙關係中，蘇聯是世界上的第一大強國，而蒙古却是一個荒涼的落後國家，所以事實上的前者領導後者，確是無可諱言的。這樣便形成了外蒙和偽滿表面上的等同。但是本質上兩者不但不一樣，而且完全相反：外蒙是獨立的自由的，跟蘇聯處於平等互助的關係中；偽滿却是日本帝國主義一手包辦成功的傀儡把戲，事實上完全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這是有目共睹的。其次，外蒙是反侵略的，偽滿却是侵略者的爪牙；外蒙不但形式上承認中國的宗主權，而且在維護和平反對侵略的鬥爭中，它必然跟中國站在一條戰線積極擁護我國抗戰的；『滿洲國』則已公然派軍隊和暴日一致來進攻我國了。

此外，如等待主義，「左」傾幼稚病，英雄主義，主觀主義等等思想病，我們也隨時隨地可以發見；它們都有一定的哲學基礎的。但因作者時間有限，本刊篇幅亦有限，只好留待將來有機會時再來討論了。（文化雜戰第六期）一九三七，十，十六，上海

戰時讀物問題與政治問題

施復亮

鄭振鐸先生在十月六日「申報」上發表一篇「戰時的讀物問題」，指出「這戰時五週的讀物」有三個缺點，其中一個是「同性質的刊物太多：抗戰畫報一類的期刊至少在六七種以上，二分錢的小型三日刊也不下七八種；小冊子也多性質雷同者。爲什麼不能分工合作呢？爲什麼在戰時仍不能避免「一窩風」的趕熱鬧的上海老癖氣呢？對於這個問題，鄭先生雖然提出兩個「爲什麼」，但他自己並沒有加以解答，他只勸告「著作家和出版家應該深切的反省」。「爲什麼」要「反省」？就是「同性質的刊物太多」。但是爲什麼有這許多「同性質的刊物呢」？這豈不是更重要的問題嗎？不究明「同性質的刊物太多」底原因，決不能提出切實有效的解決辦法。

首先我們要問：現在這許多「同性質的刊物」，是些什麼人辦的？誰都看得

出：辦這刊物的有兩種人，一種是書店老板（即所謂「出版家」），一種是救亡團體或熱心救亡的個人。前一種，辦這些刊物，目的多半在營利賺錢，或者要維持他自己底招牌，使讀者不要忘記了它。後一種人辦這些刊物，目的在盡一點宣傳責任，或者在無事可做的環境找一點事做，以免自己良心底譴責。

我們要知道：在這一切商品化資本主義化的營利社會裏，出版事業也是營利事業（即所謂「企業」）底一種，出版家（即「文化商人」），借「文化」名義來營利的商人）也只有有利可圖的時候（除了極少的例外）才會出版我們所需要的讀物。要他們賠本來出版銷路不好的有價值的讀物或大眾所急需的讀物，是做不到的。市場上需要什麼，他們就「一窩風」搶起來出版什麼。需要一過去，他們也就停止供給。某一時期社會科學的書銷路好，大家就爭出社會科學書籍。另一時期文學書籍銷路好，大家就爭出文學書籍。教科書生意好，大家就爭出教科書。古書生意好，他們就搶起來翻印古書。聽說某幾個大出版機關，至今在東北四省還有它們

底分局分館，專門出版專供偽國使用的讀物。文化商人底目的在於賺錢，與武化商人（即軍火商人）及其他一切商人底目的在於賺錢，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在這營利社會裏，一切商人底賺錢都是正常的合法的，文化商人底賺錢當然也是如此。只有我們這些「書獃子」及「希望過奢」的讀者，才會常常責備他們爲什麼只曉得營利賺錢，不多替文化努點力。這是我們自己底「不識相」，並不是他們底錯誤。我們只要看最近的情形便可以明白。當「八一三」抗戰爆發後的初期，我們怎樣希望他們把那些因戰爭而停止的刊物恢復起來或聯合出版，他們總是拿穩自己底「算盤」，對於我們底提議淡然置之不理。現在看看戰事有延長下去的可能，對於戰時讀物的需要一天一天地增加，那些文化商人也就部分地改變方針，陸續地出版戰時特刊或把原有的刊物復刊，有些甚至決定出版戰時叢書的計劃了。需要決定了供給。我敢斷言：以後「同性質的刊物」還要陸續增加，還要更大規模地浪費人力和物力。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應該「反省」與否的問題，而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

還有一些刊物是救亡團體所創辦的，如文化界救亡協會所主辦的「救亡日報」，編輯人協會所主辦的「文化戰綫」等是，這些刊物，目的在於宣傳抗敵救國，根本沒有賺錢企圖，甚至還要賠錢。這種刊物如果還沒有更好的「同性質的刊物」出來代替，我以爲是應當設法繼續下去的。我們文化人替團體的刊物（以宣傳抗敵救國爲目的的）寫文章，也只有比起替那營利刊物（文化商人所創辦的）寫文章更積極些更熱心些才對。我們做無報酬的救國工作，應當比做有報酬的工作更負責任。這就是文化人對讀者對一般羣衆最好的宣傳和教育。我們天天宣傳別人「犧牲一切」，難道我們自己連這一點都不能犧牲？就大體來說，最近文化人在這一點上是能夠犧牲的，不但犧牲了氣力，而且犧牲了金錢。不但各救亡團體底刊物不會感着稿件恐慌，而且最近還紛紛出版了許多「同性質的刊物」。這在目前不能不說是一件較好的現象。自然，在另一方面說，是一種人力和物力底浪費。但是造成這種浪費的責任，決不在於那些文化人或著作家，因而不是他們底「深切的反省」所能解決。

的。最近有好些朋友甚至不相識的青年創辦刊物，找我寫點稿子，我每次想到現在「同性質的刊物太多」，總想勸他們停辦或不辦。但我每次聽到他們訴說找不到工作做的苦悶，莫奈何只得辦一刊物盡一點宣傳責任的話語之後，我實在再沒有勇氣勸他們停刊不辦，甚至有時不能拒絕他們索稿的要求（因為我近來深深地感覺到現在寫文章是一件痛苦的事，一則好暴露現實的話語都只能半吞半吐地說，尙且不免要得罪各方面；二則宣傳與組織底分離，建議與執行底分離，使我們無法對於自己所說的話在行動上負責）。這種現象，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決不是少數文化人歡喜浪費人力物力的問題。

鄭先生不贊成「同性質的刊物太多」，我是完全同感的。現在不但同性質的抗戰書報，「小型三日刊」，小冊子等太多，就是日報晚報又何嘗不是太多！在上海，要這麼許多大同小異的日報晚報做什麼用！這不是人力和物力底浪費是什麼？明知道是人力和物力底浪費，爲什麼「不能分工合作」？這決不是「一窩風的趕熱

鬧的上海老癩氣」，也不是著作家和出版家底「深切的反省」所能改正的，只要在無組織無統制的商業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裏，都會發生這樣的現象。

在現今的營利社會裏，著作家要著作什麼，完全不能由他自己來決定（除非他另外有職業可以維持生活），要由出版家要不要他底著作來決定。出版家要出版什麼，也不能由他自己來決定，完全由市場上的需要來決定（在市場上所需要的許多種讀物中，自然可以由他選定一種或幾種來出版；但是需要最多的某一種或幾種，出版的也一定最多）。這是現在中國社會所流行的經濟法則，不僅出版界如此。不改變（至少是修正）這種經濟法則，「一定不能分工合作」，一定「不能避免一窩風的趕熱鬧的上海老癩氣」，一定還要發現更多的「同性質的刊物」。著作家「深切的反省」固然沒用；出版家「深切的反省」也沒有多大用處，因為他不能放棄營利的原則。真正要改正這種毛病，第一，一切經濟活動在抗戰時期要放棄營利的原則；第二，要擴大民衆運動。

我總覺得：在這全民族爭生存的抗戰時期，我們底經濟原則再不能維持營利，賺錢，發財的原則了。我們現在決不能亦不應妄想「一面救國，一面發財，」更不應拿這種錯誤萬分的觀念去向別人宣傳（如像一部分勸募公債的人那樣）。我們應當趕快拋棄一切自私自利的投機取巧的「名利雙收」的錯誤觀念，應當認定「抗戰高於一切」，「應該爲這個生死存亡的民族抗戰而貢獻其所有——生命以及一切」（借用鄭先生底語）。因此，我不贊成救國公債由無利息改爲有利息，由二釐息改爲四釐息的辦法，我也不贊成對於某些工業採用保息制度的辦法。這些辦法在平時期是可以適用的，在戰爭時期實在不能適用；在外國戰時是可以適用的，在中國戰時決不能適用。我們底抗戰是一種民族求生存的戰爭，根本與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不同。我們要使戰爭得到勝利，必須運用全民族底一切力量，（一切人力物力）來支持戰爭。所以我們現在所應當採用的經濟原則，是「支持戰爭」，不是營利賺錢。如果企業家們在這時候還只曉得營利賺錢，試問何以對得起那前線犧牲的忠勇

將士？國家是我們大家庭國家，我們決不能讓一部分人犧牲，一部分人享樂！犧牲要大家犧牲！只有大家一致地犧牲，方能挽救中華民族底危亡。並且我們要使我們底犧牲發揮出最大的效果，我們要把我們底一切人力和物力都用在抗戰上面去，不許有一絲一毫的浪費。因此，我們主張在戰時實行統制經濟，一切經濟活動都在整個統一的計劃之下統制起來，使一切人力和物力都得到適當的分配和有效的使用。在這個意義上說，出版業也應當作有計劃的合理的統制，與整個抗戰的需要配合起來。這樣，便能夠「分工合作」，滿足各方面的需要，避免重複的多餘的「同性質的刊物了」。但要實行這樣的統制，決不是舊式的官僚主義的「官督商辦」的辦法所能奏效，只有真正建築在廣大民衆的基礎上的民主政府才能做得到。所以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

現在有許多人明知道「同性質的刊物太多」依然不能不辦，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沒有別的工作可做。有許多指導者怪那些人自己不會找工作，把責任完全推在個

人身上，我以為是很冤枉的。我們一方面應當看看客觀的環境，同時也應當替別人設身處地想一想，不要冒昧地隨便責備人。我也承認：我們自己應當努力去找工作做，不應當等工作來找人。但是現今阻礙重重的客觀環境，我們也決不能閉着眼睛裝做沒有看見。我們不能過份地責備那些喊着要工作做的青年或文化人。自然，有些青年或文化人，自己是有許多缺點的；但那些缺點也許有一部份不是個人底力量所能克服的。即使青年要想在救亡工作中解決自己底吃飯問題，也不能算錯。餓着肚子決不能做什麼工作，自己吃飽的時候也應當想到別人餓着的時候。我們對於那些在抗戰時期尙且以升官發財爲目的的人，不敢去責備；試問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和勇氣去責備那些熱情的青年要在救亡工作中找一碗飯吃？至於他們因爲找不到工作只得用自己底金錢和氣力辦一個與我們「同性質的刊物」來盡一點宣傳責任，我們更怎能忍心去責備他們「趕熱鬧」，浪費人力和物力呢？我相信辦這些刊物的青年，都是些純潔熱情的有爲的青年；能夠組織民衆的青年。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

民衆，全部要組織起來，至少也需要幾十萬組織者，基本的幹部至少也需要幾萬人。如果民衆運動發展起來，我相信上海這幾百幾千拿筆桿子的所謂文化人決不會沒有工作做，決不會死守在上海來辦這許多「同性質的刊物」。那時大家只會感着工作太忙，決不會感着沒有工作做。所以許多熱情的青年或文化人紛紛創辦許多「同性質的刊物」，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完全是現在救國運動沒有走上軌道的結果。

根據以上所說種種理由看來，很明顯地可以知道：在不應當浪費人力物力的抗戰時期竟有這許多「同性質的刊物」出現，根本的原因，由於當前的政治不能與抗戰的需要配合起來，不能依照抗戰的需要而加以澈底的改造。因此，「戰時讀物問題」或「出版界動員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不能離開政治問題而獨立。固然，在某一範圍內（小的範圍），可以由少數「熱心救國」的著作家和出版家底努力，相當地避免人力物力底浪費；但要使出版界完全避免人力物力底浪費，第一必

須實行與整個抗戰時統制經濟相聯繫的統制出版，（以推動抗戰到底爲目的），第二必須使一切文化人都能夠得到適當的救國工作（如民衆運動及政治工作等）。要做到這兩點，必須改革現存的政治機構，使政府建立在廣大的民衆身上，得到廣大民衆底擁護，能夠以民衆底力量做基礎，進行關於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面的改革，簡單說，必須實行民主集權的政治。第一步，政府應當允許民衆有救國言論，救國組織，救國活動底完全自由。民衆也必須向政府要求這種救國自由。只有把全體民衆動員起來，才能鞏固抗戰底基礎，才能推動政府改革政治，才能合理地解決戰時讀物問題，才能運用一切人力物力支持抗戰到底以爭取最後的勝利。

（文化戰線第六期十月七日）